

革命无 悔

战斗在中山的日子

谢长贵 林伟桦 主编

革命无 悔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革命 无 悔

战斗在中山的日子

谢长贵 林伟桦 主编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无悔：战斗在中山的日子 /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98-3967-6

I . ①革… II . ①中… III .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8063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佳音
复 审：潘 鹏
终 审：李青建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高明领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5mm×285mm 1/16
字 数：140 千字
印 张：9.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967-6

定 价：20.00 元

CONTENTS

目 录

革命
无悔

战斗在中山的日子

- 001 珠江纵队的成立经过 / 谢斌
- 004 平生愿为国担忧 / 欧初
- 010 大布乡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 梁奇达
- 017 乌石乡妇女会在斗争中成长 / 郑建明
- 020 回忆抗战时期云衢中学的革命活动 / 欧素英
- 027 三角乡革命活动的回忆 / 吴振明
- 031 记九区妇女反“三征”斗争 / 方群英
- 036 纪中党团活动回忆 / 张汉文
- 039 解放前四区党团活动概况 / 孙曼光
- 040 中山解放前夕的工人活动 / 孙子仁
- 042 解放小榄 / 袁勋 吕胜 何炳刚 区英伟
- 052 解放战争时期中山九区革命斗争概况 / 周森
- 061 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县的武装斗争 / 吴当鸿
- 071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山武装斗争 / 梁冠
- 076 难忘的回忆 / 欧素英
- 081 革命生涯实录 / 郑永晖
- 095 前山高处指南环——关于澳门的往事杂忆 / 欧初
- 101 孙夫人的重托 / 罗章有
- 103 一段难忘的经历 / 梁田
- 107 从两次抗击敌军看两谢的指挥艺术 / 罗章有

CONTENTS

目 录

革命
无悔

战斗在中山的日子

- 116 进修游击战 / 罗章有
- 119 通讯兵在五桂山 / 伦永谦 青山 黄梅
- 121 流星之歌 / 孙烈 陈大征
- 125 活擒土匪“老鼠精”纪事 / 吴当鸿
- 127 “铤而走险” / 吕胜
- 130 三次突围 / 郑卫标
- 133 石洞突围 / 吴当鸿
- 138 在敌人眼皮下战斗 / 黄金贤 黄勤志
- 140 解放前夕在沙边的活动 / 孙云峰
- 142 北帝庙会师 / 司徒洪
- 145 后记

珠江纵队的成立经过

□谢斌

1944年7月，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世界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人民的方向发展。在亚洲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发动了打通粤汉、粤桂、湘桂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部队从湘粤桂大溃退，大片国土沦陷，广东大部成了敌占区。

党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必须扩大武装力量，增强战斗力，把部队开到日军北侵、西进之敌占区，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仍坚持隐蔽以待时机的方针。

8月份，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号召共产党员都要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来。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主要打击日、伪军，同时坚决反磨擦斗争，对于不抗日而专门反共的杂牌军坚决予以消灭。我们三角洲地区部队的任务是：向中区、西江、北江、粤桂边及南路敌后前进，扩大武装斗争。

为此，9月底至10月初，指挥部在五桂山召集了有珠江、中区和西江特委负责人参加的槟榔山会议。

会上，罗范群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土洋会议”精神，宣布成立中区纵队（对外不公开）和领导成员名单。刘田夫汇报了他在粤中了解的情况和部队挺进粤中的准备工作。会议还分析了本区的形势，研究了贯彻“土洋会议”精神的措施，决定了挺进粤中的部队和行动方案，确定了留下部队的编组及第一、第二支队和南三独立大队的领导人员名单等。中区纵队的成立，标志着三角洲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0月1日，指挥部在槟榔山村的古氏宗祠召开中队、区以

上干部会议，罗范群在会上宣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成立。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刘田夫、副主任刘向东。

10月20日，中区纵队领导（刘向东留在五桂山）率机关和挺进粤中主力大队近500人，告别了五桂山的乡亲和战友们，向粤中挺进，在新会井溪村与新鹤大队胜利会师。

我军在粤中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新鹤大队的配合下，迅速向敌伪据点大泽、司前等地发起攻击，开辟了一大片抗日游击区，建立了以司前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当日军进攻粤中时，逃跑而不知去向的国民党顽固派，现在又窜回粤中来与我们争夺地盘。他们不是从日军手里去争回已沦陷的土地，而是要从我们手里抢夺已被我收复的土地。我们对顽固派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反击。

我军进驻皂幕山白水带之后，袭击了宅梧。宅梧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几个大粮仓，驻扎200多人守备。我军打下宅梧之后，将存放的几千万斤粮食全部没收，并将部分粮食分给山区贫苦人民。

按原来部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部队和中区的部队均受中区纵队指挥，由于部队向西越走离珠江三角洲越远，联络困难。为了加强各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和建设，省临委、广东军政委员会于11月11日决定派梁鸿钧到中区，周伯明到珠江三角洲，并要林锵云和我返回五桂山区组建珠江纵队，已挺进到粤中的部队继续留在中区。

不久，中区纵队在鹤山县宅梧召开会议，梁鸿钧、连贯传达了省临委、广东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我和林锵云在云乡告别了罗范群、谢立全、刘田夫等，于12月上旬返回了五桂山，与梁嘉、周伯明、刘向东等汇聚在一起，筹备珠江纵队的成立工作。

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准备，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公开宣布成立了。纵队领导成员有：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政治部主任刘向东。纵队辖：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政委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有，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第二支队，支队长郑少康，政委

邝明，政治处主任黄友涯；独立第三大队，大队长林锋，政委梅易辰（后叶向荣），副大队长何达生、潘恩隆，教导员陆华。

纵队向外界发表了《珠江纵队成立宣言》。宣告：本纵队乃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兄弟部队一起，共同坚持华南敌后战场，为解放华南同胞而奋斗。

珠江纵队成立之后，在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各部队主动灵活地向三角洲地区敌伪据点三溪、大坳沙、官窑、金钟、神湾、牧牛沙农场、乐平、石壁乡、泮边村等地发动了广泛的袭击，取得了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伪势力。日军为防止盟军在广东沿海登陆，出动了万余人的兵力，对三角洲地区进行“围剿”，亦被我军民协力粉碎。并巩固发展了抗日武装和继续建立了一批区、乡、村的民主政权。

（节选自谢斌：《珠江抗日的中坚力量》，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珠江纵队分会编印：《珠江滚滚》，2005年印行。《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刊载。）

平生愿为国担忧

□ 欧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消散整整 60 年。而对我们这些亲历过当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老战士而言，8 年抗战的种种往事依然清晰如昨。战争的惨烈、侵略者的残暴、中国军民的英勇壮烈，以及欢庆胜利的喜悦，不时穿越一个甲子的历史烟云，在我们的心海掀起狂澜。

由德、意、日轴心国挑起的第二次大战，波及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八成，卷入战争的有 60 多个国家，交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超过 1 亿。熊熊战火燃遍全世界各大洲的陆地、空中、海洋，造成 5500 多万军人、平民丧生，堪称人类历史上为祸最烈的浩劫。面对无比残暴的法西斯侵略者，全世界正义力量奋起反击，携手作战，历数年艰苦卓绝战斗，盟军终于会师易北河，攻克柏林，继而大军逼临日本列岛。曾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已被中国军民打得苟延残喘，此时只好俯首登上密苏里号战舰，递交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世界历史随之翻开崭新一页。

历时 8 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虽然付出重大牺牲，但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侵略者，迎来了近代史上历次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令中国历史进程出现重大转折，而且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我们今天纪念二战胜利 60 周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而我觉得最值得强调的有如下三点：

一、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中华文化连绵延续数千年，民族精神深入人心。面对外患，全国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无数志士仁人为维护民族血脉，毁家

纾难，视死如归，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日军侵略中国最早的突破口选在东北、华北地区，然而很快就将战火烧向华南地区，企图截断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主要信道。战争初期，驻扎广东的部分国民党正规军、保安部队等，分别投入战斗，抵抗日军入侵。1939年日军进犯中山横门，国民党中山守备总队布防抗击，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一个守备中队立即开赴前线，同时以青年抗日先锋队组成横门前线指挥部。我作为指挥部成员之一，率领抗先队员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亲眼看到守备队官兵击退日军的情景。

我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长期在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地带打游击，目睹不顾生死踏上战场的战友之中，既有出身贫苦的黎源仔等农民，也有卫国尧、肖强、杨日韶、黄石生、周增源等大批侨乡知识青年。他们有的家境富裕，有的已经在海外或港澳工作，还有的在海外留学归来，正是前途似锦。当祖国遭受侵略，他们义无反顾投身游击战争，先后牺牲在抗日的疆场上，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侨乡人民爱国之心更是令人敬佩。中山的五桂山根据地，处于日、伪军四面包围之中，敌我之间声息可闻，我们游击队依靠群众组成的“人山人海”，立足于不败之地。群众全力支持抗日游击队，捐钱捐物，救护伤员，送信带路，还送子送郎参加游击队。根据地到处有拥军母亲，村村有堡垒户，支持子弟兵的动人故事传颂至今。

1944年初夏，上千名日军袭击五桂山区的石门村，找不到游击队就抓走93名村民严刑逼供，村民们坚决不肯透露游击队的去向，日军竟然将其中41名青壮年推入骆仔沙岗活埋。敌人的残暴吓不倒当地人民。短时间内，石门村就有5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立誓要向敌人讨还血债。石门村民这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在神州大地到处涌现。这种爱国精神、反侵略勇气，令九州山河增色！

记得在战争年代，有无数次，我含泪唱着田汉作词、范继森谱曲的一曲挽歌送别牺牲的战友：

安眠吧！勇士，
用你的血写成一首悲壮的诗。
这是一个非常时，
需要许多贤者的死！

……

我不是懦弱伤感的人。然而至今每次唱起这首歌，我依然激动悲伤。的确，当时这批青年不愧是民族精英，他们本应可为国家作更多贡献。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许多贤者的死。只有少数人的牺牲，才能换取全民族的永生。他们牺牲了，但那种爱国家、爱人民的不朽精神，却浩气长存。我们这些从残酷战争走过来的幸存者，应当主动向后代阐发这种精神，使之世代永远发扬光大。

006

二、全民团结共赴国难

《左传》有句名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年中国各政党、各阶层都明白这个道理。1936年6月，中共中央便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正确主张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得以实现。抗日态度一度游移的国民党当局，1937年也发出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鼓舞起全国军民的抗敌意志。中国历史的巨轮，终于从十年内战的深辙中，转上国共第二次合作、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轨道。

“枪口对外，齐步向前”，这是全中国人民当时最一致最洪亮的声音。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非常显著，全中国人民都行动起来，掀起民族解放的热浪。港澳同胞、海外华侨踊跃募捐，国际社会也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的抗日斗争，甚至派人来华助战。

游击队同样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1944年1月成立后，我们积极联络袁带、屈仁则、钟汉明等部友军，共同抗击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围攻。对“大胆雄”等一时声称愿意抗日的地方势力，我们也与之达成协议，共同打击日军。

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我们以继承弘扬他的革命精神为己任。我和游击大队政委谭桂明两次探望中山先生的姐姐孙妙茜

女士。我们还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举办文艺晚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19 周年，演出自编话剧《精神不死》，并专门用轿子恭接孙妙茜到会场看演出，还请她讲话。她表示坚决支持抗日，当地军民很受鼓舞。

游击队还经过周密安排，努力保护孙中山故居所在地翠亨村，并建立一个表面应付日伪、实权却掌握在抗日军民手中的“白皮红心”政权。孙中山的元配卢夫人当时客居澳门。她听说个别人盗窃总理故乡纪念中学的物品，还破坏翠亨村的山林，便写信给我游击队负责人，要求协助。游击队马上查明案情，严惩肇事的坏人。卢夫人闻讯十分高兴，专门来信致谢。

“二战”中葡萄牙宣布“中立”，因此澳门成为中立地区，然而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香港同胞一样，历来爱国传统十分强烈。抗战初期，澳门四界救灾会等团体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青年回祖国支持抗战。林枫、叶向荣、郑少康、廖锦涛、吴声涛、冯剑青、欧日良、梁铁等，回到珠江三角洲从事游击战争。爱国人士柯麟、柯平、傅德荫、何贤、马万祺、招兰昌、马庆康、梁永馨等，通过多种方式尽力支持游击队。

我军也善加利用澳门的特殊环境。新四军曾到澳门购买药品、弹药等。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在澳门高德士马路 19 号 2 楼设立秘密办事处，由郑秀担任主任。李成俊等大批澳门青年毅然返回中山，参加了五桂山游击队。

我们还同当时的澳葡当局谈判，口头达成互助协议，由我军负责维护澳门外围治安，而澳葡当局允许我军在澳门购物、筹款，并可送部分伤病员到澳门治疗。双方还计划互设电台，以保持更密切联系。老红军谢斌作战负伤，也到澳门治疗。我游击队之一部在澳门外围凤凰山区活动，协助澳门当局擒获扰乱治安的“老鼠精”。柯平每次到东江游击区，都取道五桂山区，再由我“土海军”护送横渡伶仃洋。我们还将为祸澳门数年的大汉奸、大盗贼黄公杰引渡到澳门，交由澳门当局惩治，澳门民众额手称庆。

抗日战争的史实表明，民族团结是战胜外敌侵略的根本保证。小国如此，大国更是如此。这一用惨痛牺牲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

堪作中华民族的座右铭。正值庆祝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先后访问北京等地，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中华民族进一步团结出现新契机，值得庆贺，更值得珍惜。

三、牢记历史居安思危

“二战”结束之后，虽然局部战争从未中断，但世界规模的战争未再发生。长期的和平环境，令部分人滋长麻痹情绪，无视战争的潜在危险。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一些法西斯势力借机抬头。德国的新纳粹分子不断发出种族主义的叫嚣，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日渐嚣张。他们从修改教科书入手篡改历史，粉饰侵略暴行，接着要修改宪法，扩大军备。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带头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为当年的战犯招魂。今年以来，日本更变本加厉，同时向中国、韩国、俄国提出领土诉求。这种种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应有紧迫的历史感，抓紧抢救抗战史料，合作修成一部客观真实、翔实可靠的抗日战争历史，还可以邀请当年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一同参与，以粉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阴谋。各地也可以搜集本地的抗日故事，编成中小学乡土教材，教育少年儿童。应当指出，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抗战史书对国民党军队的贡献提得不够，而台湾方面的一些书籍则抹煞共产党的抗日贡献，甚至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其实，当年我们游击队编写的识字课本，其中的抗日歌谣既唱平型关，也颂台儿庄。发扬这一实事求是的传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是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应做的事情之一。研究“二战”历史，不应忘记中国人民是亚洲战场的主力，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主要靠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正是中国军民始终抗击日军主力的大部分，日军企图与德军夹击苏联的“北进”计划才被粉碎，日军的“南进”企图遭到阻遏。结果，日军的战略构想一再破灭，大量军力被消耗，到战争末期战斗力已经

严重削弱。当然，我们绝不会忘记前苏联的巨大牺牲，也没有忘记英美两国的核心作用，但更不可忽略中国军民的伟大贡献。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虽然付出重大牺牲，但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侵略者，迎来了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的命运由此出现新契机。

各主要参战国均郑重对待“二战”历史。俄罗斯的无名英雄纪念碑、重现攻占硫磺岛之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塑像等，不仅在本国深入人心，而且成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标志。在我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等，开了好头。个人建议，待条件成熟，可考虑在首都北京重要场所，建立朴素庄重、造型鲜明的抗日战争纪念建筑物，供人民凭吊英烈、重温历史。

著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当年被法西斯逮捕下狱，而他牺牲前写成足以名垂千古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书中他满怀深情向世人呼吁：“人们呵，我爱你们。可是要警惕啊！”多年之后，伏契克的警句依然闪耀远见的光辉。我们这些当年的老战士，“平生愿为国担忧”。如今我们虽已白发飘萧，但仍然一直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发展。中国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但只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方能遏制法西斯思潮死灰复燃，反对、抵制霸权主义，保证和平发展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大布乡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梁奇达

010

一、古老的村落

大布乡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据说建于明代，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它坐落在中山旧五区上游（即今三乡镇），抗战时人口约1300人。多姓聚居，大姓有林、柯、孙、郑、黄、张，后来迁居来此的有麦、尹、苏等姓。大布乡初建时是在牛扒石下的龙岗坡。传说人们在此定居一段时间后，觉得龙气不佳，又举村迁至现址。大布乡背枕五桂山，面临金斗湾，岐关西路横贯村前，确是一派地灵气势。人们满怀希望，期待改变祖辈所遭受的贫穷厄运，特别是当辛亥革命冲破封建锁国的牢笼后，他们更是满怀希望，各自奋发图强。除了在家耕田之外，还闯南走北。有活力的人还远渡美洲、南洋，有的闯上海、广州，有的去香港、澳门谋求出路。虽然如此，在家务农的人，却仍被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制度的绳索上，过着贫困的生活。绝大多数人住在又潮又黑的小屋里，寂寥的村庄，饥饿的村民，毫无生机。只有寥寥几户往外闯的人家盖起新房，日子过得稍好些。其中算有运气的是闯到上海经营茶叶并稍有名气的柯凤巢，他给家乡捐了1200元大洋，旅美华侨孙逸山捐了1000元大洋，凑合起建立了一所学校——大布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而其余外出的均寂寂无闻。即使像孙逸山这样的华侨，也无法供养儿子孙一之在香港深造。其时，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这不能不引起在贫困、黑暗中挣扎的乡里青年的思考：我们的出路往何处寻？

二、革命性的转变

孙一之在香港目睹殖民地种种黑暗，中国人饱受侮辱歧视的

现实，思绪万千，彷徨求索。而此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进了中国东北、华北……祖国正处在危急的存亡关头。他毅然回到家乡，凭借他的学识和父亲献资兴学的条件，当上大布学校校长。他一面励志延聘一批进步教师，改造教育；一面广交同行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石岐，他结识了刚从南洋逃难回来的孙康——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彼此思想相通，很快成为挚友，共同参加了“世界语研究会”。1936年，在孙康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布乡第一个共产党员、中山第一个支部成员，随后又成为县工委领导成员之一。他为大布乡的历史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1937年夏，一个被陈济棠通缉追捕的共产党员梁浪舟，从广州转移到中山，担任中共中山五区工委书记的职务。为了便于工作，孙一之延聘他来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教员。随即在大布乡，成立了以梁浪舟为书记，叶向荣（在雍陌教书）为组织委员，孙一之为宣传委员的第一届中共中山五区工委。区工委积极分头活动，一边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边在爱国青年中进行党的教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鸦岗、平岚、桥头、乌石、大布、雍陌、马溪、平湖、沙岗以至下五区的造贝、北山、南屏等10多个乡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乡的党支部。党员人数居全县之冠，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些外区人暗称五区为“小延安”。

大布党支部先后吸收了郑少康、孙道溪、黄炳南、郑世雄、张远材、郑古、林帝杰（斗森）为第一批党员，成立了大布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党支部。经过党员的工作，推举孙一之为乡长，郑世雄、黄炳南为乡警队的正副队长。从此，大布乡的政权、教育、武装以至乡中各抗日团体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党支部手中，在党的领导下，为支援中山抗日武装斗争作了有力的准备，时为1939年。大概由于上述缘故，人们暗暗称大布乡为“红色的村庄”。

三、党的秘密机关的保护者

大布乡被人暗称为“红色村庄”还由于它是多届区县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党处在不合法地位，倘若暴露了，就会遭到追捕杀头，所以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必须隐蔽方能进行工作。大布

乡由于有坚强的党支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所完全在党支部掌握下的学校，可以自主地安排担任各种秘密职务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从1937年秋第一届中共中山五区工委设在大布乡起，到1939年郑少康任五区区委书记时，也以大布乡为基地。关山1940年接任中山本部县委书记后，1941年也来到大布乡，以教师名义展开工作。他领导一、二、四、五、六区党的工作。他的安全是靠了乡党支部和当地人民群众，学校只给他安排适量的工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党的工作，他的食宿等生活条件也是大布乡慷慨提供的。1943年以后还有县区领导人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均在此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像关山一样，他们得到了大布乡党支部和群众的保护、照顾。特别是1940年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和王均予来中山视察工作，正值沦陷不久，敌情复杂，当时县委机关在翠亨村，在那里接待不安全，经再三考虑，最后还是选择大布乡，通过郑少康安排在大布乡后山果园内。这个果园由郑少康一家精心经营布置作为秘密工作联络点，果园的周围围以带刺的杂树，园内种上各种果树，果树丛里盖了一间草屋，是一个很好的掩体。领导来了，就由郑少康一家和一个专管果园的党员轮流放哨，郑少康妈妈送饭。前后两次任务均安全、胜利地完成。这任务对中山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时，原中山县委正受上级个别同志的指责，说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还怀疑县委领导混入托派和叛徒，县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粤南省委到来了解情况后，明确地肯定了县委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怀疑县委不纯是无根据的。这对统一党内领导思想，正确指导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布乡党支部及郑少康一家对此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四、学校是藏龙卧虎之地

大布学校在孙一之任校长后，从1936年起，领导权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党的领导下，聘请一批进步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先后有县区党的领导孙一之、曾谷、梁浪舟、郑少康、关山、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同志，还有一批20世纪30年代末入党的老党员

员如高萍、许纯、谢月珍、温若萍等，此外还有从延安回来的张扬、陈雪，从香港聘来的美术家陆无涯、从广州聘来有音乐特长的陶亦夫等到此任教。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文化素养也较高。以这所学校为阵地，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传授文化知识，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有理想的爱国青少年。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60多人，光荣献身的7人，先后参加共产党的10多人。他们经过残酷的战争的锻炼，成为解放后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大布乡任教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不少人到部队工作，成为革命军队的指挥员；也有很多人成为党政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梁浪舟到军队做政治工作；郑少康先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广东抗日武装北撤山东成立两广纵队后，他被委任为后勤部部长；关山任后勤部政治委员，随军南征北战，迎来全国解放的胜利；曾谷先任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党组书记，日本投降后，任命为坚持五桂山斗争的政治特派员；孙一之先到香港担任统战工作和华侨工作，兼任《今日中山》报主编，香港沦陷后回乡任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秘书长；司徒毅生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张扬到澳门任《澳门日报》副总编；陆无涯先生回港后从事美术创作和战地记者工作，曾到沙鱼涌采访“东纵”北撤的情况，向海外同胞介绍广东人民子弟兵对日抗日的贡献和北撤的政治意义；高萍、谢月珍等女同志回到五桂山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骨干；肖伟华离开大布学校后，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最后英勇就义，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

长达10年之久，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到大布学校的各级领导及党员从未发生意外，都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布乡的党支部、大布乡人民国家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

五、对抗日的贡献

由于国民党疯狂地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中山于1940年沦陷了。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军队统统逃到后

方去，中山人民惨遭野兽般的日寇的烧杀、抢掠、奸淫。一部分群众害怕敌人的兽行，纷纷逃往港澳或后方，无法逃难的惶惶不知所措。中共中山县委为了惩治汉奸和日军，稳定民心，组织民兵积极行动，特别向大布、上栅党支部发出指示：立即调动民兵袭击雍陌、大金顶的敌军。

大布党支部接到县委的指示后，立即调动民兵 30 余人，由郑少康、郑吉、郑世雄率领，兵分两路，向驻守雍陌的日军进击。一路袭击公路的敌人岗哨，一路袭击敌师部驻地。大布民兵打响了中山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枪声一响，敌人的哨灯灭了，敌哨兵被打伤了。攻打敌师部的一路枪声轰鸣，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盲目还枪，消耗大量弹药，更使敌人彻夜无眠，乱作一团。上栅民兵在大金顶也同时发起袭击。事后，我们发出“快报”，群众闻讯大快，香港《今日中山》用头版转载。海外同胞对党仍在沦陷区领导人民抗日感到快慰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支援敌后抗战。

在抗战期间大布乡又是五桂山抗日部队的后勤基地。五区伤病员总站设在大布乡，潘仲任总站站长，下属有桥头、乌石、平岚、鸦岗、雍陌、平湖、沙岗以及白石等乡。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总站再分到各分站的伤病员有百余人次，大布本身也设有 9 个点，分布在孙茂康、林康彩、容国庭、汪玉华、朱杰光、朱文化、林石卢、柯汉生、梁豪等家中。此外还有交通站，郑少康家是部队联络站，张萍（莲村）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站。这些站遭到敌人盯梢、抄查、恐吓，但他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勇敢机智地去完成任务。粮站、税站、情报站也在这里设有分站。他们成为部队坚实的后勤基地。

大布民兵还协助主力部队侦察打仗。从 1937 年七七事变起，他们就开始活动，人数常保持 20 人上下。1941 年起，直接配合五桂山部队执行战斗任务，重要的有：

1943 年协助侦察伪联防大队长郑东镇。在珠纵副司令员谢立全亲自主持下，到大布柯凤巢大屋和村后果园研究敌情和侦察。民兵为他们放哨，先后两次分别由郑世雄、郑世杰引路到茶楼，察看郑东镇的相貌，孙一之还亲自到郑东镇家里“拜访”他，观

察内情。这次行动，对后来打入郑东镇住所、谢副司令员亲自在他的地窖里认出并活捉他，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以大布为主联合三乡民兵组成有 30 多部车子的自行车队（后来人们称之为土机械化部队），协助主力部队远道奔袭古鹤伪军。他们以娴熟精练的车技，将战斗部队的指挥员及轻重武器，像天兵一样神速地降落在伪军面前，把敌人一个多排，连人带武器全部解决。并没收伪军一批稻谷，由单车队运回，一半给部队，一半分给群众。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到附近伪军耳中，使他们人心惶惶，每当夜幕一降，无不提心吊胆，唯恐大祸不日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果然事隔半月，我部队又以同样方式奔袭萧天祥部，取得全胜，大大鼓舞了群众。

1944 年，敌人分四路围攻五桂山，此时正值上级领导在石门开会。战斗一开始，司令部为确保领导安全，派了一主力连，把他护送上五桂山靠五区的顶峰上。事后，部队正拟下山向五区转移。不料时至晚 8 时，驻马溪的敌人仍不撤走。这时五区部队联合马溪、大布民兵，一边送饭给部队同志吃，一边侦察敌人，安排部队同志安全撤离五桂山。领导研究后，同意这一行动，决定在天亮前转移到丫髻山，由五区部队和大布派出民兵警戒岐关西路两端，同时派向导引路绕过马溪敌人，径直从大布村旁经三乡转移到丫髻山。结果天亮前上级领导干部和连队以及非战斗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一次行动，马溪、大布民兵立下了功劳！

六、抗日民主政权成立

1943 年至 1944 年间，五桂山武装斗争取得一连串的胜利，解放了四、五、六区一大片土地，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随着谷镇（即现在的三乡镇）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大布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孙一之被选为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秘书长，兼大布乡乡长，郑世雄被选为集结队队长。这标志着大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流血战斗，第一次赢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硕大果实，世世代代受尽封建专制和国民党专政压迫的人民第一次获得真正的人民权力，为自己的乡民

服务，公开地、更广泛地为抗战服务。

乡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发动群众减租退押，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回被剥夺去的利益，同时，抗日民主政权还向伪政权发出警告，以后再不准在抗日民主政权辖内征收伪军谷。伪政权果然不敢妄为，群众又得到一个实惠。

乡里的民兵改称集结队，在区政权统一指挥下，随时准备接受战斗任务。此刻是首先保卫好部队，在这里设置各种后勤站，特别是伤病员站，保卫伤病员的安全。

1945年“五九扫荡”开始，他们的工作更繁重。如保卫粮站，及时将粮食送到部队，保障部队的给养；协助五桂山区疏散非武装战斗人员到平原各地隐蔽，减轻主力部队的负担；配合区集结队在平原区牵制敌人，骚扰敌人驻地，使敌人无法集中力量到山区攻击我主力。

这个政权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发挥作用。他们组织以朱杰光为组长的一共8个成员，建立兵站，专输送新兵到山区去。同时还建立交通站、粮站、税站，接受人民向部队缴纳爱国粮和各种税款。此外还有情报站等。他们先后动员了16人参加五桂山武工队。在这段时间，光荣牺牲在战场的就有5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部队北撤。国民党跑回来抢摘抗战的胜利果实，这个人民政权也就被扼杀了。政权存在时间虽不长，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又经受激烈残酷的“五九扫荡”的严峻考验，民主政权的干部不仅坚强，而且取得人民民主执政的经验，为解放后建立人民新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乌石乡妇女会在斗争中成长

□郑建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伟大号召下，我于1939年9月在中山三乡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当地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和做战时服务工作。1940年3月，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我的家乡，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由于战乱，我暂到澳门掩蔽。4月初，我随吉叔（郑吉，中共党员）一起返三乡。不久，吉叔让我当交通员，那时的区委交通站设在大布村区委领导郑少康家里。我以耕田掩护送情报和联络等工作。

1941年底，组织上让我回三乡乌石从事妇女工作兼任交通员。我回乡后，找到原抗日先锋队的陈萍、郑莹、郑佩华、郑兰卿、郑琼等人商量，彼此加强联络，以6人耕田小组形式作掩护，开展工作。

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山武装部队进入山区，开辟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经济给养非常困难，经常缺粮，有时以杂粮甚至野菜充饥，要与日、伪、顽作战，须要自行生产来解决。当时，地方党组织在三乡动员各方用人力物力去支援部队。我们6人小组积极响应，率先租了7亩水田耕种，当年收成的稻谷，除了交租和必要的成本外，全部交给了游击队，自己回到家里吃饭，不拿一粒粮食回家。虽然生活有困难，但心里是甜滋滋的。我们还发动村里的妇女多种杂粮支援部队。我们以耕田小组为核心，逐步把乌石乡几十个妇女串连起来，60多人参加了妇女会。我也在工作实践中得到磨练，提高了对党的认识，于1942年12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5月，游击队攻打无恶不作的日伪傀儡伪三乡联防大队，一举歼灭了伪军百多人，活捉了大队长郑东镇。在这次战斗之前，我们妇女协助提供敌情，事后又收集群众反映，大力宣传我军为民除害的行动，激发和鼓舞了群众抗日斗争的志气和决

心。此后，山区武装抓住有利时机，运用统战策略，由部队派人出面，把乌石乡、平岚、桥头三乡的乡长和圩仔商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组成的三乡联乡办事处的灰色政权。后来又以这个机构筹组和通过代表大会选举建立了谷镇区和各乡的民主政权。乌石乡也公开成立了妇女会，我被推选为乌石乡妇女会会长，邓惠珍（侨眷）为副会长。由三乡地方党负责人郑康明领导我们妇女支部工作。当时，我们一方面积极配合支援武装组织活动；一方面以群众面目出现，抓紧教育培养发展党员。我们妇女会几个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围绕联乡办事处和民主区乡政权各个时期的中心要求，分工负责，深入各个家庭中，向妇女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减租减息、扶助工农、保护工商业等政策主张，动员她们行动起来响应党的号召。乌石乡妇女会亦因此不断发展壮大，从初时只有青少年女子参加，发展到各阶层家庭的中年妇女都入会了。如郑金婵母女2人参加我们妇女会后，还把其家作为地下组织开会活动的场所，并为我们通讯和放哨。缝纫小手工业主郑秋叶，除经常为部队的战士缝缝补补外，还以她的店铺作为传递信息的联络点。女医生刘幅超，经常赠医赠药为部队诊治伤病员，甚至接生、托儿，解决一些女战士的困难。我们还发动、号召妇女大力支持扩军参政工作。妇女会副会长邓惠珍是一位侨眷，在党的感召下，带头把其年仅16岁的儿子郑达明送去参加部队（郑达明后来在粤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随后，我、郑健、郑兰卿也动员了各自的弟弟参加部队。在骨干的带动下，一些青年妇女也参加了部队，有些当卫生员，有些当炊事员，还有些在米站工作。就这样，在乌石乡掀起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的参军热潮。

为了配合部队伏击歼灭日、伪军，我们常发动妇女们与男民兵一起连夜破坏公路，毁坏桥梁和剪断沿公路的电话线，使日、伪军车队受阻不能随意进退。还有一次，部队攻打神湾冲口土霸黄祥，缴获大批粮食物资，我们马上动员大批妇女会会员前往把粮食抢运回来。此外，妇女支部派出郑莹与刘斯行以教师面目作掩护参与乡民主政权工作，又分别安排孙霞芳、陈萍二人在圩仔镇筹组商会和民校工

作。这些女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表现很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抗日民主区、乡政权刚建立不久的1945年5月9日，日军一〇三师团勾结伪军四十三师及顽军共5000多人，大举向山区和平原地区全面“清乡”“扫荡”（“五九扫荡”）。之后，叛徒郑兴竟带着顽军萧天祥部，配合日、伪军到处搜捕我党政人员及进步群众，把全乡的群众除老人小孩外，所有男女都强迫集中到“安静祠”的地方，边用枪托推撞，边吆喝众人排成长龙，由叛徒郑兴逐个检查审问，追查抗日民主政权成员和妇女会干部的去向和活动情况。当时气氛异常紧张，幸亏我个子矮小，且郑兴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我的身份，可谓有惊无险。由于事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已作了严密的布置，通传乌石乡每个妇女会员不要泄露乌石乡有妇女会组织。虽然郑兴这些坏蛋声色俱厉，极尽威迫利诱之能事，在这危急关头，我和邓惠珍副会长及50多名妇女会员，都沉着镇定应付，一问三不知，团结得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变节或泄露有关我党、我区民主乡政人员及妇女会组织人员情况，使这些家伙终于一无所获，无奈只好把我们分批释放。

乌石乡妇女会组织在这次残酷的斗争中，每个妇女会成员都表现了意志坚、觉悟高，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始终不畏强暴。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女战士郑秋叶不幸被捕。虽然叛徒郑兴掌握了她与部队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但尽管凶恶的敌人酷刑威逼利诱，她宁死不屈，不向敌人低头吐露半点实情，英勇舍身就义。她是中国妇女的英雄！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有诗为证：

（一）

罪恶滔天日伪顽，三乡处处逞凶残。
横眉冷对千夫指，姐妹同心闯鬼关。

（二）

卸下红妆揭义竿，金花六朵不辞艰。
送夫送子送粮草，猎猎红旗五桂山。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回忆抗战时期云衢中学的革命活动

□欧素英

我们的母校——云衢中学，创始于1809年，至今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校址在中山四区南朗大岭头村前，当时叫云衢书院，后于1905年废科举，办学堂，改为云衢高等小学。在四大两都热心人士的资助下置有固定校产170多亩，收租办学，培育学子，是一所历代人才辈出的名校。

1942年，我在安定村小学读完初小四年级，转入云衢小学读高小，两年后，和插班生李俊驹、方若愚、李文彬、陈润聪、程慕贞等，在云衢小学毕业。时逢日军侵华，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南朗榄边一带学子，无法升上中学。后得热心人士支持，1944年把云衢小学改为云衢中学，校址迁往南朗亨美村程氏大宗祠，我和以上同学一起，及时地升上云衢中学。3年后，成为云衢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在毕业的聚餐会上，我们含着依依不舍的泪水，唱起了《友谊万岁》这首歌，老师最后说了一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全班20多位同学，从此升学的升学，出国的出国，各奔前程了。

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可喜的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在国内工作的，都分别成为国家机关处局级干部或事业企业中的骨干分子。有的在美国开餐馆，或当上了工程师。在香港创业有成的李俊驹、方若愚和著名会计师太平绅士李文彬同学，3位都先后光荣地被选为中山市的名誉市民。我们爱国、爱乡、爱校的精神，是从小受老师教育培养起来的，是与当时的抗战环境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云衢中学当时的革命活动，曾使日伪汉奸震惊和愤怒，日本驻军头目吼叫：“云衢中学是赤化中学，上至校长，下至杂差，通通杀头”。

一、日军暴行，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我在安定小学读书时，中山县已成立抗日宣传队、校护队，学校程志坚老师和方群英同志，在南朗圩头点着汽油挂在树上，手拿着摇铃集会，宣传抗日道理，我是基本听众之一。程志坚正义的、激昂的演说，启发教育了我们去卖花筹款，支援抗日。不久，日机轰炸安定小学，幸得老师及早带我们去山上树林躲避，才幸免于难。从此，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复仇的种子。

中山成立了抗日义勇大队后，日军和伪军恨之入骨，在南朗一带设关卡，检查过路人，同时“扫荡”山区的游击队，实行“三光政策”。在白色恐怖下，抗日游击队更需要地下情报。程志坚老师托人叫我去田边村小学见面，教我把字条包在手帕的一角，遇到敌人搜身时，把字条咬下吞到肚里去，我顺利地送到涌口村黄英同志处。以后程老师通知我到左步村欧初同志已婚的妹妹家，给我填了一份表，从此，我成了平原交通员。她叫我把信送到李屋边村，参加来自附近村庄小学老师（游击队派出）10多人的集会。当时，天色已晚，我没衣服换，张卿同志借件衣裳给我，穿起来拖地，崖口来的女同志说：“小鬼！给你一条草绳，束在腰上就行啦！”会上发言很热烈，轮到我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按程老师常说的两句话：“救国至上！抗日至上！”大家给我掌声，表示鼓励。以后，每当我接受了交通任务，赤着双脚、戴上草帽，独自走在陌生的田野间、村道上，心里都会涌上一股勇气：“我是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我是抗日一分子，死了也甘心”。

1944年4月4日，有位女游击队员带我入山区探望哥哥，走到流星队时已天黑，住了一晚，第二天爬山涉水，到大部队所在地，见到树林中操练的哥哥时，他叫我快回家。当时我看到清溪水畔，女同志边洗衣边唱歌，有的双手捧着山花，我如入画境，激动地说：“哥哥！我也参加游击队，我不回家了”。当他把我带来的挎包、鸡蛋、年糕收下后，转了转来说：“大队长说你年纪小，留在平原掩护同志也是革命呀！”回家不久，部队派一位女同志叫郑英，住在我家，我对父母说：“她是我的同学，因家

穷停学，年纪大，南路来的插班生”。（编者注：欧素英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则称，郑英是她的老师。）

二、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

云衢中学的所在地——南朗，是岐关东路的咽喉，五桂山区的出入口，每逢二、五、八圩期，是石岐小贩和当地农民买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也是日军伪兵的重点驻守地。

作为当地最高学府的云衢中学，是教育学生、宣传抗日的重点。游击队派来的周宇老师，年轻机灵，态度和蔼，学生和校工都暗地里保护他的安全。周老师上课时，黑板上写满化学方程式，以此掩护他上政治课。当守在门口的校工吹响口哨，我们知道日本宪兵或特务来了，马上收起笔记，把化学课本摆上台面。站在窗口的敌人，探进头来看见是在上“化学课”，再到各班巡视一番，毫无收获，只得耷拉着脑袋离开。校工又吹响了长口哨，我们知道敌人走了，周老师继续讲什么叫享乐人生观、宿命论人生观、革命人生观。此后，班里组织了读书会，我借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后来又看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持久战》等。为了收藏方便，这些进步书籍都分装成小册子，交给校工放在厨房作废了的烟管里，敌人不易搜获。那时候班里有6位男女同学与周老师一起在校食宿，师生间、同学间互通情报，互相掩护。我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三、练习歌曲，参加祝捷大会

抗日游击队经常打胜仗，从日伪、汉奸、土豪劣绅手上缴获很多胜利品，有轻重机枪、子弹和衣物等，此时就举行大会。有次在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秘密地摸黑步行到合水口里去参加慰问演出。会场上坐满了持枪的游击战士和群众，四周点着煤油大汽灯，主席台上挂起“祝捷大会”的横幅，歌声此起彼伏。过一会儿首长来了，我看见了大队长欧初、滨海区区长吴子仁，还有我的启蒙老师程志坚。在学生的心目中，欧初是大家敬仰的抗日英雄，平时不容易见到的，现在见到了心情特别激动。首长讲话

和鼓励立功的同志后，演出开始，都是短小精干的节目。我们因日间上课，晚上有时候到附近村庄宣传，没有时间排剧，只是上台唱了平日练熟的《喀秋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兄妹开荒》等几首歌曲。祝捷大会尽情欢乐的场面，把我们从白区带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回去时，部队派人护送，将到西村口时，我们散开，两三人一组，赤着脚，踮起脚尖走路，避免引起狗吠，引起敌人注意。当大家小心翼翼安全返抵学校时，走廊里吹来一阵阵夜来香，把我们那种紧张、恐惧的情绪吹得烟消云散了。我不敢半夜回家，睡在女同学温惠霜的宿舍里。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我闻到夜来香味，都会想起那些既兴奋、自豪又紧张、恐怖的夜晚。

四、秘密联络点定在我家

中山抗日游击队，经常袭击日伪汉奸，受到人民拥护，队伍不断扩大，在经济上需要各方面支持。我父亲欧仁普原是爱国华侨，当年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在加拿大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同盟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革命。他从加拿大回来之后，继承父业经商，被选为南朗商会负责人之一。经过大家商议，由每间店铺按月捐款支持抗日，他们主张把这些捐款集中放置父亲经营的浩隆五金店，由游击队派人按时来取。父亲说，欧初是我叔侄，儿子欧章又参加了游击队，我家目标太大，怕坏人告密不好办，商会同仁表示设法保护我家安全。父亲为了抗日，不顾全家六口人的生命危险，决然答应下来。从此，部队每月派大班胜（泮沙村人）手撮藤篮，扮成顾客，和我父亲聊几句，喝杯茶后，走进店尾房间，父亲从楼下来给他点数。此时我和母亲，分别到店前店后探看，没有可疑的人叫他从铺尾走，经新田地、西村返回部队。可能由于我父亲人缘好，在那恶劣的环境下未出过事。

可是有一次，把他吓坏了。起因是日、伪通过收税的密探，蓄意盘查从五桂山区出来销售农副产品的客家人，从中找出为部队采购伙食的人员。于是，部队派李郁军等几位同志趁圩期出来，惩办密探。郁军是我舅母的侄儿，和我哥哥一起参加游击队，他

到我铺饮了几杯茶后，看准日军巡逻队换班时间，突然从铺尾箭步跑去新田地转至圩尾，正好看到那密探在客家人摊前收税，他上前一手抓住其衫领，拖到闸门外，拿出匕首说：“你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中山抗日游击队派我来执行你的死刑”。话音刚落，那密探即血流满地地倒下去了。此时，鸡飞狗走，日军闻讯冲来，子弹乱飞，李郁军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安全归队。父亲看到郁军在我店刚走，就发生此事，怕坏人告密，全家抄斩，惶惶不安。我安慰他说：“清除败类，大快人心，没事的，放心吧！”其实我心里也很担心。

五、敌人疯狂反扑，我差点被捕

抗战期间，侨汇不通，几家五金店生意不景气，父亲与友人合股改为和丰杂货店，我家搬往新田地另租屋住。此时伪区长何文中，已掌握南朗几间赚了钱的商店，企图绑架商人，然后勒索巨款逐个赎回，发一笔国难财。怎料遇上日军的杀人王，于1944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凌晨，几百名日军包围南朗圩，把从梦中惊醒的商人及店员押往西极山，黄昏时刺死刺伤30多人，我铺的3位伙计，被刺死1名，重伤获救2名，店铺清货倒闭，赔偿抚恤金和医药费。我家又搬回铺里住，父亲又遭第二次破产。

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节节胜利，中国大地曙光已露。此时，当地日军欲向我云衢中学下毒手。为避免损失，学校关门，学生停课在家。我哥欧章因随部队攻打石岐伪四十三师，脚部负伤，在家休养。

为了消灭反动派，珠江纵队派出武工队去麻子村攻打反动头子梁雄据点炮楼，整座炮楼炸毁了，梁雄外出未被炸死。第二天，梁雄出动大班人马，由榄边一直搜索到南朗，声言要活捉欧初的人。爸爸和弟弟跑去西村朋友家躲避，哥哥欧章因为脚伤走不动，只好扶着 he 到铺尾水田中的草棚隐藏，我和妈妈则守在店中。不久伪中队副陈惠芳带着30多人，用重机轻机架在店门口，气势汹汹，扬言非抓欧章不可，他们一伙搜遍楼上楼下，大瓦缸、水井都找不到我哥哥。陈惠芳恼羞成怒，抓住我的右手，说我是南

朗圩妇女会长，“云中”学生会主席。妈妈急着说：“她是学生，从未离开过学校，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怎能当会长主席呢？你们误会了！”但陈惠芳一定要我去大部队问话，30多个伪兵围着我走。妈妈追着说：“你们带她上石岐，我也跟去石岐。”结果走到大部队门口时，有人站在晒台上发问：“抓到什么人？”陈惠芳答：“欧初的人，老八。”紧跟在后面的妈妈抬头一望，原来是伪中队长欧康（我家左步村的邻居，奶名帝有）。妈妈质问道：“帝有叔，你们为何要抓亚云（我的奶名）。”欧康马上跑下楼来，看到我们母女，即说：“误会了！误会了！”陈惠芳坚持说：“她是欧初的人。”我妈高声反驳：“她是学生，全南朗圩的人都敢担保她。”欧康解围说：“伯母，没事了，回家吧！”过后我问妈妈，欧康为何对我家这样“优待”？妈妈说：“他父亲吸鸦片，5个儿女，他母亲朝来我家借钱，晚来我家要米，要是不放你，我会当众叫他想，他父亲死时谁给钱买棺材的？”

六、坚持斗争，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地下党组织继续领导我们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1949年，我正在石岐读高中，地下党组织本来安排我去五桂山游击区接受训练，迎接解放的，由于从南朗搬到茶东村的四区中学（前身为云衢中学）出了事而改变了。因该校体育教师刘传敏，私自带领一群学生去他家乡春阳，暴露了学校地下团组织，家长哭哭啼啼，要儿要女，反动乡长陈惠芳用机枪对着学校，吓唬师生，地下团组织涣散。此时负责四区地下工作的谢秉才同志对我说：“四区中学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进步老师陈建中只是民盟成员，你是云中毕业的学生，熟识当地情况，组织决定派你回去负责四区团组织工作，又兼‘徐州’（即翠亨纪念中学的代号）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榄边小学老师。”我服从革命工作需要，藉着执教3个月的时间，恢复了四区中学地下团员的活动，联系了团员陈佩诗、黎明亮、阮志远、李素霞、陈润梅、程连沛、程少奕等。因陈佩诗的妹妹是我的学生，我便以老师身份去家访，

晚上住在楼上，按上级发下来的内容，通宵达旦写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标语，黎明前用绳把标语和浆糊从窗口吊下去，给黎明亮、阮志远、程连沛、程少奕等男团员骑单车去张贴，上至土草朗，下至崖口一带。第二天，四邻八乡赶集的人们看到标语后纷纷说：“昨晚游击队回来了！”“解放军进城了”。

此时，国民党节节败退，纷纷往澳门方向撤走，沿途各站都有一堆堆疲惫不堪的溃军。一天黄昏，我接到情报要马上送往“徐州”，团员程少奕即用单车载我前往，刚到翠亨车站，停在那里的溃军看到我们就开枪，我们只好扭转车头走，子弹在头上乱飞，我叫少奕走曲线避开子弹，安全回到南朗。我对着喘气的少奕说：“我们也算是经过枪林弹雨的一夜了！”第二天一早，纪中地下党派来南朗采购伙食的校工找到我，对上暗号，我把情报给他带回去。其时纪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是曾海波，解放后在石岐一起开会，他站在我后面，轻声叫着我的代号“小央”，我回头一看，他笑着说：“每次送往纪中的情报，我都收到了，谢谢你！”

（选自《中山党史》1998年第2期）

三角乡革命活动的回忆

□吴振明

一、培训中坚力量，播下革命种子

大革命时期，三角平安村青年梁苏仔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后返乡秘密组织“犁头会”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不久病故，成员有陈灶九（居安村人）等人。

1939年我受三角小学教师唐仁明（地下党连级干部）的教育，常常参加演话剧、出墙报等抗日宣传活动。唐先生还帮助进步学生组织“中坚学社”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救国救民的道理，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种子。

唐先生又分批介绍中坚学社的同学到革命部队中去，接受培训和锻炼，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首期受训的有梁泰猷、袁煜煊、梁杰等，后来他们都成为我乡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

1944年春，我和周森、袁东柏、黄联方、吴应怀、陈孔朋等到牛角西河（阜沙镇卫民2队）参加九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同班学员还有容丁、纪华、一鲁等，班内负责政治课的是蔡雄和郑文同志，负责军事课的是梁冠同志，欧初同志也常来部队指导工作。

在学习期间，生活是艰苦的，餐餐吃番薯饭或蕉饭，夜晚宣布有情况，便要迅速整装转移，但也常和当地群众开联欢晚会，大唱革命歌曲，生活是愉快的。

结业时，蔡雄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后，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有条件的可以组织自己的武装队伍，狠狠打击敌、伪、顽等反动势力。我们带着首长的殷切期望和一股革命热情，回到了三角地区。

二、浴血奋战，痛击日伪

当时，革命部队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周围驻有大批国民党

军队，我们既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抗日，又要对付日本仔和伪军的“围剿”，形势是十分恶劣的。在恶劣的环境下，如何迅速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狠狠打击敌、伪、顽呢？当时部队能正确执行党的区分敌、友、我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使革命部队能由小到大迅速发展，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浮圩岗战斗和老河口海战，是九区部队主动出击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消灭了一批日军，使敌人闻风丧胆。

沙栏圩和独岗两次战斗，都是郭苏永部队出击伪军在三角的据点，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既消灭了敌人，又扩大了革命部队的武装力量。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浮圩战斗，杨日韶中队长与王鏊副中队长壮烈牺牲了；独岗战斗，纪华为国捐躯，林炽晃（东会村人）在孖沙海执行任务时遭敌人袭击阵亡。1944年春，部队派出年轻妇女干部来三角以教师身份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被两个用船运石沙的小偷谋害，还被抛尸竹围涌里。

但是同志们并没有被残酷的斗争所吓倒，为了革命事业，前仆后继。

三、团结抗日力量，武装革命队伍

沦陷时期，革命队伍的番号都是挂国民党招牌（挺三，又称民利公司），郑文同志说：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要顺利地开展工作，可以在友军处领取番号。

1944年冬，郑文同志为了尽快发展武装，协助吴应怀建立了一支武装。他带领梁泰猷、袁煜煊、梁杰、吴应怀等人到四支队一大队黄旋光家中，领取了一个小队番号，并安排我任小队副。

1945年夏，国民党军突袭九区部队，梁泰猷被迫伪装撤退，在文明路上，吴应怀发现了他，巧妙地掩护他安全到达黄圃平安药房叶义方（中坚同学）处暂避，晚上吴应怀和我曾到药房楼上探望他，并动员他伺机返回三角暂避。

1949年夏，梁泰猷奉命返回九区工作，在三角南洋树约我

去见他。他要我动员吴应怀献械支持孖沙主力部队，我返后将上级精神传达给吴应怀，并和他分析当前革命形势。吴应怀便把捷克轻机 1 挺、七九步枪 10 余支、快制驳壳与左轮手枪各 2 支，交给我带到孖沙交给邓永年与肖权同志。

四、建立统战政权，掀起革命高潮

九区事变后，三角的革命活动，曾经出现短暂沉寂，当时日寇已投降，上级总结经验教训，分析了三角的斗争形势，认为三角的反动势力虽然猖獗，但群众基础好，有利于发动群众推翻反动势力，争取合法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1946 年到三角活动的地下党，一方是中顺边区工委方群英同志领导的，以三角小学为活动基地；一方是五桂山的中山特派室黄旭同志领导的，以梁泰猷、司徒洪等同志为骨干在三角活动。两股革命力量虽然都是单线联系的，但在上级党的统一领导下，双方在革命工作中都能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7 年秋，梁杰同志接中山特派室梁冠通知：为了在三角建立统战政权，命他请较有威望的学习班同学黄联方前往五桂山接受指示。回来后，黄联方竞选为联保代表主任，并发动部分中坚学社的同学，竞选保长；三角小学党支部同时发动社会青年与高年级学生投票选举年青较开明的简涛当乡长，取代了顽固派黄富乡长职务。1948 年又争取到袁煜焯出任自卫大队长职务，这个改变，对三角乡的革命活动十分有利。

首先三角小学校舍和班数增加，吸收了一批在广州、东莞、顺德等地白色恐怖下难以立足的进步教师来三角小学任教，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先后有郑迪年、黎朝华、邓绍明、张晴等）。

通过办夜校学文化的合法活动，开展革命宣传，学校派出赵直和黄文海等人到我家中和杜家祠开办两班夜校，组织青年接受党的教育，学生中后来当支部书记的有梁广、陈勤等，当村干和民兵的有 10 多人。

在周森同志的带领下，在学校组织前锋读书会，由党支部直

接培训教育，发展了党组织，并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何述源、吴玉棠、罗鉴明、吴桂棠、吴联科、袁坤正、陈顺开等，并输送一大批青年参加五桂山革命工作。

顺利开展抗“三征”宣传活动，以邓永年、梁泰猷、司徒洪等领导在北宁社召集有沙栏、三角、横档、浪网等地百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会后各地掀起了抗交田赋和反征兵等活动。

1949年秋，由司徒洪同志领导，在志勤商店交通站，分发传单到各村各个角落，并将全乡自卫队枪支烙印，发动民枪登记烙印，组织有近200名起义军，并分村登记交通船艇，做好迎接大军南下解放的准备工作，同时梁泰猷、司徒洪、郭苏永等同志，在三角小学公开成立中山九区支前指挥所。

1949年10月迎接两广纵队，军民庆祝胜利解放九区大会在三角小学隆重召开。

（选自《中山党史》1998年第3期）

记九区妇女反“三征”斗争

□方群英

1945年冬，上级党组织把我从中山五桂山区调到中山九区去恢复该地的党组织及开展妇女工作。当时，领导我工作的是中共澳门、中山副特派员高李（即罗光连，现名罗明林）。他给我介绍工作关系时，我负责的工作地区是中山九区以及中山三区一部分，还有顺德容奇的坝头市，共计15个有中共党组织的工作点，有党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42人，其中男党员24人，女党员18人。女党员全部分布在中山九区的牛角、波头、孖沙、濠深、将军庙、吉昌、阜沙、民众、旺角、沙栏、低沙、三角等各个点中，占九区全体党员数的56%，而在女党员中的63%原来又是属部队党组织领导的。她们在战争中都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和锻炼。

无论在烽烟弥漫、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或者是在我们部队进行休整训练的时刻，这些女党员都关心着我们每个战士的一切。她们听到枪声一响，个个不顾自身安危，积极投身战斗中去，各人根据自己的所长，千方百计地支援部队，有人担负通讯联络，有人负责担架运输，有人输送弹药，有人送饭送水。家里的婆婆、阿婶也帮助战士们收藏文件、资料、日记本、衣物、鞋履等，竭力做到不失不漏。在平时，她们又为指战员们找柴草，煲凉茶，煮粥、煮饭，护理伤病员，帮战士们洗衣服。当我们部队战斗胜利归来时，她们立即筹集蔬菜、鲜果，你挑糕点，她挑鱼肉，组织妇女劳军。

在解放战争时期，九区广大妇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支持我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与国民党进行顽强斗争的动人事迹是很多的，这里只谈一次大规模的反“三征”请愿以及武装反“三征”的斗争两件史实，希望这些史实能对后人有所益处。

浩浩荡荡的反“三征”请愿斗争

1946年早造，低沙、牛角一带遭遇洪涝，农田严重失收，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农历九月下旬，九区地方势力梁正属下的中队长大刀林，向高佬惠承包了低沙的田赋税，每亩要征38.5公斤谷。然而，低沙和牛角的农民，因早晚两造都失收，连生活都难以维持，根本没法交税。因此到农历十月开始收割了，大家完全没有交税。大刀林就派他的爪牙到低沙强行抓走了3个农民兄弟。梁自带也派他的爪牙到牛角、卫民抓走了4人。由于国民党地方势力到处抓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低沙党小组的负责人梁建荣（即建叔，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立即召集党小组会议，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决定到大黄圃国民党中山九区区府请愿。牛角党组织的负责人苏英（女）也在低沙一带动员群众进行请愿斗争，她提出要同低沙的农民兄弟配合行动、互相响应，认真动员和组织力量，前往阜圩向梁自带支队进行请愿斗争。

苏英与梁建荣密切联系，共同研究了这次请愿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大家一致认为：（1）这次请愿规模和声势要大一些，面要宽一些，不仅动员低沙、上、下牛角的人去，而且要动员将军庙、滘深、孖沙、南头等地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一起去。（2）要求各党小组和每个党员，分工动员基本群众骨干，特别要做好妇女骨干的工作，教育每个基本群众的骨干要做好自己家人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多动员一些婆婆、阿婶、嫂子等带着孙子、背着孩子去。（3）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对老婆婆、阿婶的教育宣传的内容是：早晚造水灾严重失收，大家无法生活了，一亩田收我们38.5公斤谷，哪里还有我们吃的？他们今天捉了我们低沙、牛角的人，明天可以捉将军庙的，后天可以捉滘深、孖沙的。我们农民兄弟姐妹一定要团结起来，要反抗，要斗争才能活命，才能生存。（4）分别做好“白皮红心”保甲长的工作，通过他们进入国民党九区区府，递交请愿书。这次请愿的目的是：第一，立即释放被捉的人；第二，今年因水灾严重失收，要免收赋税；第三，保证以后不再捉人。在请愿斗争中，放人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田赋税即使不能全免，最少也要免一半，以后再想办法继续进行

斗争。我们提出的要求如果不答应，大家就坚持不走。明确后，各自就分别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梁建荣召集低沙的妇女骨干冼自好、陈会月、梁运、冯嫻宽、阿女、阿贤等认真进行动员。吴勤仔（中共党员）到将军庙召集基本群众的妇女骨干梁月好、徐玉、何有兰、梁金顺等认真布置工作。孖沙由黄锡和（中共党员）召集梁义娣、文公娣、锡和娣、金胜娣、丕和嫂等开会进行宣传、动员和布置。牛角方面由苏英召集党小组的周细妹、黄带好等作了具体的部署，并由他们分别召集冯妹好、吴财好、黄连好、谭欢颜等 20 多个妇女骨干分子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预定请愿的日期到了，低沙出动了 300 多人、将军庙 200 多人、濠深、孖沙 100 多人，南头（包括华光庙、观音庙、北帝庙一带）由建叔领队，有四五百人参加。正午前，这 1000 多人的请愿大军从各个地方陆续到达目的地——大黄圃。牛角方面，上半角出动了 1100 多人，下半角也去了 800 人左右（当时的上、下半角总人口是 4000 人左右），整个牛角地区的半数人口都参加了这次请愿。其中不少老婆婆带着孙子，阿娣背着孩子，好些中年寡妇也参加了。这两支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人人手执一支写有“今年水灾失收！”“我们没得吃！”“要求立即放人！”“要求免收七十七斤谷”等标语口号的三角旗仔，把国民党中山九区区府及阜圩梁自带的队部团团围住！

这两支请愿大军都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表向九区当局及梁自带支队部递交了请愿书并进行交涉。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下午一时、二时、三时过去了，请愿的人群都没有吃中饭，甚至连水也没得喝，许多小孩子在大哭大闹。请愿群众不断高呼口号：“不放人我们坚决不走”“不免收田赋我们坚决不走”。人群的情绪越来越激愤。高佬惠、梁自带等看到群情不断高涨，怕把事情闹大了，都先后适当地答应了请愿代表提出的一些要求，被捉去的几个农民兄弟姐妹立即得到了释放。请愿斗争胜利了，大家满怀喜悦与被释放的几个农民兄弟姐妹一同返家。事实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共产党领导，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农民的痛苦和负担才能得到减轻。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请愿以后，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再也不敢到低沙、牛角、将军庙、滘深、孖沙、南头一带催收田赋抓人了。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仅教育了低沙、牛角一带的农民群众，而且鼓舞了九区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国民党的“三征”暴敛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牛角党小组开展武装反“三征”斗争

1947年晚造，国民党地方势力高佬惠部的大队长冯北星部属的一个中队长“鸦鸠带”，勾结土匪梁锡开和冯才官承包承收了牛角的田赋税。他们向高佬惠每亩缴交25公斤谷承包，向牛角的农民则每亩征收40公斤。我们的一位“白皮红心”乡长谭裕胜获悉此情况，立即告知牛角党小组的负责人苏英。

苏英得悉后，立即召集牛角党小组的全体党员和武工队的冼荣仔、吴观友等商量，经过讨论。大家认为：采取夜袭，实行武装反“三征”。由苏英负责召集上牛角的周奕妹、冯妹好、梁旺才等妇女骨干进行动员和布置工作。武工队由冼荣仔和吴观友负责发动和组织力量。下牛角则由邓妹仔（女）负责串连发动妇女骨干。还印制一批传单，布置一批群众骨干有意识地大造舆论，说欧初派了一队人马回来了，是专门对付收田赋的。在哪里宣传，就在哪里散发、张贴传单等等。

经过一系列的动员和布置之后，行动开始了。苏英叫周日泉先把北闸的闸门关起来，称明天要割禾，不能放水进闸。实际上就是要把国民党中山县政府所租用的四五艘协助驻牛角征收田赋的征收“大厅艇”关在闸内，实行“关门打狗”。同时，留出罗松头（靠近北闸罗松围的一条路）让国民党的征收人员逃走。开始袭击时，我们的武工队分4路，东面由梁鉴荣率几个队员从下牛角东闸上，南面由周日泉、冯锡森带了10多人从正河出击，西北方由冼荣仔带几个队员由上牛角下，北面由梁根仔带了10多人从阜安出击。以上4队人马都只是配备了几支长短枪。半夜，大家看到吉昌与宝生围交界处的“征收田赋总棚”燃起红红的火光了，南面正河那边由冯锡森打响了第一枪，接着四面八方都响

起了枪声。一批妇女骨干分别在几个地方同时把点燃的一串一串“电光炮”放进洋油桶里，连续“嘣嘣”“嘣嘣”地响，远远听到，真的像打机枪一样。征收“大艇”上的人非常恐慌，争相逃跑，其中有一艘船翻沉了。第二天一早，一批妇女骨干按预先布置好了的，分别在大黄圃、南头、鸡笼、港口、民众一带散发了大量的传单。这天正是北闸的圩期，赶圩的许多人都拾到我们的传单，大家议论纷纷，说欧初的人马又回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又不好过了。这个消息很快便到处传扬开了。

此役后，冯北星、鸦鸠带及其爪牙都害怕起来，再也不敢派人出去催收田赋了。这次武装反“三征”斗争我们又取得了胜利。

（选自《中山党史》1999年第2期）

纪中党团活动回忆

□张汉文

1947年秋，上级党组织派中共党员曾海波到地处中山游击区边缘的翠亨村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简称纪中），以地理教师身份掩护展开工作。此后，曾海波同志在纪中积极发展党员，该校至1949年10月中山解放时，发展了地下共产党员20多名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解放后改为共青团员）80多名，党团员数占全校人数四分之一，并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本人在1948年10月由曾海波老师介绍，以罗光祖的化名参团，翌年2月转为党员。

1949年7月，中共珠江地委决定成立中共中山县第四、五、六区中心支部（1949年7月改为联区区委），委任该校曾海波同志为书记。

当时，上级党组织规定纪中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广大师生，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团组织，培养干部，为迎接中山解放做好准备。具体工作有三方面：一是加快发展党团组织；二是配合和支持山区游击队；三是为迎接中山解放从舆论上和组织上做好准备。以下是回忆当时地下活动的一些片段。

（1）发展党团组织方面，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活动。凡先参团的，经过短期的观察和考验大多数给予“转党”（即吸收入党），对已转党的同志要求负起发展党团员的任务，逐月布置任务到人，分工在同学中物色、教育和考察参加党团的对象。找对象谈话包括了解其家庭成员和经济来源等情况、本人对共产党和对时局的认识以及有无参加党团的要求，经过初步政审和政治觉悟的考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破坏，实行“单线联系”的严格制度，即介绍人、监督人和参加党团后的联系人，原则上不能同一人，参加党或团之后的同志也不能互

相探问和相告，而且一律使用假名（代名）填表。以后组织布置工作需要记录的，指定一种从澳门文具店买回来的薄纸，以便在必要时将纸搓成小团吞下肚里。至中山解放前夕，纪中的地下党组织，在发展党团员方面是一项很重要、很繁忙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本人在学校和回乡间共介绍了3位同学入党和3位同学参团，这是反映当时加速发展党团组织的一个例子。

（2）发动地下党团员在各类学生组织中多承担任务，多发挥作用，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广泛联系更多的同学，扩大党的影响。在学生会、膳委会里有我们的人；剧社、管乐队、合唱团和读书会等组织里也有我们的人，当时学校三分之一的同学参加了这些组织，党团员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9年春开始，我们还在学校附近的小村落办起7间农民夜校，夜校老师全由中共党员或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义务承担。我们还利用文艺竞赛和联欢晚会或学校演剧的形式来宣传反封建、反官僚以及激励学生追求进步。并以星火读书会名义在学校正门两侧办起篇幅较长的长廊黑板报，指定几位党团员学生在每晚夜修过后在进步老师冯树华的寝室收听新华战事报导，翌晨便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插入黑板报不显眼处登出来。渐渐吸引不少同学阅看和传开来。在中山解放前二三月内，地下党团员还在学生会办公室内赶印了《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小册子，并分工发给一些进步同学传阅。上述这些活动收效颇大，既团结教育了广大师生，又扩大了党的影响，为我们在校内发展党团组织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3）配合支持中山（五桂山）游击区活动。这方面我们做了几点工作：一是发动党团员利用回乡休假或探亲访友之机，调查当地敌军情况，包括了解敌军番号、人数、长官姓名、武装实力以及动态等，一有消息，回校要及时向组织汇报。纪中党组织先后收到了20多次汇报，区委及时通过山区游击队派来的联络员向他们书面反映。二是转传游击队战报。凡收到这些战报便主动在组织内部和个别进步同学中传阅。在一定时间内还要收回战报集中处理。三是在本校党团员及个别进步学生中发动募捐现金

(含首饰和银元),以支援游击队的活动费用。在党团员的带动下,募捐成绩较佳,募得(折合)港币3000多元和一小批金、银(银元)首饰。四是在中山解放前大半年间,还秘密输送了10多名地下党团员到游击区参战,后来这些同学绝大多数成为勇敢的游击战士。

从1947年到1949年中山解放时的两年多时间,纪中的地下党团组织,坚决执行上级党的指示,结合纪中的实际,充分利用了“合法”形式,努力争取校方的合作(当时的唐代校长思想比较开明,政治比较中立),加紧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在解放大军南下节节胜利的鼓舞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送走了黑暗,迎来了中山解放的曙光!

(选自《中山党史》2002年第3期)

解放前四区党团活动概况

□孙曼光

中山县四区，原辖包括现在的火炬开发区、南朗镇及五桂山和东区的部分。

四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山县委领导中山农民举行卖蔗埔起义，四区不少农会会员响应参加了这场起义。1936年，孙康等首先在四区沙边村恢复建立中共中山县支部，继而成立了县工委和县委。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县委在四区西樵村的中山县立第七小学成立广东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在四区横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并取得胜利。

四区由于靠近中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游击区，加上这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在四区大环、张家边、小隐、宫花等地都设有交通站，与驻五桂山的党领导的武装一直保持联系。下四区崖口等地亦有五桂山的联络站。因此，可以说四区成为我们五桂山游击区的外围联系点。五桂山区游击队经常派人到四区各地开展革命活动，为四区的解放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1949年六七月间，中山县委派李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山县四区、五区、六区特派员。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山县四、五、六区区委会，书记曾海波，组织委员谢秉才，宣传委员刘凯声；谢秉才同志具体负责四区地下党团组织工作。在四、五、六区区委的领导下，四区党团工作非常活跃，四区沙边村、白沙湾村、张家边村（含江尾头和西樵村）、四区中学等成立了党团支部。为迎接解放，进行了革命宣传活动，积极发展党团员，培养新干部，为建立新政权做好组织准备；同时还开展筹粮支前等工作，为中山四区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选自《中山党史》2002年第3期）

中山解放前夕的工人活动

□ 孙子仁

040

1949年初，我在县立中学读书，时团组织在进步学生中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并通过供给同学一些进步书刊，揭露国民党腐败等，教育、影响同学进步，以迎接解放。

当时组织分配给我的任务是：除在同学中进行宣传活动和发展团员外，还利用学生身份和军训的校服作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把信送到五桂山区或送大鳌溪胡彪同学处转，偶也带个别同志到山区，如卢克诚、许平同志等。信件是卷得比一根香烟还细或以叠成小小方角，藏在校服裤头及衫角等地方。

当时的县立中学校服，1947年为蓝色，1948年为黄色，和国民党的军官的颜色一样，特别是短袖军装。送信时为避开学宫及华陀庙的保警驻地，多经缸瓦巷入山际尾出柏山再到大鳌溪。我们班大、小鳌溪的同学，经这条路放学，不会太引人注目。过了大鳌溪入龙通坑，到达长江石塘就安全了。半年中，我都能较好地完成上级所交的任务。

在此期间，我们县中高二乙班的团员及进步同学，编印了一本较为进步的歌集《鹏社歌声》，多数为民歌，正页是油印。由于我认识华侨印刷厂几个管理人员及同乡的工人，就叫他们利用晚上免费为我们印了一个漂亮的铅印封面，我也因此认识了较多的印刷工人。

华侨印刷厂是爱国归侨孙海筹办的。该厂3个管理人员中有两个较为进步，加上几个同乡工人关系，我在那里活动没有阻力。印刷业工人，大多数都有一点文化基础，容易接受文字传播教育，经组织同意，在印刷业工人中发展团员，我便从学校活动转向工厂活动。

解放前的石岐，除商店外，工厂（也包括手工业）甚少，产业工人更屈指可数，比较大的有电厂，六七间米机，4间印刷厂，2间油榨厂。还有岐关公司、电话所及3间戏院等企业。在凤鸣

路做机械加工(修理)的利工民,拥有在当时算是最大的车床(10—12尺),都是人力踏的,但在修理业中已是首屈一指。此外,岐关公司肖家村修理厂虽有几部先进车床,但都远离石岐。由此可略见解放前石岐工业的一斑。

我在印刷业工人中发展了7个团员(另有2人解放时因华侨印刷厂倒闭回乡而失去联系),开始是单线联系的,后来成立了团支部。据我所知,在解放前夕,石岐地区产业工人的团支部,这是第一个,这些团员为中山解放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向工人宣传党的政策,教育职工,及印刷宣传品,如为配合中山石岐的解放,接受了印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传单及解放军入城布告等任务,分发给各团支部,在石岐张贴。这些布告都是通过发动华侨印刷厂的团员利用晚上印刷的,纸张由组织拨款购买。印好后,当晚即送往悦来大街2号我的同班同学黄凌霜(团员)家里,因她家离位于瓮菜塘街的华侨印刷厂不外100来米左右,然后再由组织派人分发、张贴。

这些事在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当时是国民党垂死挣扎期间,学校有国民党中统组织及其爪牙,加上团管区派来的反动军官,对学生的严格控制可想而知。如我的一位挚好同学(非党团员)的大哥在太平路开了间商店,我们只是把一些较进步的书刊寄到他的商店,结果,他也遭受到抄店,幸而没发现什么。

虽然建中、中山两间印刷厂是由国民党县党部及国民党县政府直接领导出版党报及日报,工作有一定危险。但工厂的大多数青年印刷工人都是出身贫苦,接受了新思想,痛恶旧社会,为迎接新中国的解放是无所畏惧的。如建中印刷厂曾发生过抵制诽谤我们领袖的排字(俗谓“开天窗”)事件。中山解放前夕,我们串连发动工人保护好工厂和机器,不给特务破坏或搬走,使一解放便能为新政府印刷文件及为珠江地委出版党报《珠江日报》,保障了党和新政权宣传工作的如期进行。

中山解放后,这些团员大多数都参加了政府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2—3期)

解放小榄

□袁勋 吕胜 何炳刚 区英伟

原中山三区位于中山县的北部，区域包括现在的小榄镇、古镇镇、东升镇（观栏村除外）、东风镇的伯公、小沥、西罟以及横栏镇的一、二、三、四、五、六沙和天宝、同裕、指南等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小榄是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区是个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较为富裕，因此也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势力盘踞的地方。全国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部就设在小榄；解放战争时期，这股势力摇身一变，成为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第一指挥所第七营。小榄还是封建地主的堡垒，这里环境相当复杂，进步势力较为薄弱。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在这一带坚持斗争，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发展武装，直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小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逆流勇进

1946年春，华南天空乌云密布，部队北撤，留下的同志全部转入隐蔽斗争。党从东江选派刘云到中山任中共中山三区特派员。刘云到三区后，根据上级“隐蔽骨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结合原三区中共力量情况，作了新的调整：要求袁世根继续当白皮红心的国民党乡长，把原在粤中纵队工作的张枫安排到石岐仙逸小学任教掩蔽；吕胜安排到江门至澳门泰兴利轮渡当水手，做地下交通员；袁勋到外地读书搞学运，定期回来向刘云汇报；肖琼芝通过她的舅父卢励吾（卢时任国民党小榄自卫队长）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山保警七营营长屈仁则内部，博取屈的信任，从中窃取各方面情报。刘本人以教师职业作掩蔽，先在海洲小学任教，发展同校教师何炳刚入党，跟着他们俩人一齐转到小榄镇三立小学任教。

1947年底到1948年初，整个局势急剧变化，解放军在各战场节节胜利，蒋管区经济全面崩溃。1948年华南分局在香港尖沙咀举办党校学习班，刘云参加这个学习班回来后，结合当地情况，把三区的党员骨干重新布置。袁世根搞两面政权，党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派叶勉忠到邦平乡任文书职务作掩护，一方面协助袁世根搞两面政权，另一方面负责上三区全面工作，重点加强古镇、曹步党的活动；调张枫往沙田区搞武装工作；李瑞英、袁定慧、何芝等先后调往四沙，加强沙田区；把在广州读书的袁勋调回海洲乡搞地方党工作；何炳刚仍留小榄镇内，掩护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张莹在海洲小学任教，串连了张克明、陈铭、覃芳兰等进步教师来三区工作，张莹后调到小榄永宁小学开展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先后从各乡挑选觉悟较高的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学习、训练，培养骨干以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分别在沙田区的高沙秘密举办了游击训练班和在海洲乡举办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在海洲乡举办的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由袁世根安排、袁长诚具体负责、刘云亲自主持并讲课。学习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党组织，怎样当好党支部等。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至学习结束，没有出任何事故。学员返回原工作岗位后，发挥积极作用。苏松柏、苏金荣到三沙、五沙、六沙等地发展了梁炯祥等党员。苏标协助叶勉忠在曹步发展党员吴明立、李洪发、朱成结、崔社旺、陈引福等10人，并成立党支部。袁勋在海洲发展党、团员，区英伟协助发展的党、团员有区炎良、袁旺、袁果、袁耀祺、袁文鹏、张帆、袁太顺，团员有袁渭贤、袁沃津、张如松、区培等共23人。此外，还派党团骨干到狮会、音乐会等群众团体中进行革命活动。高绩叶洪、司徒如发展了在反“三征”斗争中表现积极的何荣友、叶焯、邓树榕、司徒润、黎卓等入党，四沙发展了梁友胜、卢来胜等入党，小榄何炳刚在工人中发展了关觉入党，在学生中加强了联英社读书会团员梁材明、梁东垣、孙敏的联系。

为了加强宣传活动，刘云决定搞一个秘密油印室，指定由袁勋负责。油印室地点设在袁勋的旧商铺，一切经费由袁勋负责，

又通知在石岐读书的青年团员袁文鹏回来参加。临近解放时，任务繁重，又增加了张帆。该社曾印过小传单、星火文摘、学习小册子，翻印布告，给国民党三区地方势力、土霸等的警告信，综合情况、地图和调查表格等。当时大家的革命热情高涨，为了赶任务，夜以继日，一连几个通宵。为了及时将各种宣传品送到全区各地去，又增设了一些交通员与网点。除高绩叶洪家、古镇苏松柏家两个老交通站外，新增加了四沙梁明初、曹步李洪发、小榄袁定慧的车衣店交通点站，另设临时不脱产、半脱产交通员，如高沙冯敬生、海洲区英伟、古镇苏能根等。

二、发展武装

1948年夏，刘云在小榄镇第九街一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张枫、邓永年、叶勉忠、何炳刚、李瑞英等，由何芝、袁定慧两人负责保卫后勤工作。会议议题是三区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会议决定把重点放在沙田区，建立武工队，发展武装。会后，刘云征得中共珠江地委书记黄佳同意，把三区划分上、下三区两片，上三区以隐蔽斗争为主，下三区（即沙田区）则开展公开武装斗争，将曾在部队工作过的张枫、吕胜调往高沙、四沙两片，发展武装。

1949年2月，从各乡挑选了10多名党员骨干和觉悟较高的青年农民，在高沙举办游击训练班。不久中共珠江地委从中山五桂山区派来汤忠、何金作军事骨干。3月，张枫在高沙意丰围梁七姑家里主持成立武工队，任命叶洪为队长，汤忠、何金为副队长，队员有梁均等14人。从此，中山三区有了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公开的武装队伍。随着斗争深入发展，三区武装不断壮大，又将下三区划分2块，1块由张枫（化名林飞）负责，队长叶洪，副队长何金，活动于原复兴乡的高沙、绩东、绩西、五埗、鸡笼、草塘、白鲤等地区；另1块由吕胜（化名何发）负责，并兼队长，汤忠为副队长，队员有黄奕九、邓云青等10余人，活动于原西海乡的七埗、一、二、三、四、五、六沙，天宝、同裕、指南等地区。武工队有4项任务：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党的各项

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三征”，开始征收我方军粮；扫清外围国民党据点，巩固我方阵地；建立一支不脱产的民兵队伍。

国民党三区田粮主任关家骧，从小榄带领一个警察中队，到西海乡四沙督征夏粮，声称如武工队进村收粮，就“要他们（指武工队）竖着入横着出（杀掉）”。恐吓不成转用协商办法，被武工队严词驳斥和拒绝后，又以公函方式到各村催征，被吕胜带领武工队伏击，击毙两名从五沙回程四沙的催粮国民党警察。群众闻讯，无不拍手称快。敌人非常震惊，第二天清晨，关家骧便带队龟缩回小榄了。7月中旬，经过周密侦查和准备，由张枫率领武工队10余人，一个晚上袭击了三度闸警察分所，缴了5支枪，并警告他们不得再替国民党当局征收田赋等。8月，接连袭击了裕安围警察分所、米步滘、绩麻东2个自卫队后，武工队声威大振。国民党的征收人员不得不撤离，中间派向我们靠拢，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三区警察所长巢天林拼凑了约800人，于一个拂晓到高绩一带“扫荡”。我部队闻枪声知有情况，即分散入蔗林迎敌，来敌对我部队不摸底，不敢深入，只在外围叫喊，乱放枪。接近黄昏时，敌方怕吃亏，便收兵返回小榄。

解放前夕，三区武装已发展到250多人，组成猛虎、北平、飞虎等6个分队，配有轻机枪5挺、步枪100多支，冲锋枪、手枪20余支及弹药等一批。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从小学教师中抽调张克明、周洪汉、刘赤等知识分子到部队来。

上三区所掌握的武装是灰色武装。派出党、团骨干打入国民党地方武装，如海洲自卫队，由于袁世根利用任邦平乡乡长的权力，安插了共产党员程标、唐协民、袁长诚、袁树球等掌握海洲自卫队，队员大多是先进分子。苏标（中共党员）的父亲苏金成是古镇津边里保长兼更夫队队长，利用这种关系，苏标直接掌握这支队伍。当时海洲各坊以保护家乡、防止土匪抢劫为名，由各坊自愿组织队伍帮助更夫队看更（简称帮看队），武器经费均自筹自给，地方党组织想方设法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打进去，掌握这支队伍。曹步由共产党员组织了10余人不脱产的武装，并

派张德浩去秘密进行训练。

小榄解放前夕，三区建立了一支不脱产的起义军（即民兵组织），起义军总部设在高沙顺安围曾用富家，总部代号“莫斯科”，司令林飞（张枫），袁永调到起义军总部工作。全区凡有党员的地方，都发展起义军组织，起义军都发有胸章，并造册登记上报总部，共发展了1100余人。

三、反“三征”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为了挽救残局，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加紧勒收赋税，颁布所谓的《提前征收三十八年度田赋征收办法》《征兵条例》等规定，凡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都为应征壮丁。“其中18岁至35岁的壮丁不论是单丁独子，要一律强迫当兵……凡瞒报壮丁，都要处死刑。”群众敢怒不敢言，每逢“三征”风潮一刮来，人心惶惶。

1949年6月，三区党组织根据中共珠江地委“要根据大军渡江后的新变化，掌握反‘三征’是当前斗争的中心环节，提出武装反‘三征’、武装自卫的口号，并指出武工队必须适当配合群众斗争”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不同地区采用不同做法：

下三区以复兴乡为重点，采取公开反“三征”的办法。该乡有28保3000户1.7万人，土地面积5万亩，田赋由小榄的地方势力所把持，复兴乡长卢峙的各派出所代收，计有三度闸一带林煊、林带及警察派出所武装人员，米步濠一带由何源旺，第一圩至第七圩一带由区发和何日成，高沙一带由吴大基，裕安一带由孙万开代收。该造田赋每亩60—70斤，甚至有的收到84斤谷。这样，农民辛劳半年的收成等于零。群众怨声载道。我们因势利导，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反“三征”。当时，由于群众的觉悟不一致，顾虑重重。有的看不到群众力量；有的把敌人力量看得太大；有的怕反抗万一失败了，就无路可走；有的要求我们派大队伍来驻扎……我们收集了各方面意见，于1949年7月12日召集武工队及部分地方党员与农民代表，研究反“三征”。又在当月17日晚召开全乡性反“三征”群众代表大会，向群众说明目前只有两条

路可走：一条是生路，就是大家团结起来不交田赋，但要大家想办法；另一条是死路，就是交田赋。经过一番议论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要走生路！”并议定于20日晚举行游行示威。各村各保积极做准备工作。小榄店铺的七九枪子弹被购空，小型机械厂的白药也用光，开明的士绅也愿意借出枪支。邻近的四沙、宝丰、同安等乡得此讯息，要求一同前往参加。

当晚，武工队作了政治动员，详细布置了袭击方法后，晚上10时，除了廿三保等候机枪误了点外，各队依时到达了指定地点。200个武装人员分别由七圩、祥丰、合丰伏击三度闸警所；四沙、吉安、保丰联合把守警戒往小榄的退路；其余兆隆围、顺安围、美隆围、廿三保等负责分布于敌营对面一带堤围边担任阻击。又在廿三保、顺安围这两队挑选出勇敢大胆的人员16名，连同8名武工队组成突击队。子时，各队分头前进。突击组到达时，立即叫醒一家农民借了一艘艇，迅速渡河后，摸索到达敌门前，不见哨兵，忽见一个人影，喝令不停，立即射击。未经训练的农民闻枪声便紧张起来，不听指挥便放枪。武工队立即发出“不要乱放枪”的命令。约5分钟后，枪声便停止了。农民们把三度闸乡公所（即田赋征收处）的家具、磅秤、麻包等物统统砸烂或烧掉。突击组随即转向圩上搜索，并高呼“我们是反田赋的，各商户不要惊慌，请开门接受检查”。搜查约20分钟，并无搜到踪影，便收队回去。事后才知道敌人退到附近蔗地隐藏起来了。翌日，警察所派出20多人，匆匆忙忙把乡公所残局收拾即撤去，以后再不敢来收田赋了。为了巩固胜利，我们提出成立以保乡抗征为目的的复兴乡抗征委员会，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巩固了反“三征”胜利果实。

上三区以邦平乡为主，包括海洲、古镇、曹步。这里的反“三征”主要在“拖”字上做文章。因邦平乡的乡长是共产党员袁世根，故采用推磨之计，能拖则拖，既达到让国民党无法征收的目的，又不暴露党组织，做得相当巧妙。但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得知邦平乡等地对“三征”以“拖”的办法，不肯完成任务，便派兵和三区区署联合把袁世根带走。袁世根早就料到敌人这一着，预

先写好几封信给当地乡绅魏贤祥、魏永怡、袁锦辉等人，交给海洲自卫队副队长袁长诚保管，叮嘱他要是自己在小榄被扣时间过长，即将这几封信分别送给他们，由他们到县找魏觐明（国民党中山县参议长）。后经魏等人活动，提出交涉，袁获得释放。往后，征粮征税勉强完成了一些，征兵任务完成得更少。

三区党组织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做法，出色完成中共珠江地委提出反“三征”的斗争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这场反“三征”斗争使共产党领导的三区武装迅速成长，也大大地教育与鼓舞了群众。

四、古镇集结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6日，刘云率领汤忠带领的三区主力中队（北平队）90人，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到南头北帝庙集结，开赴顺德，解放大良。接着，三区党组织划为中共中山县委管辖。

三区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立即组织本区各地方武装力量，在古镇集结，配合解放军解放小榄镇。当时在古镇集结的武装力量来自3个方面：一是由张枫、吕胜率领的三区部分武工队；二是由袁世根和叶超率领的海洲自卫队，有党员袁长诚、唐协民、袁树球等，全队20余人，机枪3挺（其中粤造机枪2挺、捷克机枪1挺），还有长短枪20余支；三是各乡群众性武装力量，包括各乡各保的共产党员、新青团员骨干，其中海州抽出人数较多一点，由袁勋负责将各坊的看更队内由我们掌握的骨干，加上海州的部分党员、团员，一共20人，长短枪20余枝，袁勋把自己家中的卡宾枪、长短枪全部带走，一些党、团员如欧显宏等也带走自己家中的枪支。各乡仍留有骨干主持乡政，如海洲区英伟、古镇苏标、曹步吴明立、四沙梁明初、高沙邓树榕等。

各路人马古镇集结后，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山县三区区委，张枫任区委书记，袁世根任宣传委员抓政府工作，吕胜任组织委员抓武装工作。

中山县第三区人民政府也随即宣布成立，袁世根任区长，叶

洪、司徒如任副区长。区中队也同时成立，吕胜任中队长，何金任中队副，袁勋任指导员，下辖3个排。

五、挺进小榄

在广州已经解放，中山石岐还未解放的这段真空期间，袁带、屈仁则之流的国民党中山三、九区地方势力和军、政当权者等，在九区建国乡浮圩举行会议，商讨应付时局问题，决定以小榄为中山“起义的中心点”，上演一场“假解放”的滑稽戏。1949年10月22日（即农历九月初一）凌晨3时，由谢云龙属下人马在永宁大榄岗、凤山、园榄、半边榄等各制高点放枪，搞所谓“起义”。翌晨，黎湛泉（又名尚统）率领属下人员，由低沙庙进入市区，并张贴以黎湛泉署名的所谓布告和传单，并在同乐戏院内（今小榄戏院）召开三区民众大会，宣告小榄“解放”。而实际上盘踞于这一带的国民党势力袁、屈、谢、巢之流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一班鱼兵虾将来表演一场“假解放”的滑稽戏。此行动遭到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的痛斥和否定。

1949年10月30日，中山县城石岐解放。这段期间，中山三区地方武装已经集结古镇。11月4日，由叶勉忠（叶超）带领周乃夫、罗彬、袁惠贤、袁连旺、麦成意、袁北成、何炳刚组成先遣队进驻小榄原国民党三区警察所，与卢励吾（小榄自卫队长，小榄商会理事长）商讨接收小榄有关事项。主要有：（1）如何接收区府、镇府、警察所等政权、军事机构；（2）如何接收旧档案，除国民党三区署和小榄镇公所档案外，还有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审计部南迁到小榄、分别存放在10余间祠堂的档案接管封存；（3）解决经费问题，各商团分担的任务和如何开展征税工作；（4）如何接收整编保七营留驻小榄的队伍（当时营长屈仁则已逃走，由副营长负责移交）。

在先遣队入小榄后，在镇内的地下党员，配合调查国民党武器情况。张莹、何芝、袁定慧一起赶制五星红旗（包括三区武装及顺德独立团用的），小榄团支部组织青年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

1949年11月8日，由张枫、袁世根率领武装队伍和各乡镇党

团骨干约 250 人，从邦平乡公所所在地古镇经曹步过九洲基进入小榄。当天上午 8 时，国民党小榄镇镇长高澄江，商会理事长卢励吾率领各机关、团体、学校师生代表数百人，前往该镇东区四圣宫静候。11 时 30 分，张枫、袁世根率领队伍到达四圣宫，有女学生数名向张枫、袁世根献花，还有鼓乐队、醒狮队，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场面非常热闹。队伍进入小榄警察所休息数小时，随即到原国民党三区区署办理接管事宜，宣布小榄镇解放。

与此同时，区中队也立即布防。一排排长张德浩率队到沙口驻防；中队副兼二排排长何金留驻区府，三排排长苏能根率队到警察所驻防。

11 月 16 日，小榄各界人士、机关团体代表数十人在小榄商会会议室，召开“庆祝中山三区解放筹备会议”，商讨庆祝三区解放大会各项事宜，推选袁世根区长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确定次日再举行庆祝大会。11 月 17 日中午 11 时 30 分，中山县第三区人民庆祝解放大会正式开始，先由袁世根区长致词，张枫、驻军代表及各阶层代表分别讲话。大会结束后，万人队伍有秩序地从体育场出发，环绕小榄镇一周游行。当晚在大升平戏院（今小榄影剧院）举行游艺晚会。

六、清剿残敌

刚解放，百废待兴，各项任务繁重，尤以支前的筹粮、筹款任务紧迫。区长袁世根全力担负支前工作，没有官架子，常穿一条短裤，踏着自行车，经常下乡与老百姓在一起，倾听群众意见。三区的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做好支前工作，较好地完成县上下达的各项任务，受到县政府的表扬。

小榄虽然解放了，但盘踞于三区的国民党土匪武装经常在小榄近郊放冷枪，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社会不稳定等。稳定社会治安和恢复经济秩序是人民的迫切要求，因此，中山独立团派政治部主任吴当鸿带领 4 个连，于 11 月 10 日下午 2 时由石岐乘专船开赴小榄。随即，两广纵队一团三营来驻防，开展肃清残匪、收缴黑枪、扫荡镇内的烟、赌，同时协助区人民政府打

击哄抬物价，整顿金融市场，以人民币为流通货币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此外，在解放前夕从小榄逃往香港的谢云龙（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挺三”独立大队长，诨名谢老虎，长期盘踞小榄一带），在1950年初，经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工作的饶彰风做他工作，谢衡量了得失，同意回来缴交武器，向人民认罪。他持有饶彰风的亲笔信，回小榄见张枫、袁世根两人，谢提出缴交武器时，晚上在他家为宜。区委、区政府经研究后同意他本人的请求。收缴谢的枪支当晚，前往接收的有区委书记张枫、区长袁世根、区中队长吕胜、区指导员袁勋、区中副何金等5人。谢交出计有轻机枪5挺，步枪100多支，卡宾枪、短枪10余支及弹药一批。点收完毕大家一齐离开。后来，谢本人乘电船回香港。

（选自《中山党史》总第7期）

解放战争时期中山九区革命斗争概况

□周森

原中山县第九区位于中山县西北部，毗邻顺德、番禺两县，西邻江门市和新会县，东、南临珠江口，属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俗称大沙田地区。其管辖范围包括现属中山市的三角、浪网、民众、阜沙、黄圃、南头、东风，番禺县的潭洲、大岗、黄阁 10 个镇和顺德县的小黄圃等地区。（编者注：番禺现归广州市管辖，称为番禺区；顺德现归佛山市管辖，称为顺德区）该区河流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但兵匪横行，鱼肉百姓，广大群众不堪蹂躏，渴望共产党领导，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早日获得解放。

九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1924 年冬，孖沙、低沙一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农民协会，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1936 年香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派徐云同志到九区恢复地下党的组织活动，领导农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8 年，通过当地的共产党员梁伯雄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在国民党地方团队领取一个“别动小队”番号，建立起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并逐步发展壮大为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九区大队，在中山九区坚持敌后抗日斗争。1945 年 5 月 23 日，国民党“挺三”司令伍蕃集结了 5 个支队 1000 多人兵力进行围攻，梁伯雄大队以 130 多人的武装坚决抗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了一天一夜，伤毙敌军 100 多名，我军也遭受重大损失，大队长梁伯雄、副政委郑文和 30 多位战士光荣牺牲。解放战争时期，九区革命转入了更为隐蔽更为艰苦的长期地下斗争。

一、建立和恢复革命据点，发展党团地下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发动内战，加紧进行征兵、征

粮（田赋）和征税，九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党组织为了加强对中山九区革命斗争的领导，派方群英同志到九区工作，领导当地未受破坏的地下党组织，聚集梁伯雄旧部，秘密发动群众坚持斗争。1946年3月，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又派出刘云到中山的三九区工作，以小榄镇（属三区）为据点，与在九区工作的方群英同志建立横的关系。1947年1月，顺德县党组织在容（奇）桂（洲）据点初具雏形时，为了把握机遇，开辟新的据点，使革命力量进退自如，革命斗争互相呼应，乃派出郑迪年等同志到中山九区三角乡建立新的据点；1948年2月又派出黄哲君到中山九区牛角乡恢复老据点。在此前后，东莞县党组织派出卢克诚到中山九区民众、浪网一带工作。为了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地党组织均采取单线联系、秘密活动的方式，一般不建立横的联系。以下着重概述三角、牛角两个据点的开辟、恢复和发展情况：

三角乡当时共有9个村，分设10个保，全乡1600多户，8000多人，耕地面积2.7万多亩，属大沙田地区。该乡反动势力较强，连任伪乡长30多年的黄富是当地土皇帝，手下拥有中队长黄少棠（黄富之子）、吴焕英、小队长李仲燊及一群保甲长等爪牙；大地主叶定邦勾结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出任国民党九区支部第四分部书记和县参议员，其三弟任乡自卫大队长，成为另一派新兴起的反动势力；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把黑手插进来，派出特务余某以乡公所文书身份进行反共活动。他们蛇鼠一窝，欺压群众，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但该乡革命基础较好，早在1939年中共党员唐仕明同志就在那里活动。1944年有10多名进步青年参加梁伯雄部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后，有些参加了武装斗争，大部分回乡隐蔽活动。其中，梁泰猷、梁结（科）等同志在珠纵一支工作，经常回乡活动，联系着一批革命群众。

1947年初，中共顺德特委先后派郑迪年、黎朝华、陈雪清、金秀霞等同志到三角乡中心小学，以教工的身份为掩护，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们在校内引荐来一批进步教师，并通过合法斗争，挤走了一些反动教师，占领了学校这个阵地；在校外，依靠

当地的袁耀焰、梁科、黄联芳、周森、吴振明等同志通过组织读书会、校友会，办成人夜校等形式教育和发动社会青年，同时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自1947年下半年三角乡党支部建立起，在那里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先后有郑迪年、黎朝华、陈雪清、金秀霞、邓绍明、潘伟明、何子冷、刘章、刘立等同志，先后吸收入党的有廖季培、周森、黄文海、梁筱君、吴振明等同志。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以及一些同志政治面目暴露后需要撤离，党员的工作不时调动，党支部书记也时有变动，先后任支部书记或负责人的依次为邓绍明、黎朝华、周森等同志。此外，还培养了李秀南（柏林）、董燕群、苏炜、赵直、何颐之等一批革命骨干。1949年8月，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角乡支部，先后吸收了10多位同志入团，由周森同志兼任团支部书记。这些党、团员和革命骨干依靠当地积极分子，通过宣传发动，组织了“抗三征分会”，开展以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以下简称为“反三征”）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斗争。会员300多人，并组织了起义军60多人，使三角乡成为革命的坚强据点之一。

牛角乡是珠纵一支老据点之一，群众基础较好，梁伯雄部队突围疏散后，有一些同志在当地隐蔽。1947年冬，梁提荣、周桂胜两同志受当地革命战士和群众的委托，去顺德县与1938年曾在牛角搞过地下工作的黄哲君同志联系，要求他回到牛角领导农民运动。顺德特委就派黄哲君和甄碧瑞同志一起回到牛角，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经过调查分析，梁提荣、周桂胜等20个当时的秘密小组成员，政治可靠，立场坚定，便依靠他们，通过办夜校的形式，对农民群众进行阶级和形势教育，并从中物色和培养党员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与考察，吸收了梁九荣、梁提荣、周桂胜等15位同志入党，成立了牛角乡支部，由黄哲君同志任支部书记，与顺德县特委直接联系，和负责中山九区工作的方群英同志不发生横的关系。牛角乡党支部成立后，依靠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党员同志，联系和发动群众，开展“抗三征”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成为另一个坚强的革命据点。

到1949年8月，全区已建立上牛角、下牛角、文明、黄圃、三角、沙栏、民众7个乡支部，支部书记（或负责人）依序是吴勤、周日泉、梁建荣、吴奕和、杨显茂、周森、梁志刚，还有一个区武工队党支部，支部书记梁泰猷，一个直属党小组，组长苏英。共有党员64人。已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计有三角、民众、浪网、三墩等支部，共有团员50多人。并成立了中共中山九区区委，委员有邓永年、肖权、梁泰猷，活动方式由秘密转为半公开。

二、高举“抗三征”旗帜，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

早在1947年八九月间，牛角、孖沙、濠心、将军一带3000多农民在方群英同志领导和当地老党员梁建荣、吴奕和、陈林、黄泰、冼荣仔等带领下，前往文明乡所举行反对国民党政府征收田赋的请愿。乡长吴辉汉不敢出来接见请愿群众，偷偷从后门溜走，于是更激起农民的公愤。牛角乡农民烧毁了吉昌围与宝生围交界的征收田赋总棚，赶走了停泊在牛角北闸作征收田赋用的4只“大厅（艇）”；牛角乡党支部发动农民一夜之间抢割了9000多亩可以收成的禾穗。此后，群众性的“抗三征”运动风起云涌，形式多种多样。

1948年国民党广东省长宋子文甚至动用军队催收田赋，派两连军队进驻九区。农民公开抗缴不行，就采取“拖”（拖延时间）、“浸”（用水浸湿稻谷）、“渗”（在稻谷里渗沙子）等办法进行斗争。到了1949年6月间，“抗三征”群众运动已普及30多个乡、村，但未建立全区统一领导机构。为了加强对“抗三征”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山县执委梁泰猷和中共中顺边工委执委在沙栏碰头时，一致认为有必要成立区、乡（村）的“抗三征”领导机构，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

1949年7月，在北宁社召开全区党团骨干、武工队长、抗征领导人联席会议，准备讨论成立抗征协会问题。但这次活动被“大天二”梁自带侦知，连夜派出300多土匪武装偷袭，我们及时得到情报，提前散会，分别安全转移，会议未实现原定目标。8月，改在顺德县桂洲老党员陈润同志家中再次召开会议，人数

减少为 20 多人，参加会议的有梁泰猷、邓永年、司徒洪、吴奕和、梁建荣、吴添带、黄泰、范再、吴勤仔、梁有胜、吴勤、任坤贡、梁结等同志。会议一致决定成立九区抗征总会，选举邓永年为会长，司徒洪、吴添带为副会长。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中山人民抗征自卫协会章程》，确定抗征协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山人民，集结力量，反抗‘三征’，肃奸防匪，联防自卫，配合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中山。”根据《协会章程》，九区总会设有总务、宣传、抗征等股。总务股主管文书、财政、交通、联络、运输、担架、救护等工作；宣传股主管收集情况，组织口头和文字宣传等工作；抗征股主管组织抗征斗争，筹集武器、肃奸防匪、维持治安等工作。总会下辖 33 个分会，包括牛角、吉昌、天成、穗成、和泰、同安、大拗、孖沙、南头、低沙、将军、新地、新沙、濠心、对甫、马鞍、三角、十二股、浪网、陈十顷、茂生、大有、阜沙、东罗步、潭（洲）大（岗）、沙栏、团范、大奎、横档、石军、后岗、小黄圃等乡、村。会员共 5000 多人，其中担架队 1000 多人。

当时，南下解放大军节节胜利，广东全省解放指日可待，残留在九区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土匪武装惶惶不可终日。九区抗征总会一成立，就用“总会”名义张贴布告，警告国民党地方当局、恶霸及地方豪绅，不准向农民勒收田赋，不准征税，不准拉“猪仔兵”，指出只有向人民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继续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从而大大震慑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推动了九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抗征总会成立不到 1 个月，就有 300 多青年主动参加了我们的主力队，全区各地共组织了农民起义军 500 多人。

三、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参与解放中顺城镇

1949 年 4 月，中共党员梁泰猷率领关伟、杨益等 3 位同志到沙栏、三角一带活动，在北宁社、阜沙、居安、平安、南村等地建立据点和交通站。5 月底至 6 月初，地方党组织的司徒洪、黄森、方蝉、杨信、冯洪泽等同志也先后到九区工作。其中，杨信、冯洪泽同志被组织派回原籍潭（州）大（岗）地区开展武装

斗争，杨信为武工队长，队员有冯洪泽、吴日全、苏绍、吴惠泉、何培、颜培等。武工队到了潭洲、大岗后，同革命老前辈陈九取得联系，争取了南村老更（即更夫）杨杏祥，以他家为立足点，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发展了300多人参加抗征会员、40多人参加武工队，同时向开明士绅冯穗甫、汉奖成、冯桂龙等人做统战工作，警告和震慑了撕毁革命传单的伪乡长谢拔南和向恶霸吴锡告密的保长冯日光。坚持在南头穗隆围活动的武工队员苏志等，在那里开展了宣传工作，组织农民进行“抗三征”的斗争，发展了苏德、苏开等14位武工队员，配合主力截击反动武装，并为主力队筹借了一批钱粮和武器。九区武工队就这样由点到面，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到1949年8月，共发展到沙栏、三角、十二股、潭大、阜沙、大有、穗隆、大坝头、团范、牛角、后岗、石军12个武工队（组），共有人枪72。并以武工队为骨干，组织农民起义军1000多人。武器来源主要是自带或向当地筹借。

9月中旬，中共九区区委在大拗召开武装骨干会议，到会的有梁泰猷、肖权、司徒洪、邓永年、方蝉、黄泰、吴添带、吴奕和、杨信等。会议开了3天，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决定在九区成立3个主力队，队员来源有：动员党团员参加，在起义军中挑选130人，动员李成、杜锐两个自卫中队起义并从中挑选40人，并从武工队中抽调30多人为骨干，从进步教师中抽调六七人为文化教员；二是研究解决主力队的武器和钱粮问题，决定主要是向统战对象筹借。会后，由吴添带向潘浩（恶霸潘惠之兄）借米3万斤，其中2万斤（代金）用来购买机枪2挺，又向新地统战对象借来重机枪1挺；由梁泰向三角、横档统战对象借来轻机枪3挺、粮食10万斤；由方蝉向其母亲借黄金2两。李成、杜锐两个自卫中队起义时又带来轻机枪2挺、长短枪40多支。这样，武器和钱粮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大拗会议后，于9月中旬，成立了3个主力中队。为了纪念在“5·23”战斗中牺牲的梁伯雄、郑文、谭日光烈士，这3个主力队改名为“纪雄”“纪文”和“纪光”队。纪雄队有70多人，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卡宾枪1支、其他长短枪50多

支，由梁泰猷负责，副队长黄泰；纪文队 60 多人，有轻机枪 2 挺、长短枪 40 多支，由肖权负责；纪光队 70 多人，有轻机枪 2 挺、长短枪 60 多支，由司徒洪负责。

3 个主力队分别在孖沙、天成围、穗成围、低沙、三角、沙栏、民众等地集训，主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八项规定》。通过一段时间培训，队伍井然有序，纪律严明，目标明确，斗志昂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欢迎，震慑了土匪恶霸的气焰。10 月 9 日下午，纪雄队在天成围集训时，刚好屈仁则也到了吉昌围国民党中山县参议员黄庭光家中。当他知道我部在围堤上布防后，立即带着 10 多名“马仔”溜走。一次纪雄队夜行军，在孖沙途中抓获反动分子梁寿德，缴获左轮手枪 1 支。10 月上旬，区委派纪雄队、纪文队配合顺德县杜启芝率领的北江大队一个小分队，智擒了伪装开明、假意联系投诚的容奇镇地主武装三青团骨干分子关葆真。中下旬，又以留驻潭洲大岗的武工队员冯洪泽、冼万友等 30 多人和三角乡武工组吴添科、吴仕猷、梁作猷等 40 多人合编为第四个主力队，由杨信、方蝉、吴振明等负责，但因各项任务紧张，未来得及集结和培训。

这时，广东省内许多地方已经解放，两纵第一、二师也已进入虎门要塞，边纵在莲花山登陆后直插番禺县城市桥。中共珠江地工委书记黄佳命令驻在中顺边境的顺德县北江大队和中山三、九区主力队在孖沙、北帝庙一带集结。10 月 16 日在地工委书记黄佳、顺德独立团副政委刘云、政治部副主任黄静生以及郭彪等主持下，顺德县杜启芝率领的北江大队 3 个中队、中山九区梁泰猷率领的纪雄队与肖权率领的纪文队在北帝庙会师，全部换上边纵顺德独立团的符号。经过一段集训，由黄佳亲身指挥，于 10 月 26 日下午 5 时作战前动员后，向顺德县的容、桂、良进军。派彭铁生率领的北江大队二十九中队为先遣，以纪雄队和纪文队为中卫，北江大队的二十八、二十九两中队为断后。纪雄队和纪文队进入容奇后在大凤山布防。27 日，边纵一团兵分两路进入大良，缴了国民党保警营的械，占领了县政府，并迫使了国民党邓铿部无条件投降。但由于边纵有追击残敌的任务，不能留驻大

良。黄佳同志就命令纪雄队于28日下午4时进入大良接替守城任务。随后，北江大队的苏明中队也进驻大良。同日，留守九区的纪文队（编者注：应为纪光队）在司徒洪的率领下，配合边纵三团，在陈十顷抓获土匪大队长吴兆华，缴获机枪3挺、卡宾枪2支、快制驳壳2支、左轮3支、步枪数十支。

10月30日下午2时，梁泰猷、肖权等奉黄佳命令，带领纪文队60多人，与边纵二团200多人一起回师中山九区，进驻黄圃。纪雄队除梁泰猷外，全部人枪由顺德独立团接收并留在顺德，后改编为顺德县大队第七连，黄文海、黄森分别任正副指导员。

当日下午4时，中山九区各界人民1万多人，在黄圃九区中学广场上举行了九区各界人民庆祝九区解放大会。边纵一团负责同志和中共九区工委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四、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开明人士

当时我们的统战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统战关系，掩护地下工作的开展。当时的三角乡政权对我们开展地下工作阻力甚大。1948年10月，我们就利用改选乡长的机会，使出身地主家庭但思想比较开明的简涛出任乡长，推翻了黄富历任30年乡长的宝座。简涛执政后，我地下党组织通过有影响的党员出面，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赶走了在乡公所任文书的国民党特务余某，改由地下党员袁煊煜（编者注：应为袁煜煊）任自卫大队长。从此，乡政和武装权力均为我所控制，形成了事实上的统战政权，大大有利于地下工作的开展。简涛曾为我们提供过情报，提供部分武器，并在乡仓库中拨出10万斤稻米供给已集结起来的300多名起义军。又如三角乡大地主出身的青年吴应怀，受到进步人士的影响，又参加过梁伯雄大队的军政训练班受训，思想经过洗礼，同情我党活动。结业回乡后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自卫小队。初意挂靠梁伯雄部队，后接受我们意见，改为挂靠持中间立场的黄旋光大队，以保持灰色政治色彩，更有利于掩护我地下工作的开展。多年来，他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如提供敌人情况，多次掩护和保释我被捕的工

作人员，为主力队提供了1挺轻机枪、2支短枪和4支长枪等。

二是争取中间力量，动员一部分地方实力派武装起义投诚。例如，沙栏乡北宁社的自卫中队长李成，手下有自卫队员共30多人，拥有轻机枪2挺和长短枪20多支；浪网乡的自卫中队长杜锐，手下有自卫队员20多人，拥有轻机枪2挺和长短枪30支。我们经过调查，这二人属地方实力派，和地方的恶霸也有利益上的矛盾，可以进行争取。我们先通过社会关系与他们接触，而后再进一步对他们做工作，使他们逐渐认清形势，靠拢我党，并随时提供情况。1949年7月我们在北宁社集会时敌人调动兵力进行偷袭的情报就是李成提供的，使我们能够及时安全转移。8月，我们发动他们起义，把部队和武器交由我们处理，从中挑选40人编入主力队。又如地方实力派梁正算是开明一点的，解放前夕，在军事压力和我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动员下，他宣布投诚。解放后，两纵一团领导还委任他为珠江三角洲治安委员会委员。

三是运用统战力量，解决武器和钱粮给养等问题。如做地方实力派潘浩、潭洲吴焕英、梁九等人的工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武器、粮食等。

中山九区的革命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逐步壮大了自身力量，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中顺边境的一些城镇，保护了社会治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解放后，这些革命老同志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工作，他们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在“四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1、2期）

解放战争时期中山县的武装斗争

□吴当鸿

抗战胜利前后中山县革命武装活动情况（1945年4—9月）

中共中央决定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120师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于1944年11月在延安挥师南下，创建湘、粤、赣、桂边五岭抗日根据地，造成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的战略反攻。1945年4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指示：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粉碎日、伪、顽军万人进攻后，即由番禺县境转移南海县地区与南海、三水独立第三大队汇合，组建主力400人挺进西江，随即由郑少康、梅易辰率领继续北上粤北地区。留在中山县五桂山区坚持的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打破日、伪、顽军的“五九”（1945年5月9日）大“扫荡”，于日本投降前夕，根据中共广东区党委指示，分批转移东江与东江纵队汇合。并与东江纵队组建主力部队1000多人，由林锵云、杨康华率领从博罗县出发挺进粤北，执行汇合“南下支队”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945年8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广东粤北南雄县境。广东人民武装北进部队由于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未能依时到达粤北与“南下支队”会师。“南下支队”到达广东粤北后，由于部队连续作战，粮食供给困难，处于饥饿疲劳，处境困难，特别是国民党调集重兵四面追逼，形势严峻。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下支队”北返中原与新军第五师汇合。因此，广东人民武装部队北上粤北与“南下支队”会师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珠江纵队到达粤北后的部队编入东江纵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驻珠江三角洲“挺三”游击司令伍蕃调集“挺三”部队（原是国民党第七战区游击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名义上是国民党珠江地区“游击队”，

实是地方土匪武装)和收编的“曲线救国”军(既是“挺三”编制,又是汉奸、伪军武装)组合千余人,来势汹汹发起对我根据地五桂山区、凤凰山区进攻,于五桂山区的永丰地区杀害我游击队小队长黄顺英和战士3人,捕战士1人。另于东岸村追捕击伤游击队干部黄日(幸得当地群众设法转移救治,安全脱险)。

随后,在全国抗日战争期间逃窜鹤山县匿藏6年之久的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于1945年9月中旬迁回中山县石岐,张惠长继任县长。张接任后立即执行张发奎反共反人民的意旨,实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爱国人士等予以消灭杀绝的方针。同时进行强夺接收日、伪资产和加紧建立反动的政权基础组织,健全基层管辖等设施;积极组建军事力量,大力收编在县境内的伪军、土匪武装,并经广州行营指令王牌军之一的新一军第159师派1个团兵力进驻中山,协同实施;建立县保安警察部队6个营、1个特务连、总兵力1830多人,分别驻守石岐、交通要道、据点和五桂山区、凤凰山区与山区周边的乡、镇,包括一区石岐、四区库充、崖口、翠亨,五区马溪、塘墩、南溪、翠微,六区上栅、那洲,另派兵进驻五桂山区腹地村庄,石门地区的田心村,长江地区的中心村,同时派出2个连兵力驻守八区。保安警察(简称:保警,是县的机动部队)由县长直接指挥。

县警察局管辖内设立各区警察所及分驻所;一区警察所驻竹秀园,四区警察所驻大鳌溪,五区警察所驻古鹤,香洲设立分驻所,六区警察所驻下栅,唐家设分驻所。一、四、五、六区总警力400余人(二、三、七、八、九区警力未计算在内)。县成立戡乱指挥所,直接由县警察局长领导;县戡乱指挥所辖管武装是以原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的部队为基础,结合县属各区的地方势力组成区、乡、镇的联防自卫队;四区江尾头乡警队,五区三乡的郑兴部、吴康照部、神湾地区的曾添裕部、茅湾地区的邓添部、申塘乡的刘六、刘维满乡警队、康济乡的曾学华部、香山乡的黄汉部等。还收编投靠日、伪的“曲线救国军”的旧部,组成“联防自卫”武装;一区的雷雄、吴金,二区的肖天祥,三区的袁带、屈仁则、谢云龙,四区的梁雄,五、八区金斗湾地区的黄祥、黄球、黄森、陈执九、李华,九

区的潘惠、梁自带等，县戡乱指挥所辖下武装总兵力 3000 余人，各霸一方，成为镇压、屠杀人民的帮凶。

珠江三角洲革命武装情况

珠江纵队主力撤走后，尚有少量留在番禺、南海、三水、中山等县分散活动。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留守人员，也组成武工队在中山县五桂山区和凤凰山区活动，坚持斗争。

1945 年 9 月，经中共广东区党委批准，珠江三角洲设立“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领导机构）。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是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蒋管区。因此，贯彻以分散坚持，长期打算的方针，不设县委，采取特派员制，分别公开的武装与秘密的地方党工作，以党组织单线领导形式活动。

特派员黄佳领导全面工作，武装特派员曾谷、副特派员罗光连领导地方党工作。下设澳门第一联络站于青洲，以耕种菜园为掩护，负责人黄敬忠；澳门第二联络站（地点经常变动）负责人冯兰。为适应斗争，澳门中山特派员统一领导（实行划分区域垂直单线领导）。具体区域是：（1）中山县本部（一、四、五、六区和石岐）的五桂山区和凤凰山区，以山区为依托，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中心。（2）中山县三、九区以及顺德地区一部分，特派员方群英。该地区原有珠江纵队九区梁伯雄大队在此活动，后遭敌、伪重兵进攻，受到重大损失，方到后以恢复党组织和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为主。（3）中山县第八区斗门地区特派员肖志刚。该地区地方势力较强，采取党的组织（秘密）成员，通过各种社会职业或务农形式分散活动于各村镇，等待时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和组织武装斗争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山县一、二、三、四、五、六区地方党组织作专线领导，以学校教师职业为掩护，暂停一切公开活动。

以中山县五桂山区为中心的武装斗争情况（1945 年 10 月—1946 年 6 月）

1945 年 10 月，在中山县五桂山区石门白石岗村宣告“中共

中山特派室”成立。政治特派员曾谷（1946年6月黄旭接任），副政治特派员黄乐天，军事特派员甘生（1947年梁冠接任）。（编者注：据《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黄旭于1946年8月后接任，梁冠于1948年9月后接任。）成员有：黄旭、梁冠、郑吉、吴当鸿。工作方针是：“分散掩（隐）蔽、保存（精干）力量、等待时机”。这方针是根据斗争对象提出来的。斗争形式决定于组织形式。隐蔽保存力量，不是消极隐蔽，而是采取积极的发展力量，稳定下来，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在适当时机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夺取胜利。

（1）整顿组织，加强领导，建立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以原留守的武工队与后期东渡未遂的武装人员共32人组建为5个武工队，以连、排干部为骨干，另原民主政权干部共10余人：石莹桥村的钟太源、白企乡的李斌、合水口村的凌云、石门集结队（民兵）队长甘国梁和民兵等，在“中山特派室”领导下，分散活动，坚持对敌斗争。黄旭、黄乐天领导的武工队，以五桂山区的长江、石莹桥地区为基地活动；梁冠领导的武工队以崖口村沙田沿海地区为基地，活动于四、六区边缘，并负责与设于澳门的领导机关的联系任务；郑吉、吴当鸿领导的武工队以凤凰山区的东坑、正坑为基地，活动于四、六区；缪火（后动摇队）武工队活动于四、一区；甘国梁武工队以五桂山区石门九堡为基地，活动于四、六区。完成队伍组织整顿后，全体指战员提高了认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团结一致，立下决心，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在军事斗争主要是依靠群众进行“围剿与反围剿”（“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以分散活动，避敌包围袭击，保存力量，进行深入群众，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锄奸反霸，镇压一切为虎作伥、危害人民群众的反动分子，保护群众利益和维护山区治安。

（2）实行精兵简政。由于战局变化，主力部队撤走后，尚留大批非武装人员中多是妇女和小战士，造成安置极大的困难。因此将已决定转移东江的而又暴露身份的干部：谭生、郑毅、谢月香、刘震球等分别设法转移香港和东江，李瑞英等一批女工作人

员转往新会外海工厂就业掩蔽，苏英、张兰等通过亲戚关系转到小榄丝厂掩蔽。其余部分身份不暴露且有能回乡安全条件的，分散回农村务农掩蔽。非武装人员全部撤离山区免受损失，由此各武工队在“中山特派室”成员的率领下，精干、灵活、独立活动。

国民党中山当局经过一番准备后，以重兵压境之势对我留守武装进行军事力量的威胁，政治上的诱降，施展假谈判，骗取“民心”舆论，企图消灭我人民武装，摧毁山区民主政权。1945年9月下旬，中山当局派出六区区长卓君乙到五桂山区合水口乡瓦屋下村与我方谈判。其目的：一要我方把全部武装部队归编县政府；二借谈判为名骗取人民对当局信任，实为掩饰其发动内战的阴谋。在谈判会上，他们表面承认我游击队抗战有功，说：“现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应该统一，游击队应编入县自卫队或解甲归农，不应再驻在五桂山区”。并说：“县政府尚有3个科未委任科长，如你们同意改编，这3个科长由你们派人来担任。”我方代表“中山特派室”政治特派员曾谷，当场据理驳斥并郑重声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中山百万人民能过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什么科长，我们不要。请你转告张惠长承认如下3点：（1）承认五桂山区民主政府，使它继续为山区人民谋福利；（2）我们的部队继续驻在山区，保护人民进行正常生产和生活，维持社会治安。你们不得再诬蔑我们为‘奸匪’‘共匪’；（3）所有国民党军队应立即撤出山区，以后不得派兵进攻五桂山区军民”。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的政治诱降阴谋宣告破产。

11月，国民党当局调动“新一军”驻中山的部队、县保警部队及联合各区的反动势力共1400多人，计划以“扫清平原、围攻山地”的战略，与步步为营的“铁壁合围”“拂晓攻击”“远道奔袭”的战术，对五桂山区为中心进行“清乡扫荡”，扬言三几个月内消灭人民武装，摧毁山区民主政权。“新一军”驻县部队调一个营兵力，以大张旗鼓宣传“收复澳门”为幌子，来势汹汹，开进凤凰山区周围地区（现属珠海市辖内）的南溪、翠微、前山等乡、镇，翌晨拂晓包围袭击凤凰山区的东坑村庄，我武工队避敌锋芒，使敌扑空，一无所获，随即撤回石岐。远道奔袭凤凰山

区武工队未果，接着全力投向五桂山区，重兵进驻，实行定点固守（驻军于山区腹部石门贺屋村、长江乡的中心村、凤凰山区的那洲村），采取“坐剿”，围村搜捕，穿梭不停的轮回“清乡”推行“联剿”，各村以五家联保连坐办法，建立乡村保甲制，作为统治的基层组织。连保“连坐法”即一方面使民众互相连，以清“乱源”；另一方面则斩草除根，断其蔓延；以此“株连九族”的屠杀政策。用扫、梳、薅的“清乡围剿”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自新”运动，威逼群众齐报“奸匪”（武工队）的情况。把武工队活动的地区，一律视为“匪区”，作为“清乡”的重点；对同情、支持武工队的群众，扣上“通匪”罪名，轻则罚款取保，重者坐牢或杀害，直至株连亲友；把原游击队复员人员关进“感化院”（监狱），强迫“悔过自新”。敌人同时采取突然而来，围村搜捕，杀害了凤凰山区女干部何明（又名何惠娟）和武工队战士×国光。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拔掉武工队生存的根基，建立所谓“治安模范区”。

山区人民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可是他们眼看部队一批批撤走，信心无不受影响，平原乡村一些过去与我们为敌的土匪、地主、恶霸趁机报复，平原乡村的统战朋友，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撤走，对我们存在观望态度，对国民党有正统观念，因此，斗争比之过去困难得多。

武工队各自独立地分析情况解决问题，经化零为整，以整化零，时分时合，机动灵活，避敌搜捕，长期住山不住村，睡在窑洞、密林，风餐露宿，白天掩蔽，晚间下山做群众工作，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和罪行，宣传解放战争必胜，我们的部队一定会打回来，坚定群众对革命的信心。同时，采取冲破敌人封锁线（即以外线变内线）发展新区，到平原乡村（敌管区内）群众中宣传我武工队各种政策和宗旨；争取团结群众和恢复旧统战朋友关系，广交新朋友，争取对武工队支援，扩大粮款征收，解决经济和给养。对与我为敌，欺压剥削群众的恶霸、反动分子，依靠群众，把它消灭。为民除害，壮我声威。

1946年2月武工队先后处决了欺压人民的六区区署区员、

警长及鸡山村原日、伪侦缉人员 6 人。该区区长大为震惊，策划向各乡村筹集经费，建立武装，但遭各乡长、村长坚决反对。因此，区长派出唐宗枢等 5 名乡长为代表到五桂山区与我商谈，双方达成协议：（1）六区军、警执行命令“扫荡”山区，应只作应付，不对我武装围攻，停止搜捕我工作人员；（2）撤退国民党在山区内的驻军，并免征我山区的田赋、捐税；（3）对各乡、村坏分子可由民众向区署投诉，给予处分，武工队不擅自逮捕，倘区署不切实办理，武工队予以警告，不改者，则为民请命，给以处决；（4）以乡长联名保释六区范围内的“政治犯”。经双方协商，情况暂有所缓和，该地区基本群众纷纷支持武工队活动。

四区崖口村是我平原乡村的据点，恶霸乡长谭中善组建 10 多人的乡警队，勾结反动军警，决心与武工队为敌。4 月，武工队集中力量攻打崖口，经激战，生擒恶霸谭中善（后处决），缴获长短枪 9 支和弹药物资一批，群众拍手称快。白企村两个败类，带敌人捕捉我民主乡政人员，经群众向武工队报告，我武工小组将其缉拿处决；四区大鳌溪警察分驻所，经常下乡催捐逼税，欺压群众，武工队集中力量把它消灭，俘所长、警长、警察 30 余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20 余支、手枪 3 支及物资一批，敌人震惊，群众高兴。凤凰山区正坑村原是游击区基地，该村的甲长甘 × × 和沥溪村甲长见部队撤走后，留守武装人数不多，即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接任保、甲长职务，秘密向敌举报武工队活动情况，在敌军袭击正坑村时，武工队战士 × 国光牺牲。事后我武工队当即将正坑、沥溪两甲长处决（并向群众张贴布告）。五区洲仔村（今属珠海市）恶霸陈胜、陈桂、陈耀等购置武器、凭借国民党与当地反动势力，欺压群众，横行霸市，竟将由洲仔至湾仔沙村沿海岸边滩涂自然生长的蚝（牡蛎）场（原是历来沿岸蚝民赖以生存，自由采集的场地）强行霸占，造成洲仔、吉大、大姑龔、湾仔沙、胡湾里、耙子石、水雍坑、契爷岭、里神前、古屋村 10 个村的 8000 余蚝民断绝生活来源，陷于饥饿苦境。因此 10 个村派出代表 10 多人前来请求武工队拯救群众的疾苦。5 月，中山特派室为解救群众疾苦，由曾谷、甘生率领武工队，远道奔

袭洲仔村，擒获恶霸陈耀和帮凶陈九（击毙）。公告自即日起，沿海岸边滩涂自然生长的蚝场，沿岸各村群众均可自由采集，任何人等不得划界占有。从此民生安定。

沿岸各村群众积极支持、配合武工队开展工作，于是武工队活动区扩大，出现群众高兴，敌人震惊，当地反动势力害怕的局面。

在中山特派室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武工队紧密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山区民主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进行锄奸反霸，镇压反动分子，团结开明人士，摧毁反动的乡、保、甲政权组织，争取我山区内、外国民党扶植的乡、保、甲长站在人民一边或保持中立。各武工队指战员经过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的坚持斗争，适应了斗争环境，提高了战斗能力，实现了巩固老区、发展新区、扩大活动区，逐步恢复与巩固原有根据地。从原来武工队力量的32人发展为80多人，缴获轻枪1挺、长短30多支和弹药物资一批，革命形势初步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长期打算，坚持斗争（1946年6—12月）

东江纵队北撤后，广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特点是：随着东江纵队主力的撤走，留下来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复员，一部分暴露身份的干部进行分散转移，使革命力量骤然减少了。国共两党在广东的力量对比，国民党的优势更加明显。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宣告开始。国民党广东当局认为，这是彻底消灭广东革命力量，巩固其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的大好时机。于是，东江纵队尚未撤离，国民党当局便接受蒋介石对广东驻军下达的密令，进行一系列的反共部署：在原来人民武装活动过的地区进行“清乡”，彻底肃清尚未撤退的留粤武装人员。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罗卓英和保安副司令韦镇福主持召开全省治安会议，制定了全省缓靖计划，公开诬蔑中共领导的武装为“奸匪”“土匪”，中共活动频繁的地区为“匪区”，限令肃清。

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在石岐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采

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手段，务求在短期内消灭五桂山区的革命力量。8月7日，县长张惠长、警察局长吴康楠、国民党中山党部书记、县参议长陈思危、四区区长程任民等亲自率领县保警6个大队（营）及地方反动武装2400多人，采取“网形合围”战术，先行“扫荡”平原，紧缩包围，向五桂山区的长江、合水口、石门、石莹桥、槟榔山和凤凰山区的正坑、东坑、里神前等重点村庄，追踪围捕，在珠江海面沿岸用武装船只堵截，进行“清剿”，并派兵长期驻守五桂山区腹部村庄。国民党驻军在石门地区的田心村，长江地区的中心村，凤凰山区周围的重点村庄南溪、鸡山村、那洲村，反复“扫荡”，凡武工队活动的地区，逐村包围，逐户清查后，即将全村居民集中于村中空地广场，要每户的户主站出来，按户主的父、母、妻、儿女集中，待每户汇合完毕，留下无人认领者，作为“土匪”逮捕之。同时，所到之处，扬言要将山区群众全部迁移平原居住（并村），以断绝群众与武工队的联系。“母鸡回窝”（老鸡返巢）战术，即“扫荡”时突将兵力撤走，片刻军队即转回包围搜查。“拂晓攻击”，即军队深夜分兵包围武工队活动的村庄，待天亮时即全面封锁“清乡”。实行“联保联剿”“联保连坐”株连九族，强迫人民每5户联合写具结，互相监督，互相告发，发现与武工队联系者，以“通匪”论罪，杀害或投进监狱（感化院），轻者罚款保释强迫“自新”，直至株连亲友。确是豺狼当道，一片白色恐怖，另对山区外围地区起用反动地主、恶霸势力建立联防自卫队，为其反动统治的基础力量。

武工队以坚定胜利的信心，积极行动，粉碎敌人严厉的8月大“扫荡”（1946年8月）。实行坚持分散活动，采取化整为零，武工队分为若干小组（3—5人），以外线为内线，深入敌人管治区内活动，五桂山区的深入石岐附近地区、南朗、关塘埔、石鼓挞、长命水、三乡附地区的沙岗；凤凰山的武工小组突入敌人心脏后方地区的前山、兰埔造贝、柠溪向群众宣传，找保、甲长谈话，宣传武工队宗旨、政策，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武工队的行动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扑空，顾此失彼，从而有力地粉碎国民党反动当局精心策划的1个多月的大

“扫荡”。但是在大的“扫荡”中，石莹桥民主政权乡长钟泰源、石门复员人员贺北水、郊塘下村妇女干部郑炎被敌人逮捕杀害；敌人包围石门，武工队长甘国良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六区警察在鸡山村与保长密谋设伏，武工队黄暄（战士）英勇牺牲，小组长杨润平重伤，幸获杨寮村群众抢救安全转移。在此期间，军事特派员甘生、副政治特派员黄乐天，前往澳门领导机关汇报和请求工作。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黄佳决定，召集坚持在中山五桂山区斗争的部分干部到澳门领导机关（位于澳门高望街）学习和开会。参加学习的人员：黄乐天、郑吉、吴当鸿、郑文、李斌、凌子云、甘正嵩。学习、会议内容有：总结坚持斗争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传达中共广东区党委对敌斗争的目前形势和今后方针、任务。会议研究当时中山的革命和任务，提出“分散活动、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做到：（1）把部队分散在山区及外围的各村庄，密切联系群众，宣传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对敌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三征”（田赋征收、征兵、征税）合法斗争。（2）今后一段时间内（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进行军事出击，麻痹敌人。（3）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向平原地区开展活动，发展自己的力量，避免树敌太多，增加自己的困难，对平原的乡、保、甲长，凡不是死心蹋地与我为敌的，要尽量争取利用，以便开展工作。（4）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开展税收、公粮征收工作，解决经济给养。

会议结束后，随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郑吉调往番禺，甘生调往东江。中山特派室核心实行统一领导下，具体分工负责，政治特派员黄旭、黄乐天主管财经工作，吴当鸿主管凤凰山区工作。为确保澳门会议决定的落实，决定部分武工队指战员暂集结于五桂山区石莹桥地区黄牛坪村，传达澳门会议决定，教育干部战士，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整顿组织纪律，增强团结。

（选自《中山党史》1999年第2、3期，2000年第1期）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山武装斗争

□梁冠

我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山的武装斗争划分为3个阶段比较适合。第一阶段由1945年8月至1946年底，是隐蔽下来、站稳脚跟阶段；第二阶段由1947年1月至1948年12月，是初步发展阶段；第三阶段由1949年1月至10月，是大发展阶段。

1945年，我在九区梁伯雄大队九中队任中队长。农历四月十二，九区事变发生，梁伯雄部队被敌人打垮了。农历四月二十一，我从小榄回到五桂山。当时我对五桂山情况不明，就从崖口下车，来到1943年前我活动过的下沙围地区，不想一到就见到欧初、罗章有两位支队长。原来敌人正在五桂山区大“扫荡”，他们在这里掩蔽。我将九区事变前后经过向他们汇报，欧初听完后对我说：“你辛苦了，先休息两天再讲。”他交代我下一个礼拜到合水口见面。第二天，欧、罗两位同志回山区，我在下沙休息。到第六天，我从九堡到合水口找欧初，但没有见到，只是到下午5时左右在凌子云家见到凌子云、吴子仁两位同志。我一个人在合水口掩蔽了一晚，第二天中午欧初来了。他交代我再上一次九区，找苏志的妹妹苏英联系。欧初写了两封信连一笔钱（伪币）叫我交给苏英，同时口头交代三项任务要我转告她：一是将事变中被捕释放出来的同志分批收回来在五桂山集中；二是将疏散掩蔽的同志分批送回五桂山；三是转移尚未暴露的同志。我去到小榄，找到苏英，将信、钱交给她，并转告了欧初交代的三项任务，然后回五桂山，来回六七日时间。这时主力第一批已经东撤了，组织上安排我到海上中队工作。当时海上中队的中队长是卢少彬，指导员是唐森。后来卢少彬同志调走，我接替他的职务。

我中队曾护送4批五桂山的同志到东江。欧初带第一批主力过东江后，又回五桂山。第四批东渡前，有个朝鲜族日本翻译驻

石门九堡，他携带1挺机枪、1个掷弹筒向我部队起义。为了安全，部队派梁德等同志护送他过东江。在横门以东海面，他们的小交通艇同敌人的大船遭遇，这个翻译、梁德、交通员等十几个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最后一批是在农历七月十四之前，由欧初带队。出了金星门，潮水刚退，我们在淇澳附近海面休息。欧初指挥部队袭击淇澳岛上黄琪仔的土匪武装，打了一个胜仗。当天下午2点钟潮水已涨，全体同志安全到达宝安县黄田村。任务完成后，海上中队用1艘大虾罟船、1艘电船载20多位同志回五桂山，由唐森带队，我不在场。船到金星门海面被敌人包围，2条船都被炮火打沉。大船上的10多位同志安全上岸回到五桂山，电船上6位同志牺牲了4位，另两人被渔民救回。海上中队从此结束。以后打通了通往九区的水上交通线，梁根、周少玉、吴添带、徐玉、黄就等人一直坚持到解放。

主力东撤后，老区群众的思想有些乱，看见大部队已经东撤，主要负责人离开了山区，只留下小部分人坚持，敌强我弱，天天“扫荡”，大多数群众包括我们的基本群众信心不强。我们到沙田平原区开展工作，群众同样害怕。当时治安很乱，惯偷很多。经过研究，我们先将小偷集团的头目镇压了，治安有了好转，群众开始敢接近我们。我们就派人到每个围保护夏收。崖口有个土恶霸谭中善，当了伪乡长，民愤很大，乡民要求铲除他。我们请示曾谷之后，将谭中善捉了，罚款之后杀了，这次行动牺牲了一个叫杨三的同志。打了这一仗，附近其他土霸，如谭森、郑汉、郑藻等都怕了，原来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公粮能拖就拖，这一下自动就将公粮交来了，其他地方也跟着交。平原的治安大有好转，我们部队在群众中的威信也高了。

1946年6月，领导层有些不和，主要是林辉与黄乐天之间的矛盾。曾谷同我们研究，必须把我们部队的团结搞好，于是通知各地武工队负责同志回来开个会，帮助他俩解决分歧。会议地点在长江大寮村。

这次会议还研究打洲仔的伪乡长，一个土霸。结果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耕牛，还有渔网等大批物品，我们部队在五区各地的

威信更高了。但事后有人问：洲仔应不应打？是否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我的看法一直不变，这次会议我还要提：是要伪乡长一个，还是要几千农民、蚝民？当时不打洲仔，乡民不能出海，没出路，没饭吃。我们帮几千农民打洲仔，镇压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使几千群众能够生存，打这一仗没有错！但是我们有缺点。打了胜仗，当晚就应撤回五桂山，就不会有后来的大损失。当日我带一部分同志从海上回到下沙围（四顷），曾谷、甘生、林辉、当鸿等仍在银坑。第二天，他们在鸡山被敌人包围，打了一天，半夜由曾谷带队撤到下沙围我的驻地。他们一到，我就发现长沙埔方向有手电筒光，当即派黄就胜、甘记玉上山搜索。他们搜索回来说没有发现敌人。我判断敌人一定跟踪，就布置黄就胜用交通艇将曾谷、林辉几位同志划出朗林掩蔽，以防万一，同时派甘记玉带步枪班去蕉围瞭望棚放哨，汪瑞等3位同志上另一交通艇。但是他们没有将艇撑开到草林掩蔽，而是在闸口休息，到5点钟左右被敌人包围了，3位同志都牺牲了。这次损失了日本机枪1挺、“红毛十”两支、手枪3支（其中驳壳枪2支）。这次思想上有些麻痹，损失很大。

这里我要提一提好党员梁根。1946年冬至前，我和黄就胜护送曾谷从水路上中山九区。梁根是水上交通员，负责划艇。我们船到中山横门三叉海，敌人从三面向我们打枪，情况危急。我叫梁根把我们3人撑到岸边，他把空船划过去给敌人检查，就送老板上黄圃提货。梁根为了上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将艇划到敌人哨所，结果被敌人逮捕拷打至残废，但他始终不暴露我们的情况。我和黄就胜掩护曾谷经十顷我们的中间站梁全家，当晚到达九区将军庙添带家，见到方姐方群英。她知道梁根被捕，就发动群众用兄弟会的名义去保，说梁根是农民。敌人查不出证据，就将梁根放了回来。梁根现年已六旬，离休在家，因那次被打伤，身体不甚好。

1947年春节前5天，曾谷通知我 and 郑吉到澳门，交代我们到新区开展工作，我们服从组织。当时我同我爱人刘兆容还有郑吉从澳门过香港，再搭船到容奇，找到坝头市陈润家，方姐已经

在那里。郑吉的爱人冯兰因怀孕未同去。按照安排，我和刘兆容在坝头市建交通站，郑吉去万顷沙工作。我们事先商量好，我认方姐是我表姐，曾谷是我表姐夫，是个商人（走水客），用这些关系来掩护工作。我们住处隔壁就有个土霸，叫关宝珍，经常见到，工作起来确实很危险。正月初三，郑吉去了万顷沙。我负责容奇—古镇线，中间有几个点，一个是太坳，黄太大哥在那里，我们发动了几个青年出来工作；一个是曹步，李成在那里，也发动了几个青年；还有一个点是古镇的苏松柏，他负责古镇到江门这条线。中途我去过高沙，时间很短。1947年农历八月十五调我回五桂山，记得黄旭留了一份月饼和碌柚给我。我走后由郑明接我的工作。

刚才讲第二阶段从1947年春到1948年底。从1947年冬到1948年，各地武工队逐步发展，这时期我们的武工队已经有100多人，1948年我们将梁泰猷派给方姐，还派汤中去小榄。（方群英插话：泰猷没有交给我，给我的有汤中、廖仲芬、杨谦、赵满这4个排级干部。泰猷是你们派去三角开辟新据点的。）

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到10月，是大发展阶段。真正的大发展从二三月份开始。大谢（谢月香）是三四月份回来的，那时整个形势很好，有个姓关的来嵩埔谈判。（方群英插话：叫关宝珍，是个特务头子，这个人很坏。先到你那里去了，后来又到我那里，钻我们的空子，我没有上他的当。）这个人来嵩埔说能够帮我们买子弹，黄乐天就相信他，给他骗去8000元。这个人是在容奇附近住的。

1948年底到1949年初，我们培养了不少军事干部，后来分到各地发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当时考虑：国民党垮了，对投降过来的人，我们要整编，要派骨干去掌握，所以培养了一批班排级干部。5月，谭桂明回来了。他传达上面指示，特别提出如何搞策反工作。（黄旭插话：那时黄佳提出，对要求起义的国民党军队，要“大批订货，分批交易”。）

1949年夏，武工队已经大大发展了，有北平队、南京队等等。崖口有国民党一个连，约六七十人。我们事先研究，要下决心打，即使牺牲5个同志都要打垮他。谭春生有很大功劳。打崖口的详

细过程，刚才吴当鸿讲了，打了这一仗，震动了全中山。后来第三营第七连起义，起义后形势更加不同。当时我们缺乏政治干部，上级派了几十名大学生来，大多分到部队，还有一些分到地方，如派游雪去东坑学校教书，潘泉去三角，麦苗去八区，等等。

还有一件事：竹秀园有一个连的自卫队，全部美式装备，有重机1挺、轻机3挺、掷弹筒3个。这个连队是中立的，不打我们，但与大胆雄是死对头，后来我们将这个队全部缴了械。缴枪的原因，是我们事先找他们谈判过，结果谈不成。

回忆解放战争这几年，我们坚持了武装斗争的方针，队伍从无到有。解放前夕，除了黄伯龄那个连起义之外，石岐的驻军也曾找过我们，要求起义。我对他们说：“起义可以，你先给我守好石岐，损失一条咸草都要你负责。犯人要通通保护好，等我们入城接收。”到我们入城时，他们真的乖乖地排好队在华陀庙欢迎我们。这时郑少康已带了两个连先入城，接着我们入，大家在仁山会师。（吴当鸿插话：郑少康叫我们先在石岐外围扫清残匪，然后入城。）

编者注：题目为编者所加。该文系梁冠于1983年11月26日在珠江纵队一支队史（解放战争部分）座谈会上的发言。梁冠是原中共中山军事特派室军事特派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团长。《中山党史》1999年第1期刊载。

难忘的回忆

□欧素英

2005年1月15日，我到广州参加珠江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引起了我对少年往事的一些回忆。

076

一、程志坚老师影响我的一生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夕，在南朗安定村一座新落成的美丽的教学楼二年级的课室里，坐满了脸带稚气的孩子。讲台上，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师——程志坚，正在给学生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入侵中国，我们誓不做“亡国奴”，几万万同胞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不久，战争爆发了，程老师参加抗先队去了，我们失学了。1942年的一天，有人通知我去田边村小学，程志坚老师在那里等我。见到久别的老师，我高兴极了，她对我说：“抗日当前，每个人都要做抗日分子，不单是拿枪上前线打鬼子，还要做好多好多的工作。你敢为我送一封信吗？”我回答：“敢。”她教我把字条藏在手帕一角，遇到反动派时要镇定，危急时把字条咬碎吞下肚里。我按照程老师说的去做，把信安全地送到涌口村一条巷的2楼姓黄（编者注：黄茵）的大姐手里。

大概是1944年，有一次，程老师让人把我带去山区（刘振球家乡）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我第一次看到在土墙上贴着的满面胡须的“番鬼佬”画像，以及很多红绿标语：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中间小台上铺着一块白布，放着一个装着鲜花的花瓶，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女同志（后来才知道是谢月珍）正在讲话。我问程老师，那些“番鬼佬”是什么人？她告诉我，那是解放人类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后是中国人的大救星毛泽东。他们都是共产党人，我们抗日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在我小小的脑袋里，

当时就感觉到领导抗日的是好人，不抗日的是坏人，国民党、“大天二”都是坏人。其实，老师是通过各种形式来教育我，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以后，我除了上学外，接到任务都一定去完成。有一次，我拿着字条，光着脚板，戴着草帽，穿着单衫，从南朗步行，经左步到涌口门大水闸时，听到脚下“哇哇”的流水声，双脚在发抖，心在跳，刚巧又遇上一群“大天二”，边走边讥笑我，我紧记程老师的话“不用怕，镇定”，顿时平静下来。我安全过了水闸关、恶棍关，紧握手帕，第一次到李屋边村，找到了当时“白皮红心”的村长，他看了字条后带我走进一小巷的两层楼的屋里。真开心啊！我看到程志坚老师、张卿大姐，在榄边教书的韦华等七八位同志，他们正集中开会。会议由程老师主持，传达当前形势。她们汇报了情况及讲了很多道理，每个人都发言，轮到我时，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首长说过的两句话讲了出来：“抗日至上！爱国至上！”大家都鼓掌，令我全身发热。后来洗完澡，我没替换的衣服，张卿大姐把一件长衫给我穿上。我个矮衫长，几乎拖地，她就拿禾秆草编了一条带子给我缚在腰上。睡觉时，只有一张铁床，大家都说要给“妹妹同志”，让我睡上去，大家都睡在地板上。她们唱了很多歌，我学会一首叫《七月里》的歌，歌词中有句“我们政府发呀发命令，再过一年一定胜……”真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是，我敬爱的程志坚老师却不幸于1946年给国民党杀害了。然而，程老师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名字鞭策着我的一生。1982年，我赴港探亲，发了迹的同学叫我留下来工作，月薪上万港币；1991年，我赴美探亲，姐弟们都劝我定居夏威夷，我都一一谢绝了。老师啊！我想起了你的名字，革命意志要坚定，两次我都回到祖国来了。老师！在你的教育下，我热爱我的祖国，我没有辜负你对我的培养，你的音容笑貌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活在我心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二、“十路围攻”前夕，游击队里很平静

盘踞在中山的日军，是不怕国民党和“大天二”的，但最怕

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

一天，一位女游击队员约我一起去五桂山区大队部所在地——大寮探望我的哥哥。我缝好一个挂包，装上12只鸡蛋和一大块年糕，爬山涉水，走到天黑才到了流星队。正好赶上开饭时间，地坪上摆着两砵菜：猪鬃菜和萝卜干，饭是用磨了谷壳后揸过的米煮的，粗糙但有营养。我饿了，吃得很开胃。山区的春夜很美，四处山林影影绰绰，水田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鸣叫，空气是那么的湿润清爽。晚上召开军民联欢晚会，一声哨响，游击队员都围坐在地坪上。此时，有位中队长带着警卫员走了过来，他发现了我，问：“这是谁？”“是麒麟队欧章的妹妹。”“明天把她安全送出去。”我高兴地看到《朱大嫂送鸡蛋》等短小精悍的节目，心情平静。晚上，在2楼的地板上，男队员睡一边，女队员睡另一边。我很不习惯，和衣躺下，东想西想，待东方发白，我们就出发步行到大寮。到了大寮，看到竹林里，游击队员拿着枪，叫着“一、二、三”在操练，步伐整齐。远处的山溪水中，一群群的女同志唱着歌，有的在洗脸，有的在摘山花，一幅清晨游击队员生活在五桂山脚下的美丽景象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多么羡慕！多么向往啊！此时哥哥发现了我，我也高兴地叫起来。队伍解散后，他过来问我：“你怎么到这里来？”看他生气了，我说：“我来慰问你，带来的鸡蛋打烂了一半，还有年糕、挂包……”他接着说：“你快回去，鬼子快要来围攻了。”我说：“我不走，我要参加游击队，我见到了程学一几位大姐，她们会欢迎我的……”他说要向大队长报告，没等我说完就气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说：“大队长说你年纪小，是个学生，尚未暴露身份，最适合做掩蔽我们派出去的同志的工作和送情报。这是抗日，一样有意义，快回去吧”。

直到第二天晚上，我才垂头丧气回到家，偷偷地把我去游击区见哥哥的事告诉了母亲。不久，游击队派了一位叫郑英的同志住在我家，我协助她开展工作。我骗爸爸说：“她是由南路来的老师。”不久，听到了游击队粉碎了日、伪的“十路围攻”的消息。

三、震惊日军的墟日

南朗接近五桂山，是石岐至澳门东路的重镇，每逢二、五、八是墟期。我的爸爸欧仁普继祖父业，在南朗的浩隆五金店做生意。他是位爱国归侨，早在温哥华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抗战期间，曾被南朗商人选为会长。商会每月集资 500 港元给抗日游击队作经费，爸爸负责交给部队派来的许德胜，花名“大斑胜”，交款地点在我家的店铺里。大斑胜从铺面入，铺尾出，经新田地、西村，返回游击队。我和母亲分前后门放哨，每次大斑胜都安全离去。

1944 年农历七月的一天，是墟期，街里人头涌涌，日军 10 人一组，举着枪尾剑，照例巡逻。日军刚过去，李旭军就走进我铺，坐下喝茶。他是我的舅母的侄儿，又是和我的哥哥一起参加游击队的。哥哥偷走了爸爸从国外带回的毛毯剪开与李旭军一人一半，卷着上山打游击去了。他是常客，此时他身上藏着短刀短枪，原来部队派他出来执行任务。当他看到日军巡逻队回岗换班，就从铺尾跑出去，经新田地到了墟尾，这时侦缉队正在向摆卖番薯、猪仔、蔬菜的客家人收税，蓄意为难，说他们是游击队派出来的采购员、侦察员等。李旭军看准为首的，马上上前抓住他的衫领，一直拖到墟尾闸门外，对他宣布：“你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抗日游击队派我对你执行死刑”。话音未落，血流满地。此时鸡飞狗走，瓜果满地。李旭军完成任务后，撤回西村。日军闻讯列队跑来，不知什么事，如临大敌，在墟尾开了几枪，看到只有一个人被杀就收队了。可是，此时我爸爸吓得面如土色，口口声声说“不得了”，他怕坏人告密，全家六口被抄斩。我给他倒茶，安慰他：那个密侦极坏，收集游击队情报，罪有应得。不杀他，我家也有危险，处决他是大快人心的事。李旭军好样的，为民除害真勇敢。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国民党统治区及一切反动派，仍与共产党为敌，与人民为敌，斗争仍很激烈。我也上了中学，后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解放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努力

工作。回想当初，十分感激我的老师程志坚和游击队对我的影响和培养，使我无悔今生。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革命生涯实录

□郑永晖

革命不是绣花，而是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友、我的斗争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就要求革命者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在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在秘密工作环境下，注意掩护，避免暴露受破坏；在战争环境中，讲求战略策略，注意团结群众，孤立敌人，壮大保存自己，最后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不仅是对革命者的很好的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081

一、参加东南特委举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

1939年初，我参党后不久，中山县委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派我和肖志刚、肖伟华、黄友涯、廖铎5人，参加东南特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该班共有50多名学员，都是东南特委属下各地派来的党员干部。当时学习的地点是在东江地区刚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惠阳县坪山镇农村的一家比较宽敞的民房楼上。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学习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学习班上，我们经常见到的东南特委的领导同志有梁广、韩凯亚、温卓华、杨康华等。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党的建设知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等。

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革命思想的第一次飞跃。首先是从理论上较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组织，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队员，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其次认识到中国抗战是持久战；第三，对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

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对我在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住考验，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二、在抗日群众运动中经受考验

我从东南特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结业回到中山以后，正是中山县抗日群众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的时期。

1938-1939年底，日军已侵占了广州等地，企图入侵中山，如两次横门登陆和汽艇骚扰八区斗门和五区古宥等地，因此中山抗日群众运动达到高潮。但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反共高潮，中山县国民党党部书记林卓夫以及中山县警备司令部吴康楠等人，对中山抗日群众团体进行镇压，宣布解散中山抗日妇女协会和中山青年抗日先锋队。在这期间，由于党组织的不断扩大发展，五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有了很大的变动，五区区委书记郑仲光调中山县委工作，由廖铎接任以后由黄君约接任，不久黄君约又调到了九区工作，由张诚美接任区委书记，郑少康任区委组织委员，我从党支部书记提升为区委宣传委员，并接任青年抗日先锋队区队副张诚美的职务，因此我的工作是比较繁重的，但当时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虽然有肺病，仍坚持工作。在此期间我记得曾带领三四十名抗先队的武装队伍，开赴古宥乡的山头，监视日军汽艇，准备挫败其在古宥乡登陆的图谋。在日军撤离后，受到抗先队区队长孙子静(当时的国民党五区区长)的慰问和赞扬。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林卓夫解散县妇女协会和抗先队的行径斗争的同时，我们坚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仍用抗先队名义演出抗日话剧，与国民党当地派出所郭警长进行斗争。在国民党五区区委召开宣布解散县妇女协会和抗先队的会议上，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活动。直至1940年3月，日军占领中山县，根据党的指示我们才撤出三乡平原地区，进入五桂山区社贝乡和田心空鸦村隐蔽活动。

在日军进驻雍陌乡，三乡已建立伪政权后，我和郑少康组织原三乡抗先队的武装，对雍陌乡的日军和伪联防队，进行武装袭击、骚扰并破坏了公路。

三、从公开的群众运动，转入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由于日军全面占领了中山，并建立整套县区乡的伪政权，加强对中山的统治，中山县的整个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我们的公开活动，后来组织派遣我于1940年夏从五区撤到四区山区的白企、贝头里村任小学教师，做一般的宣传工作。

1940年8月，为了做好掩护工作，经组织批准，我与郭妙莲结婚，一起在贝头里村生活。我与郭妙莲的结合，一方面是双方母亲之命、媒妁之言，另一方面也是双方的自由恋爱。我们的结合是经过双方母亲的安排，并经刘帼超医生介绍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抗日战争的群众运动中，经常工作在一起，并在工作中逐步建立起感情来。开始我的思想还有顾虑，觉得郭妙莲因家乡（中山县九区阜沙）遭受水灾和风灾，倾家荡产，被迫给平岚乡郑三婆当婢女，社会地位低微，会影响自己声誉。但参党后由于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社会地位低微的婢女，是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应该感到光荣，不应作为思想负担，因此改变了过去的错误观念，才决定把这门婚事定下来，并介绍她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环境，工作比较紧张，也没有考虑过结婚问题。到了山区，学校教师生活比较安定，结婚也有利于掩护工作。因此我向组织提出这个意见，组织很快就批准我的请求。

1940年底，我被调至四区沙边乡校任教，并负责领导该乡的党员教师和矿山工人党员工作，直接受中山县委宣传部长黄峰单线领导。郭妙莲同时调到四区平原的畔沙乡与孙创等同志负责交通站的工作。

1941年夏，我又被调到中山二区任特派员，负责溪角乡、庞头乡交通站和地方党员的单线领导工作。为了找寻职业来掩护工作和解决生活问题，曾作过很多尝试，做过上街叫卖水果的生意和街边的摊档小贩，但都难于解决经济收入问题，并且不利于进行秘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到沿街叫卖抽油（即酱油），能维持生活，而且只在早晚的时间做买卖，既有利于接近群众，了解他们的情绪，也利于做宣传和开展党的工作，因此决定做起

沿街叫卖抽油的买卖。我由一位教师，变成了沿街叫卖的小贩，的确在生活 and 感情上，都起了 180 度的转变，思想上是有着斗争的。但是考虑到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党的革命事业，为做好以职业掩护自己的工作，也就乐于去做这些工作。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仍然困扰我，以致在开始叫卖抽油第一声，走了一段路程方有勇气叫卖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与庞头乡、白石乡等几条乡村的沿街顾客，混得比较熟了，有些顾客一时拿不出钱来，我就赊给他等下回再收钱，顾客就这样对我产生了好感。我原来住在溪角乡，是乡党员刘××通过组织关系为我找的住处，因为该住处地方比较小，又当街，不利于掩护工作，想找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因此我在庞头乡到处打听，是否有闲屋出租。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说：“我这里有一间比较大的闲屋，很久没有人住了，价钱也便宜，不知你敢不敢去住。”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间屋 10 多年前就建好，是我的堂兄弟一家人住的，住了几年全家都死绝了，据说是屋的风水不好，有时还会闹鬼呢，他们一家人死绝后，我就为他们管屋，锁匙还在我这里，如果你想租，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屋就在这里附近。”我听了她的介绍后，感到很合适，至于风水好坏和闹鬼，这是封建迷信问题，我是无神论者，当然是不会信邪的。我就对她说：“请你带我去看。”她拿了锁匙，把大门开开，因为很久没有人住过，开门后果然有一股阴森森的空气扑来。进去一看，只见厅堂有 20 平方米左右，厅堂后有神龛，神龛后有 15 平方米的住房，住房内还有阁楼可住一二人。左边还有比较宽大的厨房，而且炉灶俱全，厨房还有后门，可以通到后面的街上。我看了感到很合适，马上答应她并交了定金，过两天就搬过来住。我马上告诉溪角乡的党员刘××并报告组织，组织很快就批准了。

我在庞头乡住下后，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生意也越做越好，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还能养起往来的交通员。在我找到比较合适的住处后，组织上为了安置好女交通员的工作，也为我的工作作掩护，曾派郑志德和我住在一起，她住在阁楼上，

对外假称夫妻，对内是上下级关系。郑志德是三乡桥头乡人，过去是比较熟悉的。我考虑到我是共产党员，是有妇之夫，又跟她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始终保持同志的关系，没有出现过越轨行为，受到组织和郑志德的赞扬。这段时间不长，只有两三个月，但也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

我当时的的工作，除了做党的交通站和联系党员外，还负责了解敌、友、我各方面的情报工作。我在做小贩生活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群众，并通过群众了解到许多民间疾苦和各方消息。

我还利用捐挑小贩职业之便，利用前往石岐公信酱油店购买抽油的机会，把货物购妥后，便外出与上级领导的党员联系工作。如到长洲乡党员黄社雄家里，传达组织决定和有关指示，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因黄社雄是长洲乡一个地方灰色武装中队的主要负责人，他家里是个大家族，生活比较阔绰，家里设施也比较辉煌，如果我的穿着不像样，仍穿着挑卖抽油的衣服，就很不相称。因此还要在附近靠池塘边的公共厕所里，换上一套像样的时装，才敢进他的家门，以掩人耳目。

大约在1942年初，党组织为了开展沙田区工作，又派我到二区横栏乡沙田藕围村工作。组织考虑到我的工作需要掩护，也考虑我与爱人长期分居，决定把我爱人调在一起工作。为了以职业掩护我的工作，我们通过当地党和群众的关系，租了一间草房，开设一间商店，由郭妙莲看铺，做生活杂货的小生意。考虑到门市生意有限，收入不多，决定还是采用捐挑上街办法，才能解决生活问题。但是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沙田地区群众生活必需生油、火水（即煤油）销路较好，因此决定改变为卖生油、火水，不做酱油佬了。当时组织还派了党员林文亮和他的小弟弟林文光，随我到横栏工作。林文亮靠每天理发维持生活，兼做交通员工作。他的小弟弟随着我一起生活。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通过捐挑上街卖生油、火水跑遍了横栏各基围，生意也越做越兴旺，不仅能养活过往交通员，而且还有了积蓄，交通站的工作任务，也完成得比较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第一个儿子诞生了。但由于地处偏僻，没有接生医护人员，小

孩呱呱落地后，又不会护理，可怜一个白胖胖的男孩，生下不到半天就夭折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组织下达命令，把我从地方党调到武装部队去工作。

为了执行党比较紧迫的任务，我安排好工作和爱人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征途。

四、从地下党工作转入公开的武装斗争

1943年初，经过中山县委宣传部长黄峰的介绍，交通员把我带到五桂山区石门乡，谢立全（当时的陈副官）接见我，经过简单的介绍后，要求我等待接受任务。当天下午，谭桂明和我谈话并交待我的任务：回中山五区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开展五区的武装斗争工作。并派人带我到五区的凤凰山东坑村，负责游击部队的领导工作。该部队为一小队编制，小队副队长叫刘文辉，班长有谭北师、郑华胜、唐森等人，队员30余人。枪支全是七九步枪，装备比较落后，但队员情绪比较好。谭北师和郑华胜以前都是三乡的抗先队员，我比较熟悉。熟悉情况后，我便开始进行我的工作。

我拿着谭桂明给我的亲笔信与谭北师两人去见国民党游击司令部驻南溪乡的大队长钟汉明，并把我们部队的情况和他说了，要求他给我们番号回三乡一带活动。他表面热情接待，但听说我要用他的番号回三乡一带活动后，却说要考虑考虑。经过数次找他，仍是没有正面拒绝，而是采取拖延的办法。我把情况向谭桂明汇报后，谭桂明认为，不能长久拖下去，决定另找别的门路。谭桂明后来又写信给我到八区去见我们部队陈中坚大队长，叫他写介绍信给我去见民利公司的头头吴金。我和谭北师通过各种办法见到吴金，说明来意后，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却叫我们到申堂乡，去找他的属下曾添裕大队长。曾添裕比较爽快，说不能给民利公司番号，只给当地联防自卫队的番号，同意我们在申堂乡宝鸭山村等地驻防。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同意我们在申堂乡一带驻防，却符合我们的心愿。因为宝鸭山村，过了佛仔运山头，下山到南龙村，不远就是三乡的平岚村了，这有利于我们回三乡进行武

装活动。经过谭桂明批准，我们便把在凤凰山东坑村的部队，拉进申堂乡宝鸭山村的民房碉楼里。我们在开展部队改造训练的同时，对当地群众也迅速开展抗战救国宣传教育和减租减息工作，得到群众的同情拥护，为以后开展游击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利用回平岚家乡之便，与过去的党员郑文滔和其他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联系，教育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抗战，振奋精神，而且通过他们，了解平岚乡伪联防大队长郑东镇驻防部队及其装备等情况。又恢复郑文滔党员的组织关系，并派他利用他哥郑文培在郑东镇部队工作的关系，打进郑东镇在三乡的伪联防队，了解郑东镇内部的装备布防等情况，向谭桂明报告。这对以后配合主力部队活捉郑东镇，消灭他们的部队，起到很好作用。

我们的主力部队在1943年5月间活捉了郑东镇后，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以便控制三乡政权，决定成立五区独立中队，将原驻申堂乡宝鸭山村的部队核编为独立中队。中队长为郑兴（后叛变），中队副为郑吉，中队指导员为郑永晖。为了适应当时还不能完全在军事上控制三乡，但政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需要，我们采取过渡形式，建立三乡联乡办事处灰色的政权组织，由原来平岚、乌石、桥头3个乡村派出乡长组成。并推选郑永晖任联乡办事处主任，负责三乡一带的政务和推动各乡的民主建设工作。

在这期间，欧初还交代我一项任务，去做澳门的统战工作。据欧初介绍，驻山区贝头里村的部队，扣留了到该村传教的澳门葡藉教会的安神父。因为在战争年月里，到山区来有嫌疑，经查无实据，更重要的是澳门敌、伪、顽的矛盾很多，日军又有侵占澳门的企图，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争取澳门为我所用，这是非常有利的。在审查安神父过程中，了解到他与三乡的刘帼超医生是教友，与她经常往来，而刘帼超医生又与我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决定派我护送安神父回澳门，并通过他去做澳门当局的统战工作。我带着安神父回到三乡，把上级的指示转达给刘帼超医生，希望她多做安神父的思想工作。经过刘帼超做安神父的工作，安神父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传递工作。我们到澳门后把欧初的亲笔信交安神父转澳督，第二天他们便派澳门警察头子慕拉士与我见面，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说明来意，表明我们的态度。他除了表示感谢外，答应按欧初信中的建议，加强与我们的联系。当时虽没有很大收获，但事后不久，他们便派人与我们东坑的部队联系上，以后更为我们解决了电台、枪支、弹药、医疗器械药品等，解决了我们许多实际的困难。

三乡联乡办事处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并乘我军在前山、翠微、神湾、三溪等歼灭顽军的有利形势，于1944年10月，召开了已建立民主乡政权的各乡代表会议。当时参加的乡村有平岚、乌石、桥头、平湖、沙岗、大布、鸦岗、南龙、南坑、白石等。会议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郑永晖为谷镇区政权筹备委员会主任，郑文、郑济民为财经委员，马华谭为民政委员，郑迪伟为妇女委员，周进为武装委员，李远帆为民教委员，孙一之为秘书长。

谷镇区筹委会成立后，立即紧张地进行各项工作。首先，协助各乡进行民主选举工作，选出新一套民主乡政权人员，以便正式成立谷镇区民主政权。第二，建立区政权武装集结队和各乡镇民兵自卫队维持地方治安，镇压汉奸和反动分子，并选派古池和林开担任区集结队副队长。第三，协助主力部队扩充新兵源，建立健全粮站、税站、医疗站。第四，救济贫民，排解民事纠纷，禁烟禁赌，并将原桂山高小学校改办为桂山中学，同时恢复各乡已停办的小学，兴办新的小学。第五，做好乡村的统战工作，团结开明士绅，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

在这期间，司令部发现郑兴的腐败行为，撤销了其雪花队中队长的职务。在我们歼灭了三乡伪联防大队，活捉郑东镇大队长后，为了把郑东镇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交回抗日部队作军需，曾派郑兴向郑东镇家属催要款项，不料郑兴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在郑东镇家属的引诱下，腐化堕落，竟住食淫乐在她家里，不以为耻。与郑东镇未被消灭的打手，同流合污欺诈群众，造成极坏影响。后经司令部林锵云亲下手令，命霍文中队长前来找我和郑吉商量如何逮捕郑兴回司令部处理。我和郑吉约郑兴来开会，把林锵云手令交给他看后，马上缴了他的手枪，由霍文把他押回槟榔山司令部批判教育，看管起来（后来在司令部挺进中区时，在

海洲乘管理人员管理不严，叛逃到国民党反动派萧天祥部队，成了叛徒)。司令部根据雪花队情况，决定任命郑杏为中队长，以后又从中山二区部队，调周增源（即周进）为中队副，中队指导员仍为郑永晖，并从主力部队调谭光耀任小队长。以后又扩大编制，从40多人增至60余人，充实装备，增加机关枪和步枪，并加强部队的领导工作。

谷镇区筹委会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深得群众的拥护爱戴，也得到上级的赞扬。到1945年3月，成立谷镇区民主区政权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经请示县督导处批准后，决定于3月中旬，召开谷镇区民选各乡代表大会，由各乡民选乡长参加。参加会议的各乡代表，除原来参加筹委会议的各乡代表外，又扩大了许多新的乡村，如雍陌乡、里埔乡、外埔乡、西山乡、萧家村、塘墩乡、申堂乡、古宥乡、神湾乡、三溪乡、麻子乡等。在大会期间，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亲临指导。他除了肯定筹委会工作的成绩之外，还提出今后工作的方向，会议开得热烈认真。在开始选举投票时，阮洪川代表督导处提出：郑永晖因工作需要，调县督导处工作，他不参与这次选举了，请大家另选其他。因此，选举结果除由郑吉接替我的职务外，其他委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

在选举前阮洪川找我谈话。他说根据上级党委和林叔的意见，调你上督导处负责民兵武装工作，征求你的意见。我当时心里实在是舍不得离开工作多年的家乡，认为自己工作有成绩，工作比较顺利，而且孩子郑建国生下来不久，担心爱人没人照顾，但是想到党组织已作出决定，工作确实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是党员的天职，于是交代好了工作，告别亲人，又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五、接受统战工作任务

在我接受新的工作前，阮洪川还交代我先去接受欧初的工作任务，因此我直接到欧初那里去报到。见到欧初，寒暄几句后，欧初笑着说：“又要你去搞统战工作。这次是去做‘大天二’民利公司的头子梁自带、吴金、潘惠等人的工作。随同去的有凌子云、

甘保芳等人。你代表支队部和督导处去做他们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情抗战和互相支持，同时把我们缴获的10个掷弹筒炮弹送给他们，宣传我们粉碎敌伪“十路围攻”取得的胜利，也把山区群众遭受敌人抢掠烧杀的惨状和苦难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给予同情和经济的捐助。”我接受任务后，便与凌子云、甘保芳商量，决定工作具体步骤便整装出发。按计划我们出了山区，便从水路乘坐小艇，直到九区阜沙圩，去找梁伯雄，把欧初的意见向他传达，并通过他们派人带我们去见梁自带等人。

这次还算凑巧，梁自带、吴金、潘惠等民利公司的头子都在浮圩。见面后，我们把欧初的亲笔信交给他们，并把来意说明，将10枚掷弹筒炮弹赠送给他们，他们表面上表示欢迎和热情接待，梁自带还解囊相助当时国民党政府的5000元给我们。但从他们的言表来看，他们对我们的这次行动，还是比较警惕的。

我从九区回来向欧初汇报，他除肯定我们的工作成绩外，又交代我一个新的任务：叫我到五桂山区周边的石鼓墟乡，去做民利公司属下大胆雄大队长下面的一位中队长的统战工作。这名中队长是一位年轻有为、思想比较进步的中青年人，我和他的接洽过程中，说话很投机。我把我们的意图说明后，他表示非常赞成我们的看法，认为当前国内投降分裂的危机是十分严重的，赞成我们反对投降分裂的主张和采取的措施，表示同意和我们加强联系，互相支援。当天晚上他留我在他家食宿并谈到深夜，第二天早上早餐后，他还送我一程路，再三表示愿意今后互相支援。

六、在“五九”大“扫荡”中，坚持山区掩蔽斗争

我完成这次任务回来向欧初汇报后，便回到督导处，接任民兵武装工作。我清楚记得，接任民兵武装工作后，只到过四区的小隐崖口等乡检查工作。不久敌、伪、顽便开始对我们进行“五九”大“扫荡”，我们督导处的几位领导，包括曾谷、张为以及五桂山区政权的凌子云、甘保芳等人，在合水口和石门九堡等地与敌人周旋，后来形势越来越严重，敌人开始进驻部分山区，我被派到长江乡横兰村和破获村工作。当时在横兰村掩护的有黄彩娥、

穆老师夫妇及其小孩等人，在破获村掩护的有大斑胜（许胜）、金星等。我在长江乡工作的任务，是与长江乡乡长龙焕榕联系，做“反扫荡”的群众工作。

我们掩蔽在这条深山沟的横兰小村子里，白天出去附近村庄活动，夜里也不敢睡在村子里，而是睡在村外路旁的树林中，以防敌人的夜袭。有一天早上4点多钟，敌人的马队果然经过横兰村，马蹄声听得非常清楚，好在敌人没有进村搜索，我们又在村外树林里，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只是虚惊一场。当时的敌情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下来，安定群众情绪，并通过与乡长加强联系，了解敌情，经常向县督导处报告情况。

当时由于通讯工具缺乏，只靠交通员传递信息，知道敌人联合向山区进攻“扫荡”，并进驻石莹桥乡等地，平原地区的主要乡村如五区三乡等，都以为被敌人占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不少为敌人逮捕和杀害，但具体情况都不是很清楚。对我的爱人郭妙莲的情况，也无法弄清。

我在长江乡掩蔽下来，开展群众工作，一直坚持到1945年7月间，才接交通员黄华旭带来上级的通知，与许胜、郑吉、冯兰等人，撤离山区。经过澳门交通站和香港交通站，转到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宝安县盐田乡与撤到东江来的中山部队会师，并参加部队的干部整风班学习。因战争环境，整风学习时间不长，但是对延安整风精神，有了初步了解，为以后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久在准备挺进粤赣湘边开展新的游击根据地，与王震将军会师的行军途中，接到上级通知说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停止了与王震将军会师的计划。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就在这个高兴的日子里，接上级通知，先撤回香港，等待时机回中山县开展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

七、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的活动

我随同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滨海区民主政权主任吴子仁、五桂山区区政权妇女委员谢月珍等数位同志回到香港后，根据当

时情况，上级决定各找各的亲戚朋友暂时栖身。我姐姐郑胜（后改名为郑妙英）住在香港深水埗，我记得从中山县经过澳门撤到东江经过香港时，曾偶然在街上遇见了她，并去过她的家里。那时香港还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统治下，他们一家三口，穷困至极，姐夫曾是非常壮健的人，但因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百业衰弱，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捱饥抵饿，营养不良，又患疟疾，周身浮肿，十分可怜，但住的地方还可以，所以我决定回到她那里暂时安身。但这次回到她家时，日本侵略者已投降，英国政府正在接收香港，救济居民。我见到姐姐时，她的丈夫不幸于上月已经去世，她母子相依为命，靠英政府发救济粮度日，生活十分困难。但我只好在她家住下，把组织交给我的一些盘缠，交给她作维持生活之用。不久阮洪川安排我到一间洋行的4楼一间很阔气的房间，这里作为饶彰枫与香港市委和民主人士接头开会的地方，每月经费，包括房租和膳食由饶彰枫支付，生活也比较清闲，但好景不长，大约经过两个月后该地点撤销了，组织决定让我仍回到姐姐处，自谋生计，等候安排工作，并指示凡撤到香港来的都要按“投亲靠友，自谋生活，坚持下来，开展工作”的方针。为了立足香港，解决生活问题，凭着过去的经验，我又去学做街边小贩的生意，但城市生活不同于乡村，小贩生意难做，难以维持生计。以后得到郑三婆的资助，筹来500元港币，这在当时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但如何发挥这笔钱的作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后来与郑文商量拟参加他们开业的茶居，他们也满口答应，认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但投资后不到几天，他们便宣布停业，把我非常难得的500元港币抵债，收不回来，以致我的生活发生困难。在生活无着，也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下，看到我姐同房的小贩，做当时香港政府配给市民的大米生意的买卖，一买一卖颇赚钱，想向他学做这门生意，他也答应帮忙。但他说要做这门生意不容易，要参加他们的小贩工会，才能站得住脚，否则会被人踢档的。我征求过我姐姐的意见，她也认为没有问题。我为了解决生活，坚持工作，不惜花了一笔钱（约当时的30港币），参加了他们的小贩工会。参加工会那天，我姐姐同房的小贩，带着我去见他们的头

头。寒暄几句后，他表示同意接收我为会员，但他要我举行入会仪式。当时我以为是一般的仪式，也就答应了。入会仪式开始时，才知道要叩拜关帝，刺指为盟，我当时感到有些不妥，但钱已花了，也不好推辞，只好照着他的办。事后不久接到上级通知，要北撤山东烟台，又忙于交接工作任务，也就没有做买卖大米的生意了。

八、北撤山东烟台深受教育

我接到北撤通知，是通知我个人去的，不知道还可以带家眷。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便只身跟交通员和谢月珍等数人到宝安县沙鱼涌的部队报到。到沙鱼涌部队报到后，看到不少人都带着家眷同去，考虑到郭妙莲是党员干部，我们结婚后，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留下爱人在香港生活有困难，而且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想念及此，鼓起勇气向组织提出请求。组织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后，经批准我再回到香港与爱人商量，于1946年6月底，一同北撤山东烟台。

我们长期盼望抗战胜利，终于盼到了，但没有想到国民党又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们调集大量的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进攻我们的解放区，企图彻底消灭我们的军队，占领我们的解放区。经过我们部队的坚决还击，他们损失惨重，后来又改变策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中央为了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做出种种退让，其中包括答应把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到北方的解放区来。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只承认东江纵队，不承认其他纵队，包括我们的珠江纵队、中区纵队、韩江纵队、南路纵队、海南纵队等。为什么国民党只承认我们的东江纵队呢？原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沦陷区，东江纵队深入到港九地区活动，并与英美同盟军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东江纵队的存在。党考虑到党内是统一的，各个纵队的干部和士兵，都可以用东江纵队的名义，撤到北方去。我们就是这样以东江纵队的名义撤到山东烟台解放区去的。1946年6月30日，美国的4艘登陆艇载着我们的干部和士兵以及家属2500多人，从宝安县的沙鱼涌出发，经过5天5夜的水路行程，于1946年7月5日到达烟台。

在美国的登陆艇上，我正好与林锵云司令员同船，因此接近他的机会比较多。他那种慈父式的面孔和谆谆善诱的教导，我至今仍在脑际念念不忘。我们的船，到了太平洋高浪区，风浪越来越大，晕浪的人越来越多，我也逐渐支持不住了。但过了高浪区后，晕浪逐渐消失，以后也就比较适应了。

到达烟台时的情景，十分动人。烟台市前来迎接我们部队的，有胶东地区、军区和烟台市党政军领导和群众万余人。当时军乐民笛高奏，锣鼓鞭炮掌声齐鸣，口号声响彻天际。解放区的老百姓，从码头到市区排着望不尽的长龙，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他们送茶送水，手里拿着鸡蛋、苹果、花生等硬塞进我们的腰包，那种热烈的气氛，我们从未见过，真是感动万分！他们看到我们不少战士赤着脚，不少女战士还挑着炊事工具在行进，也非常感动。认为广东游击战士艰苦战斗，背井离乡到北方来，甚为敬佩，他们呼喊“向广东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习！热烈欢迎劳苦功高的东江纵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到了烟台市芝水区农村的驻地，分配给我们住的房子，是新婚不久的新娘房，使我们十分感动。群众的热情接待，说明当地群众工作做得非常到家，也使我们非常羡慕，都表示要向他们的党政军学习。

我们撤退到北方去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当地活动比较公开的人物。把我们这批干部撤到北方来，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干部免遭国民党的杀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以便为将来解放广东开展工作。党是把我们当做宝贵的财富来看待的。当时我们这批干部编成干部连，我被编在干部连的第三连，连长是穆怀，班长是何子成。

我们7月5日到了烟台市后，烟台市党政军召开盛大的欢迎我们部队胜利到达烟台市的联欢会，同时也是纪念“七一”党的生日纪念会。联欢会的热烈气氛使人久久难忘。我还记得我们部队到了烟台不久，国民党已向我们新四军的解放区开始进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了。党中央选择这个良好的时机，使我们平安地撤到北方来，免遭国民党在船上中途暗算，这是十分有远见的。

（选自《中山党史》1998年第2期）

前山高处指南环

——关于澳门的往事杂忆

□欧初

最近，我又访问了中山、珠海等地，见到许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的老战友。谈到还有一年左右，澳门就要回归祖国，大家都感到由衷的欣庆，多年来我亲历的关于澳门的件件往事不由浮上眼前。

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邓小平、罗荣桓、刘亚楼等首长来广东视察，省委派我陪同他们前往中山、珠海等地，沿途向他们介绍了中山、珠海、澳门一带的历史和现状。当时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50 出头，精力充沛，言不轻发，而听取介绍时专注异常，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陪他在广东视察，此行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到了前山，登上海关三楼，从这里眺望过去，澳门的南环一带山川城郭历历在望，往来行人以及对方的哨兵依稀可见。此时此刻，邓小平总书记、沉稳温和的罗荣桓元帅、英发机敏的刘亚楼上将都没有多说话。80 年代中期，当中英、中葡相继签署联合声明，香港、澳门即将回归之际，我写了一首诗追记此行：

功成相庆主权还，马列常青独创艰。

忆昔邓公曾注望，前山高处指南环。

没人能够断定，“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此时已在这位世纪伟人的脑中发轫。但是这几位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曾率领雄师百万挥军万里的将帅，看到祖国的领土上仍飘着异国的旗帜，站立着异国的士兵，胸中必然荡起不息的波澜。20 年后，当邓小平同志作出那高瞻远瞩的决定之时，这次前山之行所见，想必会闪过他的眼前。多少年来，中国的历代仁人志士，都把收回包括

香港、澳门的全部领土列入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为此付出了前无古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国家强盛，统一国家的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

我是中山人，对澳门这个本来就属同一县治、满街都是中山乡音的城市一直都不陌生，从来将之视为故园之一部，直到现在，我还担任澳门中山同乡联谊会名誉会长。全国抗战初期，广州沦陷，我随家人曾小住澳门。战火之中，家境十分艰难，为了联系抗日团体，我从澳门乘船赴香港，不料因缺 20 元港币而不许上岸。警察不由分说，将我押上囚车，直到日暮时才由同学林家潼君保出。而到 1977 年，我与时任广州市市长梁灵光访问港澳，所受礼遇与昔日相较真有天壤之别。当时的澳督专门设宴招待我们，还向我俩各赠一个以澳督府为背景的纪念品。抚今追昔，令我感慨良多，遂赋长诗《述怀》一首，中有四句：

督府筵开迎上客，杯中忧乐岂杜康。

神州早见人间换，此番访问赖国光。

席中，澳督对我表示敬意，称赞我是抗日英雄。

就我的理解，澳督这番话，并非只是对我个人赞誉，而是对全国抗日战争期间珠江纵队为珠江三角洲和澳门所作贡献的肯定。

珠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珠纵一支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主要在现在的中山、珠海两市，毗邻澳门。自 1943 年起，珠纵一支队的前身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开始在日、伪、顽军环伺的五桂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多次突袭敌人，杀敌除奸，抗日声威不仅震动了中山全县，也在澳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因而澳门算是中立地区。日军并未派兵占领澳门，但澳葡当局受各种势力的挤迫，加上境内经济动荡，治安混乱，走私盛行，日子很不好过。澳门虽为外国强占多年，然而澳门同胞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爱国抗敌之心与内地人民同样炽热，都愿意为驱除日本侵略者出力。全国抗战初期，当地的社团组织十分活跃，广泛发动群众捐款。组成回乡服务团，对珠江地区的抗敌斗争支援很大。

我游击队了解澳门的情势，俟根据地初具规模，我们就先后派郭宁、冯彬、郑秀、黄乐天等同志赴澳门，建立了秘密的办事处，散发游击队的宣传材料、战斗捷报等，动员当地青年参军。逐渐，一批批的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我游击队专门为这些青年开办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参加训练班的澳门青年有20多人，其中有李成俊、赖冠威、郑诚之、刘光普、周宇、卢萍、陈君芝、朱碧、郑汝钿、郑秋、任艳华、李铁、郑兆平、任惠莲、胡兆基等。梁奇达、杨子江和我经常去训练班上课。这些青年从训练班结业之后，有的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有的到班上担任政治战士，负责宣传鼓动工作，还有的成为医护人员。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他们参加游击队之后，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国家民族作出许多贡献。李成俊后来担任澳门日报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我们很注意同各界人士建立广泛的关系，赢得各方的支持。澳门著名的招兰昌医生同我县行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是少年同学，我们利用这一渊源同招医师保持良好的联系。柯平长期在澳门进行爱国活动，在澳门一带威信甚高，他每年到东江游击区向广东区委汇报工作，都取道我五桂山游击区，由我们护送到东江。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先生当时同我虽未谋面，但已经多有往来，何先生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游击队。解放后我们终于见面，何先生见后一直称我为“神交”。20世纪80年代初我重访澳门，还专门到何先生墓前凭吊。从这些爱国人士中，我们逐渐了解到澳门政府和敌伪顽之间的各种矛盾，决定抓住机会，开展对澳葡当局的联络。

1943年底，我根据地内的一个小山村叫石门路，该村有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堂。一个外国人安神父，是从澳门天主教会派来此地传教的，我游击队派人同安神父交谈，了解到他同刘幅超医师是好友，经常有往来。刘医师是一位天主教徒，全国抗战前就从澳门到三乡行医。她思想进步，同情我军，多次义务医治我游击队伤病员。安神父在山区期间，恰逢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亲眼见到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我游击队的好感也大为加深。不久，安神父要回澳门，我决定通过他设法打通同澳门

当局的联系。

我找来同刘帼超医师也很熟悉的郑永晖同志（他后来任谷镇区长），让他护送安神父回澳门，并设法将我写的一封信递交澳葡当局，表示如果日、伪进犯澳门，我军愿予以支援，同时希望他们与我们加强联系，互通情报。我交待郑永晖，这件事对团结国际友人、争取外援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郑永晖即陪安神父到三乡刘帼超医师处。经过说明来意，和刘帼超做安神父的思想工作，安神父表示乐意支持，然后再转道赴澳门。安神父一到澳门，就将我的信转交给澳葡当局。澳门方面由警察局政治部的葡籍慕拉士秘书长出面热情款待郑永晖，对我军极表感谢，并承诺加强联系。郑永晖此行的搭桥目的也就达到了。

此后几个月中，我游击队数次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还多方出击，取得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战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逐步走上轨道，还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多个税站。而澳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伪军、土匪的骚扰，澳葡当局武装力量单薄，难于控制局面。因此，澳方试图取得我方的助力。经过了解，他们找到一位当时旅居澳门的黄槐先生。黄先生原在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任职，在中山、澳门都有一定的声望。他是我一位亲戚的朋友，早年我在中山各地宣传抗日时见过他，算得上是旧交。黄槐通过我们三乡税站传一个口信，说澳门的警厅厅长有事找我。我觉得事关重大，遂即向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汇报请示。指挥部经研究批准我们派人到澳门谈判。于是杨子江同志以我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黄槐的信，略道契阔，并赞扬他同情支持抗日，同时介绍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梅重清同他接洽。8月，梅重清持信到澳门见黄槐，随后由黄出面安排，同澳方代表慕拉士会谈，澳葡当局要求我方配合维护澳门外围治安，打击骚扰澳门的伪军、土匪，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澳方也作出三点承诺：一是同意我方在澳门进行不公开活动，包括发动募捐筹款等；二是同意我方在澳门采购部分物资，包括子弹、药品、通讯器材等；三是同意我方送部分伤病员到澳门就医，慕拉士还专门托梅重清带了3块

游泳表回根据地，其中一块指定送给我。20世纪40年代，游泳表还很少见，战争期间更为难得，澳方可能想藉此表示他们对合作的重视。我收到这3块表之后，全部上交给指挥部了。以后，澳方遵照协议，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我方在澳门募捐，不仅募得捐款，还得到一批急需的药物，澳门镜湖医院救治我方送去的重伤员，还为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

1945年初，有两个澳门人来到凤凰山区。这里就在澳门的外围，我游击队之一部在此活动，番号为“白马队”。那两个人找到我们的部队，自称是澳门政府的人员，直接奉澳督的秘密命令而来，求见谭生队长。一见到谭生，他们就表明来意，当时澳门的治安极乱，抢劫、杀人的案件很多，经查证，多次的作案其实是同一班人，这帮匪徒的头子外号叫“老鼠精”，是香洲人，身有武艺，枪法很好，被“挺三纵队”收罗于羽翼下。他后来投敌，搜集我方的军事情报，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务。他又纠合一帮歹徒，在澳门作奸犯科，专门抢劫当铺、金铺。一旦遇到警察，匪徒即刻开火。他们行踪飘忽，有时在澳门，有时在中山，加之武器精良，令澳门的警察束手无策，直至惊动了澳督，必欲生擒之而后快。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个刻意与我军为敌，又猖狂扰民的汉奸特务应予以坚决打击，何况我们可藉此巩固同澳葡当局的互助关系，遂通知谭生同意澳葡当局的要求，同时要求澳方帮我们捉拿一个名叫郑实的通敌份子，此人平日匿居澳门，一有机会就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不久，我谭生部智擒了“老鼠精”并将其移交给澳门当局派来的探长，澳葡方也如约将郑实交给我们。

澳葡当局对我方的合作十分满意，对我游击队的力量也更有信心。他们派人来五桂山，我在石门的贺屋村接见了客人，他们建议设立电台，加强联络，我们也同意。后因形势变化，此事未成。

在澳门珠江口一带活动的黄公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出任日军驻澳门地区特务机关的首脑，手下纠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在澳门横行霸道，又在海上大肆抢劫，身兼汉奸、特务、匪徒、海盗，澳葡当局对他又恨又怕。1945年8月中，黄公杰一伙被东江纵队海上部队俘虏缴械。此时，我珠纵一支队的部分队伍正在

东江地区活动，东纵遂将黄公杰移交给我们，由梁奇达、杨子江处置。其时我也由珠江过东江，连夜提审了黄公杰，然后由阮洪川将其引渡返澳门伏法。消息传开，在澳门一带引起震动，当地政府民众握手相庆之余，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加敬佩。

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有关的件件往事，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尽管被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多年，澳门人民对祖国的赤心未改，祖国也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抗日战争。而我珠江部队，更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不畏艰险，为使澳门免于战乱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所有这些，都为澳门战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根基。

如今，在“一国两制”的光辉旗帜下，继香港之后，澳门也将回归祖国，中华民族的历史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光辉。可以预见，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统一、稳定、繁荣的中国一定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自《中山党史》1999年第1期）

孙夫人的重托

□罗章有

在敌伪占领中山时期，翠亨村不像其他地方备受日本兵或敌伪的骚扰，据说日本人很敬重孙中山先生，日本天皇手谕凡有孙中山像的地方都不得造次。日本兵即使疯狂烧杀抢掠，凡见到挂有孙中山像的，都乖乖退出。汪精卫的傀儡政府，也尊孙中山为“国父”，所以日本兵和伪军都不敢在翠亨村放肆。我们游击队利用这条件，安排“白皮红心”的人当伪乡长、伪村长，以应付敌伪，危急时到翠亨避风，将军粮或伤病兵藏在村里，得到保护。

虽然日本兵和伪军不骚扰翠亨，但本地的宵小却来滋事。1943年8月的一天，当时住在澳门的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女士给我一封信，信是翠亨伪乡长陆献山转来的。这封信的大意是说：张民有先生（即罗章有），你们的部队抗日，维持乡村治安，据乡人反映，中山纪念中学近来被人破坏，家乡山林被偷伐。拜托你们查办破坏者，一旦查明，给予严惩。

我将这封信交给部队的党委书记、政委谭桂明同志，请示他要怎么办。谭桂明同志十分重视，说一定要组织专人去办理。经过研究，决定由卢少斌和杨维学两人负责调查。他们两人都担任过中队指导员的职务，能够胜任，杨维学同志又是翠亨人，调查情况，有许多有利条件。

卢、杨二人不负组织的委派，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情况水落石出。破坏者是翠亨竹头园村的何帝和，他跟崖口人谭春生、石门人甘润洪沆瀣一气，在乡里做了一连串坏事。

全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山纪念中学迁校澳门上课，原校址的许多设备没有搬走。纪中在翠亨时的用电，是自置发电机发电，水则在它的后山犁头尖山下修筑了水库储水，用铁管引进来作校内的生活用水。学校搬迁去澳门时，发电机搬走了。水笼头和水

管则不动,还有其他笨重的设备如学生宿舍里的碌架床(编者注:双层床)、礼堂里的台凳、讲台等也封存在室内。对这些物资,何帝和生了歹念,先是将数百米铁水管盗光,又把木台凳、碌架床等偷走,还猖狂破坏绿化,将校园和故居的树木成片砍伐。何帝和将到手的铁、木等物资运到崖口,交给谭春生去销赃。何、谭、甘3人还偷运粮食、牲畜出境,走私鸦片或日用品如火水(编者注:煤油)等回内地。总之,这一伙人劣迹多多,臭名昭彰。

情况弄清楚了,我们决定惩处这些坏人。把何帝和的劣迹公诸于众,在纪念中学原址开公审大会,宣布他的罪状,然后枪毙了这个歹徒。以同样的方法,在崖口公审和处决了谭春生和甘润洪。时间约在1943年9月中下旬。铲除了这些害人虫,人心大快。

我们严惩了破坏者,便回信给卢慕贞女士,告诉她所托办的事情处理的结果,并且建议在翠亨建立治安队,来维持乡村的秩序。其实就是想建立我们的民兵组织,只不过公开不能叫民兵,便使用治安队的名义。这支队伍成立了,由杨维学担任队长,因他是翠亨人,服务乡梓,名正言顺。队员只有四五个人,其中有清末被称为反清“四大寇”之一的陆皓东先生的孙子陆玉良。

复信送达卢慕贞女士,她很高兴,并以口信传回说:你们工作负责,严惩了破坏者,又设法维持治安,十分感谢。

(选自《中山党史》1998年第3期)

一段难忘的经历

□梁田

我是中山大学体育系的学生，1949年春来到五桂山，所遇到的诸多事情及所受的教育真使我一生受用无穷。

在中大时，我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1949年5月，地下学联安排我到中山游击队。我撤出广州后，是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中山的。联系暗号是“一帆”。当时香港的住宿十分困难，只有投亲靠友。我找到舅舅家，向舅舅说我快大学毕业了，是来香港找工作的。一天上午，“一帆”通知我下午就出发。由于时间紧迫，还没来得及等舅舅下班回家向他道别就走了，以后又一直没法给他音信，使他很不高兴。舅舅是不明白个中原因的，因此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近人情，找到工作也不用这么急着走，应该向他道别才走。最遗憾的还是一直到他离开人世，我还没机会亲自向他道歉。

当天下午，我从香港乘船到了澳门，到澳门后住在海边渔村一茅棚里。在一个黑夜里，钟大叔带领我们7名知识分子上了一艘渔船，这时我已换上一套唐装黑衣裤，打扮得像渔民那样。我们藏身的地方原是个盛活鱼的鱼舱，7个人塞在那里，空气又不好，很是难受。特别是过检查站时，渔船上的渔民特别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动，要镇静，更不能说话。当检查站的国民党兵问渔民舱里装的都是什么？我们在舱里也隐约听到渔民的回答：“里面盛的都是鱼。”既心慌，又想笑，但又不能笑。后来渔民递了一包塞满了钱的“烟”给检查的人疏通疏通，我们的渔船才过了这一关，又能开航前进。快到天亮时，我们到达中山县的凤凰山。在凤凰山接我们的是容文达。见面时，钟大叔说：“将7瓶墨水交给你啦！”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代号是“墨水”。

我们跟着容文达走了一整天山路。天色渐晚，我们经过一道

国民党的封锁线，容文达机智地带领我们抄小路安全通过了。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从未走过这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容文达就沿途教我们唱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达坂城的姑娘》，这是有名的民族作曲家王洛宾的名作。此民歌十分流行，容文达教我们的，是填上了新的革命歌词的，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仍记忆犹新。歌词是：“五桂山的同志，枪法准啊！饼干（用饼干罐制作的土地雷）大又硬啊，个度（那里）有个敌人又蠢又笨呀，两个眼睛合眼训（打瞌睡）呀！佢哋（他们）要‘扫荡’，我哋个的（我们那些）好汉，一定要佢瓜老衬（他见阎王）呀！带埋（着）佢的机枪，带埋佢的子弹来投降送给我们。”这个民歌变成鼓舞我们革命士气的歌曲。一路上容文达还跟我们讲述很多当地革命斗争的故事，使我们都忘却了疲劳，拼命地跟他走。入夜，我们在一村民家吃晚饭。我满以为今晚就在这里住宿了，岂料晚饭后休息一会，容文达又领着我们这7个已经十分疲乏的知识分子继续赶路。漆黑中我们走进了一个山坳，在这隐蔽的地方，有一个小草棚，正好能容下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就挤在那里过了一夜。虽然条件很差，又闷又热，因为走了一天山路，实在太累了，大家都睡得很熟。第二天清早起来，再走了不很长的山路，就到达崧埔村中山特派室所在地。在这里经过学习，我和李成留在南京队当文化教员，其余的分回白区去开展群众工作。

南京队是中山特派室的警卫连，我们的驻地是一户较大的华侨房子。房主只有一老一少，都是女的，其他人都在海外。房子空余的地方较多，房子的2楼铺了地板。我们到南京队的第一天晚上，队长缪显（连长）就领我和李成到2楼的一个房间去睡觉。房子是空空的，除了地板什么也没有。我最初感到很奇怪，心想：“怎么没有床铺？怎么睡？”其实，这木地板已是这里最高级的睡床了，在游击队里，这算是条件最好的了。这还是在没有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才能安稳地在这硬地板上睡上一个好觉，假如有情况（敌人有活动），就要半夜上山（在山上居高临下，打起仗来有利），在山地上铺上蓑衣来睡。为免被露水打湿脸，就用竹笠盖着头部。有些山头有水泥地的坟墓，就照顾特派室的领导及

女同志，因水泥地平滑又没泥地那么潮湿，我们竟乐观地称这些坟墓是宾馆。同志们还常和我开玩笑，问我夜夜与鬼睡，怕不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有什么可怕呢？

我们在城里喝的都是开水，可在游击队是喝不上开水的，只能喝山坑里未煮过的坑水。开始还是怕喝了生病的，经过思想斗争，心想同志们都是这样喝了，别人能适应，我也应该适应。喝水这一关也算过了。

夜里走路的关是怎么过的呢？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武工队基本上是夜行军。漆黑中不准打电筒，怕有光会暴露。怎么走？老同志凭经验教导我们：“黑泥白石光是水”，这是他们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我就跟着实践。实在太黑了，就每人臂上扎上一白毛巾，隐约跟随着前面的白点前进。渐渐地开始适应了，就越来越少摔跤或是踩得满脚是水了。

在部队里，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事事都感到新鲜，最大的锻炼要算是打仗了。我是文化教员，不算是战斗员，但遇到战斗时，也得随队伍到战场，做力所能及的事，因此受的教育实在不少。

一次战斗是在凌晨，敌人在一山头，我们在另一山头。我们在山顶下不好走的路上前进。我因缺乏军事常识，觉得山顶有较平整好走的路，竟自作聪明地爬上山顶的好路走，刚上到顶上，敌人的子弹就打过来，同志们赶快将我拉下来，并警告我，这是最危险的，这是给了敌人作为攻击的靶子，且暴露了整个队伍的行动。山顶的好路是叫山的“陵线顶”，在战斗中是上不得的。这真是给我上了极深刻的一课。

一次，我们整个南京队和特派室的同志被敌人围困在一个与地面成70度很陡的山头上，一整天没东西下肚，饿极了。黄昏，村民冒险将饭挑上山头，我们手上只有枪和子弹等武器，什么碗筷、匙勺等吃饭用的东西根本没有，只得用手将白米饭捏成饭团，像吃馒头那样将饭团咬来吃，以充实肚子，更说不上有什么菜了，真有意思。

崖口战斗这一仗，华炳、炳添牺牲了，张炳也受了伤。在战斗前一天，炳添在行军时不小心被树枝勾破了裤子，他要我替他

补，当天我将裤子补好还未来得及送还给他，第二天的战斗，他就牺牲了。战斗就是这样残酷的。

马溪战斗中麦红军和芝麻康受了伤，都是伤了脚，走不了。麦红军个子中等，芝麻康却是个大个子，因他个子特大，倒反叫他芝麻。他们由卫生院许裳、事务长及我3人轮流背着撤退。那时走的是山路，崎岖不平，还要穿田径过水沟，因为情况危急，背着一百几十斤的大个子，我们3个人即使累极了也不敢歇一歇。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我能安全撤离，伤员也一定能安全撤离。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我产生了平时极难产生的力量，完成了背伤员撤出战场转移到安全地方的任务。当听到村民说“细佬女（当时我的绰号）这里安全了”的时候，我再也背不动了。此时的我，满身都沾满了伤员的血。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解放后，我搞回我的专业体育。在和平年代里，也遇到不少困难，但想起游击队里的生活，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游击队这段经历对我打下深深的烙印，真是一生受用无穷。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2期）

从两次抗击敌军看两谢的指挥艺术

□罗章有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派到珠江三角洲的“抗大”三分校大队政治委员谢立全和大队长谢斌，在领导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整个全国抗战期间，我们在珠三角敌后战场与敌人打了那么多的仗，最厉害的，要算是1941年10月22日粉碎日军对顺德西海的“扫荡”和1944年7月4日在五桂山粉碎敌人的“四路围攻”这两场战斗。这两场战斗是真正的硬仗，都是日军报复性的进攻，出动的全部是具有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可谓武装到了牙齿，远道奔袭，来势凶猛。而我们的指挥员谢立全和谢斌镇定自若，沉着应对，我们的游击队员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奋力拼搏。顺德西海的地形地貌特点是水网和青纱帐，敌人出动海陆空军，在西海口有3艘炮舰，有飞机，有大炮，配合掩护陆军进攻。谢立全运用的灵活战术，以少胜多，大量杀伤敌人，保存了实力，保护了群众。中山五桂山是山地，日军出动步兵和骑兵进行强攻，谢斌也是运用灵活的战术，重创了敌人，保卫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保护了几个训练班。这次作战基本没动用逸仙队的主力，主要靠我们义勇大队力量去狙击。这是两场硬仗，两谢指挥这两次战斗运用的战术十分成功，都是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消灭我们主力的企图。在纪念珠江纵队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这两次战斗和两谢娴熟地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对我们很有启发。

1941年秋，敌人对广游二支队的活动及其发展壮大极为震惊，为维护其在番顺地区的统治和广州外围各军事要点的安全，伪第二十师副师长兼四十旅旅长李辅群调集2000余人进攻西海，妄图消灭广游二支队，结果遭到彻底的失败，我军大获全胜。这

就是著名的“西海大捷”。

5天后，日军出动1000多兵力，乘坐30艘铁拖船，在炮兵和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前来报复进攻。5天前的“西海大捷”打的是伪军。这次来的全是日军。这时，训练班有一部分学员已调出了，指导员邝任生调到另一个中队当指导员，马启贤去了独一中当指导员，杨日韶调到欧初那个中队，陈胜到独一中，剩下的由冯扬武带领着，与村里的民兵联合起来负责阻击任务，组成5个战斗小组：一组由戴耀带队，组员梁德（顺德人，村民兵队长）；二组由村支部书记杨森带队，队员有我、何柱、何基光；三组有肖杰华；四组有冯扬武；五组人员名字忘记了。西海涌有30米宽，我们在涌的两岸把守，马启贤率领的独一中守西海，训练班和民兵守路尾围，守路尾围的5个小组是这样分工的：二、三小组分守在路尾围的南北入口处抵挡来敌，其余3组作掩护。

各小组枕戈待旦，准备阻击来犯之敌。日军从紫坭方向疾速而至，由西沙角登陆后，沿着路尾围与界河涌边堤围前进，集中兵力直向闸头的北炮楼冲锋。敌人来了！我把守的路尾围村北炮楼，首当其冲。谢立全下令要坚守阵地，我当时只有一条塍鸡工厂土造的七九、几十发子弹和4个手榴弹，与其他3位组员在碉楼上，看着敌人经过十字涌，绕过塘南，慢慢地匍匐而至。待敌人接近时才射击。敌人立即以数挺轻重机枪向炮楼发起猛烈扫射，我们顽强地坚守了1个多小时。敌人见久攻不下，便在炮楼周围堆满稻草和甘蔗叶，浇上汽油，放火焚烧炮楼。这时弹药快没了，为保存实力，杨森带着何柱、何基光两名战士撤退，我留在楼上坚守掩护。可杨森等撤至楼下时，大火已封住了大门，无法冲出去，3人在烈火中壮烈牺牲。我一直坚持至子弹全部打光，估计杨等已撤出，就从炮楼顶往下跳，不想脚板正好落在厨房顶上的梁角，锐利的梁角刺穿了我的脚板。然而情况危急。我强忍着刺骨的疼痛，猛地用力把脚拔出，也顾不上脚板鲜血直流了，立即跳进河里。因此，战友们给我取了个花号叫“飞将军”。幸而我懂水性，便泅水回对岸向谢立全汇报。上岸时曾碰见马启贤，还与他打了个招呼，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下午他就牺牲了。那天还有第四

组在横岸岗，与强大的敌人交锋了一会儿之后就撤退了。正如谢立全所料的，接近中午时分，日军集中兵力转向石尾岗方向发动猛烈进攻，石尾岗的吴声涛、梁国僚他们利用地形地物分散作战，坚守阵地，打退敌人10多次冲锋。在危急关头，谢立全调来两挺机枪在离横岸200米处的庙楼火力增援，日军头目中弹倒下，日军士兵也从半山腰滚下山坡。战斗从早晨5时一直打至下午，敌人强攻10个小时仍未能占领横岸岗。由路尾围南炮楼到横岸岗、石尾岗，路长不到4公里，日军却打了整整一天，而我们主力仍保存。后来，虽然敌人从西海之北攻入了村中，但在战斗前，我们已帮助村民坚壁清野和疏散群众。因此，敌人进村后一无所获，歇斯底里地放火烧了一些民房，至傍晚时分，悻悻撤离。

是役体现了指挥员谢立全面对强大的敌人，指挥自如，积极防御，机动灵活，在战术上“以一当十”，敢于斗争，沉着坚决地抵御了敌人对西海的“扫荡”。广游二支队300多战士用陈旧的武器抵抗数倍拥有精良武器之敌，虽然我们牺牲了杨森、马启贤等12人，但毙伤日军30多人，保卫了西海这片土地和百姓的安全。

粉碎敌人对中山五桂山的“四路围攻”也是一次成功的战例，打破了敌人企图消灭我们主力的幻想。谢斌采用的战术是“蛇脱壳”，慎重对待，稳打稳扎，是以少胜多的又一成功战例。

1944年1月31日，日、伪军对中山五桂山区进行“十路围攻”的阴谋被我部队彻底粉碎后，唐家、西桲等地的伪军又接二连三地受到我部队的袭击。7月1日，我部队又在五桂山外围的乌头山歼灭日军一个汽车通讯班。考虑敌人必然会来报复，而且大规模“扫荡”的可能性很大。当时，省军政委员会的连贯和指挥部的几位领导正聚集在灯笼坑开会，传达省军政委员会会议精神，正在开办的党、政、军、青年、妇女、卫生6个训练班也在那里。于是指挥部和6个训练班于7月3日全部转移至石门九堡。

果然，敌人加紧调兵围攻我们，并且从广州、江门、肇庆等地调来各兵种1000多人，配备战马100多匹，山炮6门。敌人很快就知道我们转移的情况，7月3日晚11时，指挥部接到石

岐情报站送来的情报：晚6时，敌人已到达石岐天字码头集中，由一个大佐指挥，从石岐出发，分四路围攻我五桂山区：一路从南朗、翠亨至石门，这路是主攻，集中主要兵力和炮火，企图消灭游击队主力和指挥部；一路从长命水入山区；一路由深湾二门铲直入黄茅坪；一路经旗岭后山占领制高点。后三路是佯攻，主要是监视和切断我部队退路。

当时，我和欧初住石门贺屋，指挥部在田心。谢斌叫欧初和我到田心村指挥部研究情况，布置战斗。“敌人很疲劳，从江门、肇庆、广州到达石岐天字码头，马上吃饭，饭后就出发向东路走，7时已出到华陀庙了。”我们接到这个情报时，已是深夜1时了。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谢斌下令义勇大队全力狙击敌人，逸仙大队主力负责保护领导机关和几个训练班，特别是区委书记训练班。我们希望指挥部拿出两个中队来支援我们。但谢斌说，不行，一个也不给，要靠你们自己的力量。谢斌命令我们一定要死守，司令部没有多余力量支持。考虑到义勇大队的兵力有限，且只有3挺轻机、1个掷弹筒，我们再向谢斌要求安排在这里学习的连排训练班和班排训练班参加这次狙击。谢斌同意了。这两个班的学员是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属下各大队派来学习的连排班干部，连排训练班共20多人，由郭彪带队，班排训练班也是20多人，由杨社带队。我们义勇大队有仲凯队3个排60人左右，黄蜂队（即石门民兵基干队）约17人。4个队合起来共100多人，分成4个狙击组。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指挥部确定的作战的方针是：全力阻击敌人，确保指挥部和训练班人员的安全。怎样才能有效地阻击敌人，大量杀伤敌人，保存自己呢？我们的部署是：一、采用麻雀战、游击战，抢占制高点，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分层次阻击敌人，有效地牵制和杀伤敌人，确保指挥部和训练班人员的安全；二、驻石门部队除指挥部、机关非战斗人员和4个训练班外，作战部队有民族队、雄狮队、仲凯队、黄蜂队和连排干部训练班、班排干部训练班。因此，由主力民族队和雄狮队两个作战单位保护指挥部和4个训练班，由仲凯队、黄蜂队和连排干部训练班、

班排干部训练班分别抢占4个制高点，负责阻击敌人。具体分工是：两个主力中队守在旗岭山对面的五桂山峰第四个峰，民族队负责保护指挥部机关非战斗人员和4个训练班转移，要在敌人进攻前占领五桂山最高的第五个山峰。雄狮队随指挥部占领第四个山峰，作预备队。仲凯队抽一个班，组成两个麻雀小组，第一组在迳仔壟村边山路伏击敌人，放了枪就跑。第二组在石门社公庙伏击，也是放了枪就跑，目的是拖延敌人前进的时间。我、唐仕锋带领仲凯队的两个排，集中较强兵力，配有机枪3挺、掷弹筒2具，利用我们占领的有利地形张蟒蜞后山为第一个制高点，专打敌人的前卫连，杀伤敌人，阻击敌人向指挥部和训练班追击。郭彪带领连排干部训练班（麒麟队）占领五桂山口龙舟地后山为第二个阻击点。杨社、黄芝带领班排干部训练班占领五桂山第一个山峰为第三个阻击点。由欧初、卢少彬带领黄蜂队和仲凯队的一个排占领五桂山第三个峰为第四个阻击点。这样，游击队就基本控制了制高点，占据了有利的地势。

翌日凌晨2时，石岐送来第二次情报，敌人已离开石岐，由东路向我袭击。紧接着东樞情报站又送来情报，敌人已到了东樞，向南朗方向进发。凌晨3时多，又一个情报到了：敌人已经到大车了，估计凌晨4时会到达翠亨。谢斌命令我们立即登山。不到5时，一夜急行军的敌人到了孙中山故居前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道，休息、吃饭，吵吵嚷嚷的。过去从石门到翠亨是没有大路的，只有一条山边路。由田心到龙舟地，必经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我们派了一个麻雀战小组打骚扰，埋伏在新村的山头，待其行军至迳仔壟新村（即现中山纪念中学学生宿舍处），集中放了几排冷枪就撤退归队。敌人前进有阻，立即散开搜索，见无动静，才又集中前进。待敌人沿着那条单边路走至大社公（杨屋、贺屋与后门坑书房坳交接处，即现石门会堂旁），过了乌鸦地，还没到练屋前，我们一个班有六七个人，又向敌人的搜索班扫了一轮子弹，就立即从贺屋后山上山，归队。敌人又停下来搜索一轮。从翠亨村到石门，本来只需1个小时，敌人却走了近4个小时，直至7时多，才接近张蟒蜞。我们拖延敌人时间的目的达到了。

我带着仲凯队的两个排占领了第一制高点张蟒蜞后山，当敌人前卫排由一个少佐带领着进入游击队的伏击圈时，我们先放过敌人的搜索班，集中力量打其大队伍。因是单边田基路，敌人行进时，队形暴露在我们有效射程内。我即令步枪、机枪齐发，一下子杀死杀伤敌人 10 多人。敌见受阻，不敢贸然前进，全部撤往沟边，退回张蟒蜞村边的竹林里。我们即集中 3 挺机枪、2 具掷弹筒，向着竹林猛烈射击。结果，敌前卫排包括少佐指挥官在内全部死伤在竹林里。敌人又花了两个小时重新布置，组织进攻，除正面向张蟒蜞后山进攻外，还左右包围，占领了张蟒蜞后山北面的制高点，在贺屋后山布置重机枪和山炮阵地，并配备特种射击班，从右边抢占剑首山，两面封锁游击队出山口的退路和防止游击队从右边突围。与此同时，留下几个日军将阵亡的同伴尸体用火焚烧。石门村村民豹狸仔的父亲就目睹了这一场面。这是“四路围攻”当天日军的第一个焚尸场。那天，日军一共设了 3 个烧尸点。其余两个是龙舟地和旗岭，在龙舟地打死的，就在龙舟地烧，在五桂山顶打死的，就运到旗岭烧。

从正面进攻的敌人，以数百兵力的优势进行强攻。100 多匹马起不了作用，就用炮、重机枪集中打。他们在贺屋禾坪岗布置 4 门山炮，这 4 门炮就设置在现在的逸仙水库前面山仔处，连轰数十发炮弹后，接着就用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猛烈向我阵地射击，并从左、右两边以火力配合夹攻。可是在山地，不仅敌人的骑兵发挥不了作用，他们的山炮也没办法击中我们。因为山炮是平射的，打碉堡好用，在山地就发挥不了作用。他的炮弹也有打到了我们阵地的，但没什么杀伤力。因此，只有靠步兵拼死冲锋。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个一个地打。由早上 7 时战斗到 10 时，经过激烈的火力较量，游击队以地理优势和顽强的斗志打退了敌人的 3 次进攻，大量杀伤敌人。此时，有些敌人距离我阵地只有六七十米，最近的甚至是三四十米。我们估计指挥部领导和训练班人员已撤到安全地带，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决定分批转移阵地，有计划地撤退。我带一个排先撤上山占领制高点，掩护另一个排撤退。可当我们一撤至北边山坳，就被敌人发现了，日军

立即向我们猛烈扫射。仲凯队队长唐仕锋带领甘生排撤退时，也遭到左侧敌人的射击。这时，敌人特种射手集中火力切断了我们这段退路。而我们的队伍又在山坳下面，望不着敌人，发挥不了火力作用。日军特种射手很厉害，枪法很准，班长卢炳跑步通过山棱线时，被子弹打断了脚骨，滚下山，几天后才找回。中队长唐仕锋在指挥队伍向敌左侧制高点还击时刚露出半个头，即被日军特种射手一枪击中额头，当场牺牲。甘生立即带领全排战士还击，并组织安全撤退。战斗了近5个小时，我们撤到张蟛蜆的山顶。指挥部和4个训练班也安全撤至第一个高峰。我们这个队武器很落后，只能一个个打，敌人太多，三四百人从正面冲锋，我们一直等到敌人离我们三四十公尺，才往第四个阻击点撤退。后来，我们也转移到了欧初那里，与他汇合，力量骤增。

敌人依靠人数和火力的优势，向连排干部训练班所占的第二个阻击点龙舟地后山发起攻击，一开始就打了几十发山炮，继而以步兵从左、右和正面三面强攻。日敌纵然有300多人，但该山头海拔约230米，坡度约80°，很陡，只能爬行。游击队居高临下，敌人爬上一个，我们就打一个，一连打死敌方20多人，直到敌人接近阵地时，我们才转移阵地。战斗了3个多小时，游击队无一伤亡，那时已是下午1时半左右。当连排干部训练班由第二个阻击阵地转移后约20分钟，敌人又组织力量向第三个阻击点发起进攻。这里地形开阔，敌人分10多路，齐头并进向游击队直冲过来。那天上午，敌人攻打我们第一个阻击点时，天晴，看得清楚，因此我那个队伤亡很少。敌人攻打我们的第二个阻击点时，也是天晴，郭彪的队伍没有一个伤亡。可敌人开始进攻第三个点时，大雨滂沱，黑沉沉，能见度很低，当敌人冲至只有30米时才隐约可见，战斗队员立即猛烈还击，先后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杨社带队的这支队伍全是班排干部骨干，都是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他们打得非常顽强，非常惨烈。尽管天气恶劣，战士们又大半天没有东西下肚，然而战士们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斗志特别顽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始终未能越雷池半步。而这次敌人是为了报复而战的，也打得特别凶狠，一次

又一次地疯狂反扑。由于当时正下着大雨，目标模糊，互相对峙也射不准确。最后，敌人冲到了阵地前，我们的战士就勇敢地与日军肉搏。结果虽然日敌死伤数十人，但我们部队也有伤亡，指导员黄芝右手被打断，班排干部牺牲8人，重伤几个，22个人剩下六七个人。队长杨社一直打到子弹没了，才顺着地势翻滚下山，回去汇报。

这时，另一路增援敌军赶到旗岭后山占领了制高点。顿时，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在这危急关头，指挥部直属的预备队雄狮队及时赶到，从旗岭后山两侧夹攻日军。此时，负责主攻的指战员们越战越勇，在雄狮队的配合下，一鼓作气把日军打得招架不住，死伤的不少。快接近下午4时，天放晴了，互相都能看到了，老虎窝、旗岭仍有敌人在搜索，我们被夹在中间，立即又驳火一轮。原以为敌人会继续组织冲锋，因为他已占领了老虎窝，又占领了旗岭，肯定会夹击我们的，岂料却没了动静。此时已是下午4时半，天色开始转暗了。估计敌人因连续两天的舟车劳顿和急行军，长线运动，加上被我们的小部队狙击，打了一天才攻了几个山头，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不敢恋战，不得不抬着尸体撤离。其余两路日军也因被我指挥部派出的游击小组在大寮、槟榔山采用地雷战、麻雀战所阻击，寸步难行，只好连夜撤出山区。

这场山地战斗，采用骚扰战加阻击战，我们的目的是阻延敌人前进，我们只有100多兵力，应付1000多敌人的主力，敌人采取两头夹击，一边是张蟒琪山、剑首山和箭竹山脉的一个峰，一边是占领了旗岭山顶，夹着我们打。我们守在山上，老虎窝山顶、旗岭山顶与五桂山山顶基本平衡，中间是一条深坑，约200公尺，都是在射程范围内，枪能打到对面，敌方不能过来，我们也不能过去。敌人两边合围都合围不了，因为敌人的兵力分散。我们以两个中队加一个排，采取蛇脱壳的办法，分层阻击，有效地把敌人拖住了。这次打得可谓惨烈，从早晨5时打到下午4时半，一直打到五桂山顶，虽然我们牺牲了1个中队长，14个班排干部，但保卫家园、打败侵略者、为战友报仇的意志却越来越坚定。而伤亡惨重的敌人因十分疲惫，加上天色转暗，狼狈败退。这次战

役是中山打击日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粉碎了敌人妄想消灭我指挥部和主力的企图；我们既保护了指挥机构和全部训练班人员的安全，又赢得了时间。

两谢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地形，一是平原战，一是山地战，指挥作战所用的战术都是采取以少胜多的战术，很成功，体现了谢立全的灵和谢斌的稳。西海战斗和五桂山战斗敌人都达不到消灭我们主力的目的，反而自己死伤累累。通过对两谢所指挥的两次抗击日军的战斗的回忆，更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理。的确，我们珠江三角洲的游击战士，从敢于打仗到善于打仗，与谢立全、谢斌两位领导分不开。他们的军事才能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进修游击战

□罗章有

为了全面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培养骨干，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以下简称中心县委）在顺德北滘、西海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林锵云同志当时任中心县委武装部长，谢立全同志协助他管武装，当干部训练班的班主任。干训班分两个学习组，番顺组由马启贤、梁流任组长，成员有戴耀、陈胜等。杨日韶任中山组组长，成员有赵明、陈楚、郑吉、肖杰华（梁德）和我，学习时间从1941年5月至10月。到干训班讲课的都是中心县委的同志，罗范群同志讲苏联十月革命斗争，马列主义在苏联的成功经验，讲共产党史，其中包括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长征的意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等。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感到很新鲜。

林锵云同志讲党的统一战线的目的、内容、政策和策略，其内容包括：要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队伍，壮大抗日力量；现在中国抗日的情况很复杂，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像汪精卫那样的投降派，要揭露、要打击。国民党内部有抗战派，有顽固的反动派，要具体分析，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还举例说明：西海地方土绅实力派梁敬，受土匪抢掠，又怕日、伪势力大，不敢反抗。经过我们几次说理斗争，又打又拉，终于争取他同意和我们共同合力抗击汉奸，取得击败当地日、伪司令李壘鸡的胜利。

谢立全同志讲毛主席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包括要发动人民战争，首先要爱护人民，保护群众的利益。打击日、伪，肃清汉奸，是群众最大的利益。你坚决抗日，人民才拥护你、支持你。部队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大打人民战争是最大的策略；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要根据敌强我弱，敌人装备精良

等特点，善于打运动战、麻雀战、骚扰战、阻击战、夜袭战、伏击战，要运用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根据珠江三角洲河涌、水网多的具体情况，哪种打法对自己有利，就采用哪种方法。

刘向东同志讲部队的政治工作，严尚民同志讲组织史。

在干训班上，大家系统学习了理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认识。特别是在学习期间，还组织我们参加与刘登的谈判和在西海反击日军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理论联系实际，认识特别深刻。

吴勤同志领导的广游二支队有10多个大队，只有独一中队才是主力，其余多是收编的土匪队伍。其中刘登大队经过改造，派了冯扬武、肖强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去，分别担任副大队长、中队长、指导员，活动在中山、斗门一带。开始时，刘登是听话的，后来他与南海伪县长勾结，伪县长答应给他粮饷、编制、高官，引诱他叛变。中心县委知道后，便直接指挥这个大队。刘登发火，找吴勤理论。中心县委认为必须加强力量，派谢立全同志帮助吴勤跟他谈判。行前做好准备，组织一个加强班随行。我和陈胜都在列，给我们配备了两支枪。谈判地点在顺德碧江（今碧桂路）。谈判开始，双方的警卫都严阵以待。吴勤同志严正表明态度：要么就留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要么就自立门户，除名出去。刘登看到大势已去，只好灰溜溜自立门户去了。我们将他两个大队拉了过来，有6挺轻机枪、1挺重机枪。

这一年10月17日，发生了震惊敌伪的“西海大捷”。在中心县委领导下，歼灭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和伪护沙总队，击毙敌前线代理总指挥、副团长祁宝林及下属官兵200余人，俘虏100多人，还有百余人逃命时溺死河中，缴获枪械一大批。

10月22日，日军一个联队1000人，在炮兵和3架飞机配合下，从广州坐炮艇分三路向西海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扫荡”。我指挥部半夜获得情报，立即做了迎敌部署。除主力部队作了周密安排外，还将干训班的学员与当地民兵混合编队，分五个组，分段阻击敌军，主力部队则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第二组有民兵党支部书记杨森、两个民兵和我共4个人，占领北炮楼守第二线。谢

立全同志凌晨2点多到达，向我们布置任务，要求死守阵地。天刚蒙蒙亮，敌人登陆并向我们射击。我们组凭着4支步枪、几个手榴弹，坚守炮楼，此时，日军一个排的搜索兵冲过来，我们掷出3个手榴弹，炸倒四五个日本兵，其余的不再前进。我们居高临下，见一个打一个，不让敌人靠近此炮楼。敌人调来轻机枪向我们扫射，但无济于事，又调来重机枪，一梭子连发50发，那炮楼虽是3层砖墙，也难以承受，楼顶被打塌，而且火力集中打炮楼的射击孔，打的炮楼内碎砖横飞，烟尘滚滚，不能再向外射击。我便和杨森商量撤退，杨森带着两个民兵下楼，我做掩护，继续射击敌人。打了10多分钟，估计杨森他们已经冲出去了，我的枪托也被打散了。此时，炮楼门口已经被敌机枪封锁住，我便从旁边离地约6米的厨房顶跳下去，不幸一只脚插在桁桷的铁钉上，我迅速拔出铁钉再往下跳，游过对岸后，立即找到谢立全同志，将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后来才知道，杨森等3位同志冲不出去，被围困在炮楼下，最后壮烈牺牲了。

经过半年时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我们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学习，思想、工作能力和作战技术都有了新的提高，并为后来在战争中加强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下列三方面，体会更加深刻：

（1）奋斗目标更加明确，对共产党的信仰更加坚定，增强了对抗日战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2）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必须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日行列，争取广大群众对部队的支持。我们所想的、所做的一切，都要着眼于是否对人民群众有利，这样，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3）对毛主席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印象也特别深刻，要善于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运用，才能提高我们的水平，取得斗争的胜利。

训练班结束后，我被调到中山九区牛角，在主力中队当排长，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

（选自《中山党史》1998年第2期）

通讯兵在五桂山

□ 伦永谦 青山 黄梅

1943年，在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珠江三角洲及中区抗日武装斗争迅速发展，指挥部从禺南转到中山五桂山后，部队日益壮大，开创了新局面。遵照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遣派主力武装开辟云雾山区抗日根据地，并决定从东江纵队电台派出参加第一期报务培训班的吴文辉、李子芬（他们2人是中山派去培训的）、余绿波3位学员，以及伦觉（伦永谦）等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建立电台。伦永谦等到达中区纵队后，首要的任务是建立电台，准备随队伍挺进粤中。

伦永谦第一个到达五桂山区，其主要任务是与东纵司令部总台联系，并抄收延安新华社新闻电报，供部队领导参考。伦永谦到达时准备装机建立电台，当时想从部队缴获的战利品——收音机中取其零件装收发报机，可是打开机器一看，全是采用交流电，部队经常流动，且无电源，不适合游击队使用。没有建台的通信器材怎么办？于是领导决定派伦永谦前往澳门购买。

从五桂山区去澳门，需要经过日军岗哨严格检查，非常困难。要采取秘密行动，伦永谦只好化装成一个商人，由一位女交通员带着走出山区，越过平原，搭上自行车，经过日、伪军层层关卡盘问，终于抵达澳门。在澳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支持下，购买了建台之零配件，并多准备了一些备用配件。当他完成任务后，领导指派了武装在澳门边境处接运护送回五桂山。

伦永谦被任命为电台台长，吴文辉为指导员（兼电台机务工作）。买回了零件，伦永谦与吴文辉两人紧张地装配收发报机，装好机后，余绿波和李子芬也从东江纵队调来五桂山电台。由于形势发展需要，又从部队及地方党组织挑选了一些同志到电台学习和工作：有张健、曹水、杨铭、汤建平、黄磊等人。这些同志

都是经过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认真审查才到电台学习的。此时成立了学员班和摇机班。学员班除了要学习报务外，还要给摇机班的同志上政治课和文化课。摇机班的同志文化水平低些，但都是从连队中挑选表现比较好的同志来担任，需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进步。电台建起来后一共有 17 人之多。

1944 年 10 月在五桂山槟榔山一个华侨住宅楼下的一间房子里，架设好天线，收、发报机开始进行工作了。第一次就收到从革命圣地——延安新华社用非常清晰而又漂亮的手法发出的电讯新闻，我们将这些电讯新闻及时送给领导，从此我们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电台的任务主要是建立联络电台和新闻台，联络台与广东军政委员会联络，新闻台主要抄收新华社电讯。现在新闻台建立起来，联络台工作遇到困难，由吴文辉组装的发报机由于天线和发射机输出的部分不匹配，我们只能听到东江电台呼叫讯号，但东江电台却听不到我们的讯号。有一次，东江回答：已听到。后来我们日夜抓紧试验发射机呼叫“东江”……

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区纵队一部分部队要挺进粤中，开辟新的根据地，至此，初生的电台也跟随部队离开五桂山，接受新的任务。

（选自《中山党史》2005 年第 1—2 期）

流星之歌

□孙烈 陈大征

深深的怀念

五桂山，流星队是在这里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几十年过去了，但留给我们的仍然是深深的怀念，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次次战斗的场面，一支支雄壮的战歌，把我们带回当年的日子。

由于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领导下，组织了我们的这支政工队——流星队。1945年1月，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成立时，流星队又编入第一支队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

当年的流星队是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伍，可谓“个个都是十八廿二”，最年少的是16岁。这支队伍人数不多，但任务不少，既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又要进行自我教育，接受锻炼。队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大后方来的大学生，也有港澳回来的爱国青年，有大城市的姑娘们，亦有个别从敌伪队伍中起义过来的小伙子，而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中山儿女，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入了抗日的伟大洪流。这支小队伍，大多数人是初次过战斗生活的，所以有的人在练习射击时，双手老是在发抖；有的人站岗放哨时还怕黑，怕狗叫，怕山上各种虫鸣声；有的人夜行军时，老是摔跤，打着赤脚更是走不动。但领导和老战士对我们万般爱护和关怀，手把手教我们用枪，给我们鼓励。走夜路时，他们教我们背熟一个口诀：“黑泥、白石、光水氹”。我们掌握了要领，不仅能跟上队伍前进，还可以在夜行军中做宣传鼓动工作，边走边念快板：“同志们呀，快快走，走了五里又五里，走过这个山坡就到目的地，有胆识，有勇气，我们就胜利！”

流星队多半时间活跃在槟榔山、石门、灯笼坑、长江、大寮一带的山区，部队每打一次胜仗，我们就作一次大的宣传活动，

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包括活报剧、小品、小话剧、小歌剧等等，宣传战斗胜利，宣传拥军爱民，歌颂战斗英雄，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特别是演唱《朱大嫂送鸡蛋》《游击队之歌》《杜鹃花》《参军》《打得好》《南泥湾》等，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有时，我们亦到平原活动，如扩军宣传，我们到过涌口、榄边、南朗、崖口、三乡一带。一次我们到张家边濠头宣传抗日必胜，揭露敌伪阴谋，宣传民主建政的“三三制”原则，以及税收政策等，当地群众非常热情，来人挤满了大会场，听我们演讲，看我们演出，青年人还跟我们学唱歌，老年人称赞我们年纪轻轻有志气。当地的爱国人士、开明士绅也来看望我们，还送来慰问品。但却引起敌人的注意，就在当晚，我们演出后离开不久，地方上的反动分子就到村里来包围，妄图消灭我们这支宣传队，但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群众的支持下连夜转移，使敌人扑了空，阴谋破灭。流星队继续活跃在山区和平原上。

流星队有3位战友，当年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一位是我们的首任副队长梁宏，她是我们尊敬的大姐姐，她离开流星队挺进粤中，在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一位是陈君芝，是流星队有名的歌王，他的独唱甚受群众欢迎。为了锻炼自己，他要求到连队去，后在战火中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时年19岁。一位是张少游，是出色的宣传员，后来转到战斗连队，在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3位战友给我们留下的是永远不灭的英雄形象，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还有当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歌唱在一起的战友们，我们亦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我们的歌声

1944年初隆冬季节，阳光灿烂，五桂山的吊钟花飘香万里，我们部队在南朗战斗的胜利迎来了抗日义勇大队成立的盛大军民联欢会，战斗队伍人人精神抖擞，高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雄赳赳气昂昂进入会场。广大人民群众扶老携幼，还挑着、扛着、提着许许多多慰问品，有大烧猪、大雄鸡、大番薯、大柚子，还有花生、粽子、煎堆、年糕、糖果……

一担担一箩箩，从10多里外的南朗、三四十里外的隆都，甚至六七十里路远的牛角、孖沙等地赶来。刹那间，五桂山的长江崧埔大广场挤了二三千人。大家喜气洋洋，为的是祝贺我们抗日义勇大队成立，祝贺我们部队在南朗打胜仗，慰问部队的英勇指战员，真可谓军民鱼水情啊。

在这个盛大的联欢会上，还有我们的女战友霍淑给部队献机枪，这恐怕是盘古开天地也是头一回吧！这桩美事至今还流传着……

在大会上我们首次演出，演唱了《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这歌声激励着千百个战士的心，这歌声在五桂山四面回响，这歌声震撼着敌人的心脏。我们的大队长欧初也在会上高歌一曲，他唱的是方言咸水歌，歌颂军民鱼水情，群众非常欢迎，一阵阵欢呼声：“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

以后在历次战斗中，如白石保卫战、横门战斗、前山战斗，粉碎敌伪“十路围攻”等，我们都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在祝捷大会上，献给我们的英雄部队。我们的活动常得到领导的关心和鼓励，梁奇达经常问及我们的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刘向东常过问我们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刘田夫有时还到后台看望大家，我们的司令员林锵云还亲自上台参加演唱，每次他都爱唱岳飞的《满江红》，十分动情，十分感人。至今我们还爱唱他唱过的这首歌：“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有时，我们还到连队教唱歌，战士们十分高兴。《我不能把枪放下》这首歌，已经在各个连队普及，要是在晚会上斗起歌来可真够热闹了。一次，民族队唱“为了国为了家，我拿着枪骑着马……”民权队马上接唱：“生活在战斗的黑夜里，我驰骋在火热的阳光下……”雄狮队嗓门更大：“战斗4年了我没有回过家，眼前是黄金一片，又是收割的时候啦，回去吧？不！我不能把枪

放下，我不能把枪放下。”

演话剧《精神不死》

我们部队不仅在战斗中英勇善战，同时又能灵活运用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敌。1944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9周年，部队在翠亨纪念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动员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还演出了连贯亲自编写的歌颂孙中山伟大业绩的话剧《精神不死》。部队还派了一顶轿到崖口迎接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姑太来参加大会。她老人家无比激动，非常留神观看我们演出，还上台讲了话，对我们的抗日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精神不死》这个话剧，主要是描写孙中山临逝世前，接见苏联大使，并立下遗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事，场面非常感人，当时在战士和群众中亦引起强烈的反响。上演这个剧，是由大队政治处直接抓，欧初亦亲自过问的。参加演出的有：黄友涯饰演孙中山，杨子江饰演苏联大使，陈特饰演汪精卫，高平饰演陈璧君，孙烈饰演孙夫人。还有其他卫士长、士兵、医生、护士等人员，均由流星队同志们饰演。

整个剧的排练时间仅一天半，作为流星队来说，是初次上演这么严肃题材的戏，虽然有领导担纲，但一台戏总是要全面配合才能成功的，结果证明，我们是顺利完成任务，达到预期效果，受到好评。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活擒土匪“老鼠精”纪事

□吴当鸿

1944年义勇大队开展对澳门葡萄牙当局的统战工作，双方经谈判，达成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五桂山游击队协助维护澳门外围治安，打击骚扰澳门之敌军、土匪。澳门当时是葡萄牙国占领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葡萄牙国宣布为中立国。因此，日军占领中山县境后，澳门虽没受日军进攻，但仍受日军控制，日本特务设立机构，从事间谍活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云集其中，互相勾结与争夺斗争，土匪活动猖獗，抢劫、勒索、绑票等，社会治安极端混乱，民心惶惶不安。鉴于此情，澳门葡萄牙当局恳求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予以协助，维护澳门的外围治安。

1944年6至7月，白马队中队长谭生从义勇大队部参加会议后，回到东坑驻地，召开党员会议，传达领导指示。他说：近日澳门社会治安极端混乱，土匪猖獗，造成民心不安，葡萄牙当局要求义勇大队协助缉拿匿藏在香洲，绰号“老鼠精”的土匪归案。领导指令白马队执行。据悉，该匪徒原是国民党“挺三”部属成员，年龄40岁左右，身体健壮，武术高超，枪法如神，行动飘忽，独来独往。经研究，坚决执行完成任务。先作安排，选择人员派出侦察，弄清情况再作行动方案。数日后，谭生通知吴当鸿、周行随他出发前往翠微村一交通站（吴当鸿的家）等候。到了下午，来了两名商人打扮的客人，其中一人30多岁，另一人20多岁，是随从。客人进门时声称找谭先生。谭生表明身份，看过对方的介绍信后，便热情地领着客人进入前厅房内，吴当鸿、周行二人在房外警卫。约两个小时光景，谭生送客出门。客人走后，我们进去打扫卫生，不少只抽了半截的“555”香烟烟蒂丢在地板上。搞完清洁后，我们3人回东坑部队驻地。途中，谭生说这客人是澳门来的，别无多说。数日后，原联系的两位澳门客人到东坑部

队驻地，再次与谭生会晤。

事后，谭生派地方工作的人员陈弼（香洲人）进行侦查、监控土匪“老鼠精”的行踪。数日后，陈弼回报：近日发现该匪徒时隐时现，活动于香洲的茶楼饭馆和市场榕树头边楼房的2楼烟局（鸦片烟馆）。谭生即指示陈弼“速回香洲准确弄清情况，严密监控……”当日下午谭生带着李旭军、周贺友、吴当鸿、周行等人由东坑出发，途经里神村，等到黄昏时，才到香洲边缘地点。陈弼已在此等候。情况属实，该匪徒现正匿藏于榕树头边石楼房的2楼烟馆。谭生宣布迅速行动。我们5人快步进入市场，时已入夜行人稀少，商铺已关门歇业，2楼发出微弱灯光。吴当鸿、周行按计划在石楼门前持枪警戒，谭生率李旭军、周贺友直冲2楼，传出“不许动”的呼喝声。过了一会，李旭军、周贺友押着一个双手被手铐铐着，个子不高，短发，身穿白衬衫，外罩黑绸衫的中年人，从2楼下来，迅速离开。到达造贝村时已夜深。即与地方党员黄敬忠联系并到村外一个废石矿山洞掩蔽。次日入夜，由黄敬忠引路到江边（前山航道），已有小木艇在此等候，遂将我众人送到对岸的南屏村。到了村边的祠堂，我们与澳门的来人接洽上。他们4人中的2人原已来过，是认识的，他们见了面极为高兴，签发收据交给谭生后，即用麻布袋将匪徒套住。原先联系认识的澳方负责人将其随身配带的左轮手枪（马担箭牌）送给谭生，表示感谢。双方交接完毕后各自归程。

活擒土匪“老鼠精”，使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名声大振，澳门爱国青年纷纷前来参加抗日游击队。随后，澳葡方将我方提出缉拿的姓郑（不知名）的叛逆者逮通归案后，将此人押送回义勇大队，同时通过关系帮助我们购置电台、弹药及军用物资。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铤而走险”

□吕胜

1944年10月，中区纵队在五桂山召开成立大会后不久，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配合王震南下部队开辟五岭根据地的指示，于20日，司令部与主力一部就从五桂山出发，执行挺进粤中任务。当时的中山是水网地带，主要交通靠水路，加上沿途日、伪、国民党部队、地方实力派岗哨密布，好几百人的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行进只能在夜间进行。因此，从中山五桂山到新会荷塘，就走了3个晚上，第一晚只能到达二顷围，第二晚在海洲。也许是考虑到熟悉环境的因素，当时，九区部队的不少海洲、古镇籍的战士都被派回去担任沿途警戒任务。我是海洲人，在部队出发前夕，就被派到二顷围执行任务。因此，目睹了部队挺进粤中途经中山三九区的过程。

21日，我们到达后不久，挺进部队也就到了那里驻防。当晚，中队长谭卫光通知我们小队去他那。见了面，他把要我们到海洲执行任务的事交代一遍，就让我们回去休息了。其实，当时我们都不清楚要去执行什么任务。

22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了。回到海洲，已是午饭时候了。我们小队到了海洲沙源村，在靠近袁氏大宗祠一带担任警戒。到了傍晚，我们20多人，1挺机枪，负责海洲河面的警戒。等挺进部队上了船，安全到达对岸荷塘，我们才连夜撤回九区部队驻地。

为什么挺进粤中要选择国民党“挺三”部队布防严密的古镇海洲作途中休息地呢？其实，那时候的海洲乡政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白皮红心”政权。乡长袁世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编者注：袁世根于194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为人进步，热心抗日，中顺新边一带地方党组织与他的关系不错。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陈能兴、李超通过做工作，取得他的支持，并控制了海

洲乡自卫队，因此，在部队到达海洲的前一天，派了区伯祥（1942年参加部队，海洲人）回海洲与袁勋、袁永准备好粮食、灶具等，还有过河的桥。他们事先扎好了通天闸那座桥，即从曹步过来的桥。有些山区的人不会游泳，假如掉下河里就麻烦了。

部队途经三九区时，可谓有惊无险。从二顷围过海洲，最关键要通过九洲基谢老虎的驻地。当时地方党组织反复研究从五桂山出发到中区的行军路线，认为：从小榄过顺德塔江，再过高鹤会近些，但那里有个伪军欧阳培部队驻扎，是反动武装，肯定不能从那经过。而从海洲过，路程虽远一些，但有保证，因为海洲乡长袁世根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很安全。

但小榄是“挺三”的司令部所在地，而驻扎在九洲基的谢老虎又是屈仁则的嫡系中队。部队如何才能通过那些地方？抗战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部队派吴声涛（前山人，后来曾参加广游二支队，负责对国民党统战工作）找屈仁则，请他写路条。吴声涛到小榄找到屈仁则，对他说：“我们有些人可能经过你的防地，带枪的，请你放行”。屈仁则说：“可以。”于是，吴声涛顺利拿到了路条，上面写着：“有友军十几人经过你的防地，希予放行”。就这样盖了司令部的章。

他把路条拿回司令部后，司令部领导看了，说不行，写着十几人，可能突然少了几人，或者多了一两个人怎么办？那就麻烦了。最好笼统一点，争取改成“有友军持械经过你的防地，希予放行”。

这是解放后我曾碰见吴声涛，他亲口告诉我的。他那时任广州石化的党委书记。当时我和他谈，他说，他当时也不知道部队的任务，叫他写路条他就写。后来他就再去找“挺三”司令部的人，说明这些道理，重新写了一张放行条：“有友军持枪经过你的防地，希予放行”。

拿到放行条，队伍经过九洲基谢老虎的防地就有把握了。挺进部队在二顷围休息了一个白天，吃过晚饭，在二顷围出发，秘密行军，到达九洲基，已是半夜。把路条交给了哨兵，他很惊慌，马上拿起机枪，召集了10多人上碉楼察看形势，一看，原来是

几百人的大队伍，马上缩了回去。虽然事先没接到通知，但反正有司令部的条子，出了事也与他无关，于是就放行了。

部队到了海洲后，马上驻防。那天袁世根把部队安排在沙源袁氏大宗祠内。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李超与陈能兴去袁世根家坐阵，因为那时袁世根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们到袁世根家坐阵，如有情况处理不了就马上联系。

那晚袁世根约了一班副乡长（副乡长是各个阶层的）和中队长袁毅文去茶楼饮茶。他事先已和袁毅文打了招呼（因为他已参加抗日同盟会），说可能有些队伍过我们这里，为免冲突，外哨由海洲自卫队布防，内哨他们自己放。海洲自卫队里除袁毅文是听袁世根的话外，中队副容辛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官，为人正直，因不满国民党不抗日而回家乡。他回来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接触了我们，我们安排他当海洲自卫队的中队副掌握武装。容辛负责具体安排。

那天，自卫队负责放外哨，我们部队放内哨。袁世根他们饮茶到1点多，部队已经到达海洲，全部进入了驻地，其他几个乡长还不知道。

部队走了后，袁世根遇上了一些麻烦。屈仁则、袁带曾找袁世根问责：为什么五桂山老八经过你那里，你一无报告，二无拦截。袁世根回答说：“我那里是三叉口，几个镇的交界，有时有些队伍经过，我们防不胜防。”“你怎么不报告？”袁世根说：“听说他们是从小榄过来的。”意思是从你那边过来的，你事前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屈仁则找袁世根追查此事，反被袁倒将一军，从他那边来的，他自己也是失职。于是支支吾吾的，这件事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选自《中山党史》2005年第1—2期）

三次突围

□郑卫标

记得在日本投降后，珠江纵队第一支队转移到东江，原地仅留下连排骨干 30 多人。不久，上级再从东江调回一小部分武装骨干分子，与原来留守的加起来也只有 60 多人。当时，我们的斗志十分旺盛，任务也十分明确。上级要求我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实力，坚守阵地，以政治斗争为主，辅以武装斗争，锄杀奸霸，使敌人的政权无法在山区建立，等待时机，歼灭敌人。这段时间，我和其他战友组成的武工队，先后遭遇过敌人的 3 次包围，由于武工队员的坚定性和警觉性，以及群众的冒险掩护，都一一化险为夷，基本保存了实力。

第一次突围。我从东江回来不久，被派到永丰地区武工队工作。有一次，我和另外 3 位战士编成一组前往外沙村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后，就在当地做饭，下午 6 时左右，饭还没有吃完，就被下栅的国民党驻军包围了。我们在这紧急关头，决定分两路突围，领队黄顺英和“甩须仔”（绰号）向永丰方向突围。这 2 人刚过公路，就被敌人发现了，在敌人的一阵乱枪扫射下壮烈牺牲。我和卓 × ×（忘记名字）则向淇澳岛方向突围，利用熟悉的隐蔽通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沙滩上的荫林里躲藏。后来，敌人沿着我们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跟踪而来，但是敌人不敢贸然下水进入荫林搜索，只在岸上向荫林胡乱地开枪扫射。一阵疏一阵密的子弹呼呼声，一直到半夜 11 点钟才停息。看样子敌人真的撤退了，我们才拖着泡水多时的身躯和疲乏的双脚，慢步走向长沙埔山上，还在山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走进石门村的被山区人称为游击队的母亲——贺婶的家，贺婶给我们吃了她家里的剩饭，并告诉我们在九堡一带还有敌军驻守。于是，我们又转回山里，几经波折回到了永丰驻地。

第二次突围。国民党中山县的地方势力一心要消灭中山的革命武装，不时派出大批军警向五桂山区进行“清乡”“扫荡”。中共中山特派室要求我们所有武装人员分散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领导安排我带领战士李洪到东桠村隐蔽一段时间。半个月过后的一个早上，敌人根据密报，由国民党地方军头目谭钟善率领 60 多人，在东桠村后山大树林中搜捕到我们，我们与敌人周旋了一段时间，终于安全脱险回到长江西陂村。但是，由于在敌人的封锁下，我们无法联系上组织，只好留在山上“自力更生”，白天在山里砍柴，再伺机给村里的群众通话，请他们帮忙把柴草挑到附近的市场卖掉，换点食物回来充饥。我们在山上再坚持了 1 个多月，直到组织通知我们 2 人归队。

第三次突围。由于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国民党中山保警头目吴康楠、谢文泉等，加紧进入山区“围剿”我武装力量。

有一天，国民党保警中队长谢湛强率领全队人马进入长江一带“清乡”“扫荡”，当天晚上驻扎在长江崧埔村。而林辉和我、李雄、梁辉、林照满、官河等 6 人就在敌人驻地的出口处九曲林村立脚。第二天早上，我们被谢湛强这队人马包围在村内。群众急来报信，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来不及研究突围方法就和敌人交火，林辉带着梁辉、林照满和官河向西陂村方向安全突围了；李雄来不及随队突围，单独进入了后山大树林隐蔽。我独自一人向虎尾山方向突围，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登上了虎尾山。我在山上呆了大约大半个钟，看见 6 个放牛童牵着牛从入山虎（地名）进入我正在躲藏的山窝里。我便向其中一个放牛童了解村里敌情。不久，敌人也登上了虎尾山，发现了这帮放牛童，就喝令放牛童全部上山来。机警的放牛童小声地问我怎么办？我叫他们靠近我，利用他们的身体挡住敌人的视线，我一个闪身跳进了掩体隐蔽着，叫他们快点上山顶去。当这班放牛童到达山顶时，狡猾的谢湛强一一点着人数，咆哮地说：“为什么少了一个，是不是你们放走了游击队？快说！要不都把你们抓起来”。这时，放牛童紧张起来，谢湛强下令搜山窝。我担心放牛童的安危，于是毫不犹豫地拔出驳壳手枪，对准谢湛强放了一枪，正好打中了谢的右手。趁敌人

突然失去指挥乱了阵脚的一刹那，我迅速地向入山虎的出口处冲去，敌人的子弹在我的背后狂呼，但是我已进入入山虎山坡。不料，又遇上五六个把守在山坡那一边的敌兵。那时，迫使我再举起手枪点射他们几枪，这几个胆小鬼急忙逃命。我冲破封锁之后，越过公路，跑过了一条山溪，翻过了一条大基壘，利用基壘作掩体，马上往驳壳枪上足了子弹，再向追来的敌人进行射击。敌人再不敢追上前，我便迅速上了高山，急步进入了福获村。第二天，村里的群众关心地问我：“为什么那么多国民党兵包围你们都能成功突围？”我回答群众：“国民党兵都是胆小鬼，一反击就怕死，说来就是这么简单。”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驻中山的地方势力接二连三地向我五桂山区进行“清乡”“扫荡”，历时一年多时间，但我们在山区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夷，使国民党的“清乡”“扫荡”都以扑空和失败告终。而我们却保存实力，并逐渐地发展了革命力量，终于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在中山解放前夕，我们武工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我被任命为第三营第九连连长，随队参加解放中山的战斗。

（节选自《中山党史》总第7期）

石洞突围

□吴当鸿

1947年，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则由战略的进攻转入战略的防御。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确保华南，强化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同年9月，委宋子文接替张发奎、罗卓英的广州行营主任、广东省主席、广东省保安司令，将党、政、军大权集于宋氏一身。宋子文主粤后，扬言“广东治安3个月有办法，6个月见成效”，一方面召开“清剿”会议，制定“清剿”计划，起用失意军人及地方反动头目，收编土匪武装，增编保安团队，补充残兵败旅，成立“剿匪指挥部”“剿匪指挥所”，更换各县县长，从省到县实行“军政一体化”。一方面加紧“三征”以支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经过一番准备后，于1947年12月开始调动兵力，对广东人民武装发动第一期“清剿”，方针是“肃清平原，围攻山地”，“分区扫荡，重点进攻”。

中共中山特派室在组织袭击唐家国民党警察分驻所后，各武装化整为零分散原地。凤凰山武工队按计划分散活动，队长吴当鸿和副队长梁泰猷等6人留在凤凰山石洞掩蔽。这凤凰山石洞是个天然花岗岩石洞，石与石互相垒叠，层上有层，洞中有洞，洞内还有沥沥泉水。岩石的间隙都是出入洞口，洞口弯弯曲曲。主洞口上面的大石壁刻有“洞天福地”几个大字。洞外野藤覆盖，周围荆棘杂草丛生，平常我们武工队把一些粮食、弹药、简单生活用品均藏洞内。武工队常在此宿营，在洞前石头上教战士学文化、讲形势，研究工作。

1948年1月18日（农历十二月初八）早晨，即我武工队袭击唐家警察分驻所后第三天，国民党县保警第二营第六连陈汉飞部100余人突袭杨寮村，包围凤凰山地区。此时，梁泰猷、周棉、

阮通、蔡保和我等6人在研究工作，突闻附近传来“砰、砰、砰”3声枪响。我们立即意识到敌人又进山“清剿”了。梁泰猷和周棉马上到洞口观察情况，发现一队敌人正在对面追击我工作人员杨日仪。情况紧急，我们立即做好作战准备。很快，敌人冲到了石洞顶部，前呼后喝，到处搜索。我们用以进洞的木梯被敌人搜出来了，他们就用绳索将一个敌兵吊下去把木梯摆正。一队敌兵随即顺梯而下，向我埋伏地的左侧洞口窜进来。他们发现我们睡觉的床板和铁箱，以为有横财可发，你争我夺的把铁箱拖出洞口。打开其中的一个箱子，只见里面全是《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群众》杂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众哲学》、《华商报》等革命书刊。另一个箱子则全是大米、咸菜，并无其他东西，敌兵大失所望，破口大骂。

上午10时左右，敌军再次进洞。一个班长手握刺刀，腰插手榴弹，由上而下。我们已早在洞内3公尺处的一块横石用毛毡双重铺叠作好防御阵地，蔡保、周棉在正中，梁泰猷在左，我在右，联成一线。阮通和周仔在后作应。不一会，敌班长的脚已伸入洞内，正准备往下时，“砰”的一声，我们的枪响了，正中敌兵腹部。“哎哟，救救我啊！”上面的敌兵听到枪声，即乱作一团，气急败坏地争着上梯逃命。待他们惊魂稍定，才有几名敌兵在长官的差使下，将伤兵抬出洞外，再用床板抬下山去，但半路上已一命呜呼了。敌人被迫停止了进攻。洞外一片寂静。下午4时多，敌军大量援兵到达，计有：县保警第二营第六连陈汉飞部，第三营第九连黄伯灵部，另调动五、六区的下栅、唐家警察所、分驻所警力，康济乡、香山乡的联防队，乡警队和地方反动势力共约600人。敌兵占据山头平地，建岗立哨，放置警犬，夜间在石洞周围悬挂煤气灯，入夜灯火通明，犹如灯光夜市。我们沉着镇定，伺机而动。突然，洞口周围火光冲天，火势逐渐向洞口蔓延。原来敌人“投石问路”不行，竟采用火攻。一瓢瓢的汽油向洞内泼，火舌向洞内喷吐，浓烟滚滚，洞石被烧得火烫烫的。敌人还借助火势，拼命向洞内投掷手榴弹，顿时弹皮、石碎横飞。然而在这险恶的情形下，我战士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敌人以为一轮火攻和投弹，我们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烟火熏死了。于是，在下午6时，一群敌兵再次鬼头鬼脑地向洞口接近。但到了洞口，再也不敢向前迈进一步，只是吵吵嚷嚷，大骂一顿。不久，听见一个当官的大叫：“谁下去（进洞）回来晋升一级，奖款100万！”回应的只是嘘张声势地大喊：“缴枪不杀！”但谁也不敢进洞。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手拿短枪，身材高瘦的匪排长骂道：“你们都是胆小鬼，看我的！”刚冲进洞，“砰”的一声，被我们的子弹打中了腹部，立即倒在洞口离我们1米的地方呻吟挣扎。我令周棉立即给他再补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

夜幕降临了。一片哭哭啼啼夹杂着吆喝声，由远而近。原来，敌人到村中抓来一些妇女，迫她们进石洞替敌兵收尸体。我们一边作好战斗准备，一边叫那些下到洞来的妇女不用害怕，并协助她们把尸体托上洞口。晚上9点多钟，敌人用枪迫着杨寮村甲长杨彬（白皮红心，长期支持我们的）进洞劝降。杨彬进洞后，趁机向我们报告了洞外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送走了杨彬，我们即研究反击突围的方向、路线及联络点，迅速行动。由于天黑，加上洞内地形复杂，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小心地迈过洞内小坑，一洞过一洞，转来转去，爬了一个晚上，却只是在洞里转了个大圈，又回到了原处。此时已凌晨4点多钟，反击突围已是不行了，只好在原地坚持，待机行动。

曙光初露，四周寂静无声，一阵阵烧焦了的灌木和野草的味道飘进洞来。我们坚守着阵地，随时准备与敌人搏斗。饿了渴了，就喝洞里水溪的水。又坚持了一整个白天，时间过得特别慢。夜幕覆盖大地，敌人又出动了。他们抓来杨寮村的村民，用枪押着他们先进石洞，敌兵则跟在后面，摸进洞来，占据了我们原来的阵地。为了不伤害群众，我们只好退到洞内的第二层。就这样一直相持到次日凌晨，敌人才退出洞去。这天的反击突围计划又被打乱了。

第三天白天平静地过去了。晚上我们围在小油灯旁，商议突围的方案，决定从靠洞顶崖壁的洞口反击突围，由阮通打头阵，我排第二，梁泰猷排第三，其他同志依次跟上。外面漆黑一片，

北风呼呼。当接近洞口，我用手拍拍阮通脚，示意他踩着我的肩膀往上攀。阮通到达洞口时，脚踩在一块松土上，连人带泥一起跌下来。敌人哨兵听到了响声，即刻开枪射击，我和阮通不得不向后撤退，梁泰猷则趁机从另外的通道冲了出去，突围成功。这时洞内剩下5个人。

第四天，敌人发觉了我突围的意图，采取加强岗哨和“昼睡夜扰”的战术，妄图把我们困死在洞内。经过几天艰苦的斗争，大家都饥寒交迫。为了保持体力，我们便吞食用水泡的纸张和在洞口里边的野草以及饮洞内溪水充饥。夜里，敌人又进洞内搜索，电筒强光四处乱照，我们埋伏在石洞的第二层。敌连长在洞里大喊大叫，气焰十分嚣张。我们瞄准了敌人，射出愤怒的子弹，敌人慌张地还击。经过一轮枪战，敌人被我们击退了，我们重夺阵地，坚守在洞内。

第五天晚上9点多钟，敌人再冲入洞内搜索，我们又被迫撤退到洞内的第二、三层石岩潜伏。一个敌兵慢慢地向我埋伏的地方搜索过来。我屏着呼吸，待那敌兵走近，一个箭步冲过去，用枪顶着其胸口。那敌兵在突然袭击下，惊慌失措，连连求饶：“大佬，我都是为两餐啊！”此时，埋伏在附近的周棉为保护我的安全，冲了过来，猛地将我往后一推，用身体掩护着我，同时用枪指着敌兵的脑袋。那敌兵吓得连连叫道：“前面无路，前面无路，前面无人。”转身后退。直到深夜2点多，敌人才撤出石洞。

第六天，敌我双方对峙了一整天。

第七天凌晨，我们趁敌人还没进攻，抓紧商量如何突围事宜。大家认为，我们已经坚持6天多了，无粮充饥，再下去恐怕身体不能支持，再不突围出去，只有束手待毙，我们要抓紧敌人开始厌战和麻痹的时机，必要时以火力强攻拼搏冲出去。并决定反击突围方向和路线，以及将银坑作为反击突围后第一个联络点，正坑为第二个联络点，再就是转移到五桂山。

下午四五点钟，我爬到石洞口，透过石孔仔细观察敌情动态、哨位、集宿地……然后转回来，向同志们作了介绍，要求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大家斗志昂扬，表示宁死不屈，死也不当俘虏。

夜幕降临了，我们由洞内底层往洞面靠山边方向爬，集中在突破口的山岗外面观察敌情。此时，月光皎洁，山上的草木依稀可辨，只见一敌哨兵肩上扛着枪却坐在石头上，不时发出一阵咳嗽声。不远处又有一个敌哨兵握着枪踱来踱去，东张西望。附近山头水涧，也有敌人在巡逻。而小坡上搭着的那些敌人的临时哨棚，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敌兵。

时钟指向12点，我们开始向外反击突围。说时迟，那时快，周棉一马当先，“扑”的一声跃出洞口，沿着石崖边冲过去，我随即低姿跃出。阮通跟着我也冲了出来。很快，敌人哨兵发现了我们，即向我方开枪射击。枪声惊动敌群，敌军立即发起向我们四周围过来。我战士临危不惧，坚定地给敌军以还击，趁敌军混乱之际，我们冲出了重围。另2人未跟上。

翌日，我与周棉、阮通在银坑村会合，历尽艰辛，重新相聚，大家都尽情享受着突围战斗胜利的喜悦。遥望云雾缭绕的凤凰山主峰，感到今后的责任更重大，路正长，但曙光已经出现。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2—3期）

在敌人眼皮下战斗

□黄金贤 黄勤志

解放前的后山村，是长洲乡的一个堡。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洲乡的黄鞅、黄江本、黄健等一批共产党员在乡间的活动对乡人影响甚深。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在国统区内残酷地镇压革命同志，在前辈的精神鼓励下，后山村不少青年前赴后继地加入了党团组织，机智地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地下战斗。

掩护革命同志

解放战争后期，根据形势的发展，一二区区委书记黄敏元认为可在长洲设立工作联络站以便开展工作。1949年，中共长洲乡支部经研究，决定在西村黄官海家和后山村黄金贤家设立地下工作联络站。由黄金贤、黄勤志夫妇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及打点生活后勤。黄敏元安插了中共中山石岐区委书记邓绍明住在黄金贤家。邓以经商职业为掩护，早出晚归地工作，并曾多次在黄金贤家里召集卢克诚、邓永年、黄敏元、周挺等地下党员商谈工作。此时，黄金贤、黄勤志便担负安全保卫工作，注意邻居及路人的动静。平时，有地下同志过境，如有澳门中共党员黄健介绍来的，也有黄敏元介绍来的，通常是由黄汝鹏带到黄金贤家中，由黄金贤、黄勤志安排住宿，次日再由黄汝鹏护送离村。此外，上级交来准备张贴的标语等宣传资料，则收藏后，依时供应给同志去张贴，都全部安全完成任务。

掌握武装 收集敌情

西村的黄官海按照上级的指示，布置团员黄汝鹏负责掌握后山村阜安碉楼的武装。黄汝鹏把家中的农活大部分都交给他的大哥承担，自己则经常到碉楼与自卫队员进行接触，做争取、教育

工作，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要争取解放才有出路的道理。终于取得他们的理解，自卫队长表示听从我们的指挥，从而掌握了村里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黄官海还布置团员黄坚石、黄庆珠设法打入乡政府工作。黄坚石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不少情报。当时，邻近的乡政府是互相援助的，他密切地留意双方通过电话机联系，互通情况的内容，并注意乡长的动向，及时向组织报告。

1949年9月，黄坚石、黄凤兰、黄伟波等多人一起，跟随黄官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第十三连当政工员，并随团迎接解放军进城，解放中山。黄金贤则发展了黄汝鹏、黄泽尧，黄勤志发展了黄丽韶参加地下新青团。

发动群众 迎接解放

为迎接中山的解放，上级布置要做好宣传支前迎解的发动工作。黄金贤根据当地青年群众喜好武术，通过在武术会、娘马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以团结、教育青年。在与青年聚会时，讲述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发动他们反抗国民党的征田赋、征税、拉壮丁，维护了群众的利益。

为了建立宣传阵地，在后山村牛王庙的一间小厅里开办夜校，有学生黄桂花、黄兆芝等大约20人，由黄金贤、黄勤志、黄建昌分别主持国语、美术、常识课程，利用在讲课之中，或在下课后大家坐读的时候，宣传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讲述新民主主义性质、社会主义道路等党的基本知识，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中国是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道理。

在长洲乡支部的党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长洲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为准备迎接中山解放和支援前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1期）

解放前夕在沙边的活动

□孙云峰

沙边乡是珠江口岸的一个村庄。

解放前，这里是“大天二”出入与集体明火打劫的必经之路。因此，全乡有碉楼 80 多个，是全国之冠。清代起，靠海边就筑有水洲山炮台、东安台炮台，是海上军事要塞。国民党也插手该地区，反动势力很浓。

我党组织也很重视该乡工作。在解放前夕，党组织曾派孙曼光、孙国平、孙惠廉和我以小学教员身份回乡开展工作，并成立党支部，孙曼光为支部书记，我为组织委员，孙国平为宣传委员，支部由四区区委书记谢秉才同志直接领导。

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1）加强学习，主要是对区委发下的文件进行学习，以提高我们党团员思想和对形势的认识。（2）发展党团员和少先队员，扩大革命力量。（3）调查与掌握乡的武装。（4）宣传发动群众迎接解放。

我主要负责在学校的进步教师和高班同学中发展团员和少先队员。孙曼光与孙国平、孙惠廉负责在乡内的进步青年中培养发展对象，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发展了 10 多名团员，30 多名少先队员。他们是解放后成立农会和区乡政权的主要干部。

为了加强乡的武装力量，我们支部成员直接到驻柏山乡反动头子孙恩荣营处找孙恩荣交涉，以保卫家乡为名，借出枪支。又调查掌握了乡内警察所有的枪支数量，以及在乡“大天二”的枪支有多少、什么型号、什么人佩戴等。组织青年保卫家乡，在解放初组建民兵组织时，这批青年成为主要骨干。

为宣传发动群众的支前迎解，我们按照上级组织布置的任务去做，展开政治攻势。当时由我执笔，把区发来的宣传材料，写成标语，连夜分工在街头巷尾、乡公所墙壁、市场、商店附近张贴。

当时也遇到警察巡村，但不敢干涉、阻挠我们。由于我们频频活动，也引起反动乡长注意，派专人暗地监视我们的活动，特别派人暗伏在我们活动的屋前进行监视，但始终不敢有所行动，可能他们也认为大势已去。与此同时，开办夜校，宣传发动群众。利用夜校来团结乡内青年农民（妇女），主要学习文化，加插时事课，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及国内形势。当时我们主要以学习文化为宗旨，通过乡绅和征得校长同意开办夜校（经费是发动乡绅孙干宾、孙海筹、孙子静等捐献筹款的）由进步教师和我当义务教师，结果搞得轰轰烈烈，有40多名青年（妇女）参加，情绪很好。期间也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派出国民党特务分子、坏分子从中干涉、闹事，后由于我们和进步青年加以压力，把他们赶出校门，事件很快就平息下来。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而解放前夕的这段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1期）

北帝庙会师

□司徒洪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 1949 年 7 月 22 日发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华南各地的指示：“各地必需加紧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组织起义军”。九区区委遵照上级指示，在八九月间召开了大拗会议、老糠围会议，专门研究如何组建九区武装队伍，为解放九区做好一切准备。

经过 1 个多月的筹备，终于在 9 月中旬组建 3 个主力中队，即纪雄队、纪文队、纪光队，共有 200 多人。在武器方面拥有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6 挺、卡宾枪 1 支、步枪 200 多支，短枪数十支。为迎接九区解放做好了武装组建准备。

10 月 12 日，中顺边工委派人送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符号 300 个，并且还带来中顺边工委武装指挥部指示：“决定将中山九区 3 个主力中队归顺德独立团编制。今后听从中顺边工委和珠江地工委的调动和安排”。

广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 10 月 16 日，九区区委接到地工委指示：要九区抽调 2 个中队到南头北帝庙集结，留下 1 个中队在九区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并准备截击向珠江口逃窜的残敌。当天下午 4 时，纪雄队、纪文队从孖沙穗隆围、低沙等地开赴北帝庙。珠江地委书记黄佳和顺德独立团副政委刘云、政治部副主任黄静生等，率领驻中山三区的北平队从高沙到达北帝庙。由顺德县杜启芝带领驻顺德的北江大队 3 个中队亦到达北帝庙。当天下午 5 时，6 个中队会师北帝庙。600 多名指战员均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顺德独立团”的符号，雄纠纠、气昂昂齐步进入学校操场。操场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当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看人民子弟兵的雄姿。大家都说：“有了枪杆子，翻身解放的日子就快到来了。”

盘踞在中山三九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听到大批人民解放军集结在北帝庙一带，吓得心惊胆怯，惶惶不可终日，在蒋家皇朝即将崩溃之际，他们各自找寻生路。屈仁则早在广州解放前已逃亡香港；潘惠、梁自带、吴金等亦先后逃亡港澳；梁自带的大队长黄祺仔则驾着飞马电船，带着马仔，向珠江口败退，最后他在澳门的函仔落脚，不久转去香港。只有梁正在解放前夕起义投降，把所有武器交给顺德杜启芝接收，他的1只电船和部下交由九区政府接收。

在此改天换地的时刻，敌人也用假起义来欺骗我们。现在我抄录肖权写的题为《智擒关葆真》一文中的一段，这是他亲历其境所处理的。文章说：“约于1949年10月中旬，反革命分子关葆真，假装进步，在容奇公开成立支前机构，借以向各商户勒收款项，同时又要求杜启芝同志协助他向我方司令部搭线。杜见他行动古怪，很不放心，估计他刮得巨款后，可能外逃。上级早有指示：‘对关必须严密监视，不得让他跑掉，也不得乱捉乱杀。在紧急时刻，要智擒关葆真。’随即将行动计划上报审批，随后分头行动。杜启芝通知关葆真，说我方司令员现已到达中山九区，趁机带关去会见司令。当晚杜、关各带随行武装若干人前来九区；我们纪雄队、纪文队则转移到容奇海尾对岸河边一带警戒，由梁泰猷指挥。另设专人接应渡河。我（即肖本人）在靠近河边村内，借了一间大蚕房，假设了一个‘司令部’。这里由我坐镇，门外有一个警卫班。当晚关葆真等人到达这里，除杜、关二人被请进‘司令部’外，其余随行武装均留在此休息，给茶烟接待。当关进‘司令部’大门时，门卫请关放下武器方准进内。这时传令兵引关、杜来见我，关首先称呼我一声‘司令’，我即向他解释：‘原来司令早就在此候驾多时，后因有要事外出，嘱我在此等候，然后带你去见他。’杜将关交待完毕，便告辞到门外去协同我们向关的随行武装做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器，并酌情给予费用，将他们带回容奇去。我和关短暂的寒暄之后，我对关说：‘现在我和你起程去见司令，你可放心，沿途有我们保护你，你的随从武装可跟杜返回容奇，你的自卫手枪暂时仍由我们代管’。接着我嘱传令兵通传全体武装集合，马上出发。

我和关走出门外，加入队伍行列，随同部队向西转移，在进行中为了预防万一，除布置专人对关严密监视外，一路上我也跟在关的后面。同志们虽然整夜没有睡眠，但在胜利气氛鼓舞下，在夜行军中情绪饱满，秩序井然，连续走了几个钟头，到达了凤仪乡天成围。这时东方已白，我们正在安排同志们休息，恰好昨天派出前往请示上级的通讯员回来，从此得悉上级批准拘捕关葆真。梁泰猷当即向关宣读批文，然后将关锁起来。”

我们6个连队在北帝庙会师以后，立即开展学习和整训。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有关政策文件，在政治思想上认识人民子弟兵的性质和义务，为接管城市做好准备，打下思想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

地委书记黄佳提出会师北帝庙，是经过深思熟虑，统筹全局的行动步骤。10月26日，他发出总动员令，命令6个连队从北帝庙向顺德容桂方面前进。由北江大队彭铁生中队作先遣队，从大濠口渡河经容奇尾直插上市，纪雄队进驻容奇凤山，纪文队进驻容奇镇。北平队和北江大队两个中队进驻容奇附近高地，任务是监视败退到容奇海面一只炮舰上的国民党暂编第一纵队邓锜部队其中的1200多人（枪），希望迫他就降，防止他出海逃跑；同时亦保卫地工委在乌坭塘驻地的安全，维护容桂地方的治安；更主要的任务是为进军大良镇、解放顺德县城作好准备。

10月28日，黄佳书记下令纪雄队北江大队苏明中队，配合边纵一团向大良挺进。于当天下午5时进入大良镇，顺德县宣布解放。国民党败将邓锜也向边纵一团缴械投降了。

10月30日下午1时，黄佳命令梁泰猷、肖权带领边纵一团200多战士和纪文队回师中山黄圃镇，解放九区。纪雄队则留在顺德，编入县大队。九区解放后，纪文队、纪光队大部分同志编入区中队，部分同志调去区政府，有部分同志去搞筹粮支前工作。至此，九区3个主力部队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为解放事业立下了功勋，九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它。

（选自《中山党史》2004年第3期）

后记

中山市不仅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也是全国党史资源大市。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这片热土上我们党都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为了资政育人，传承党史，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数年如一日，不断编撰内部期刊《中山党史》，不知不觉间已达50余期。翻开期刊，发现有许多革命老前辈以及党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跳动的文字生动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读来让人倍感亲切。这可是研究中山党史第一手的珍贵史料，只是不集中，分别载于各期期刊中，无论是寻阅还是研究都不太方便。

为此，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门把这些珍贵史料，从《中山党史》期刊中摘出，按照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汇编成册。新中国成立前的，荟萃成《革命无悔：战斗在中山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的，荟萃成《岁月留声：激情年代的中山奋斗故事》。所摘出的每篇故事，除个别文字有修改之外，基本保持原貌，而且每篇文章都标注了作者以及《中山党史》所刊载的具体期数，以便查阅和引用。此外，为了加深读者对某一中山党史事件的印象，在相关文章后面还附有“延伸阅读”，而这个“延伸阅读”就不一定局限于《中山党史》，来源比较广泛，如中山政协文史资料、《红广角》等。

感谢各位老前辈的亲历回忆，为党史传承提供了生动的党史素材。感谢相关党史爱好者以及工作人员，你们的研究和努力，为读者提供了陶冶情操的精神食粮。

编者

2016年12月

革命无 悔

战斗在中山的日子

上架建议： 历史类

ISBN 978-7-5098-3967-6



9 787509 839676 >

定价：20.00元